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以變為常，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
以《上下游新聞市集》為例

**The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Alternative Media in Taiwan :
The Analysis of News & Market**

指導教授：方念萱博士

研究生：盧易詩撰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七月

謝辭

這篇論文得以生成，要感謝指導教授念萱老師，從提出問題意識、進田野、寫研究發現到完成論文，謝謝親愛的念萱老師耐心指點我在寫作上的種種缺失、以各種方式觸發我的思考。每每結束和老師的晤談，我總是既感激又抱歉，謝謝念萱老師包容我的各種粗線條，在我喪失動力之際，因為有老師溫暖的鼓勵，我才能重拾寫作的勇氣，真的非常感謝念萱老師願意陪我「爬」完這趟碩論之旅。

這篇論文得以萌生，則要感謝大四下的某個午後，阿孝老師在系辦公室邀請我擔任獨媒協會執行秘書，這份工作讓我跳脫舒適圈、接觸許多與過往生命經驗迥異的人事物，更觸發這篇論文起初的提問，謝謝阿孝老師一直以來的信任與支持。也要感謝口試委員昌德老師、中祥老師願意花時間審查這篇長達 188 頁的論文，細心指正論文的盲點、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使我收穫良多。更要感謝受訪者一小非、文豪、佳珊、慧貞、琇真、郁薇和德廉，誠心感謝您們願意慷慨相助。

在淚水與歡笑交織的碩士生涯中，感謝師長與水火團隊傾囊相授，以及耳包團的陪伴—可嘉、勝淋、方瑀、慧馨、阿伶、奕雯、博臻、嘉真、小花、莘倫、結伴度過最後一哩崩潰路的阿欣跟崇暉，很慶幸研究所時光有你們一同歡笑流淚。

曾和我一起養育 book baby、同時也是本論文保姆的找命和拍拍、一起度過九年即將邁入第十年的笨曾、一起說走就走的阿文和大琬，還有人不在但心一定在的肉肉團美女們，沒有你們的世界，我想我會活得很無聊，謝謝你們！還有亦師亦姐的 Peggy 助教，感謝助教總是默默地為我加油打氣。

碩士生涯的結束，意味著我將徹底從學生身分登出，這一路走來，感謝我親愛的姑姑，沒有您，我不會有今天。感謝阿華媽媽和阿萬阿伯把我當自己的小孩疼愛。美漣姐姐、育慈姐姐、姐夫、還有佳慧姐姐、佳芬姐姐、佳雯姐姐、世諺哥哥、嘉琳哥哥、誠誠哥哥、得雄哥哥，謝謝您們一直以來的照顧與支持，我愛您們。我的活力素—Dan、維、扭、萌和寧，謝謝你們為我帶來歡笑與安慰。

最後，我想把這篇論文獻給在天上的媽媽，希望我能讓您感到驕傲。

盧易詩 2017/08/23

摘要

本研究採行塊莖思維為研究取徑探勘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考量到時間限制且本研究不以發掘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群像為研究目的，研究者選擇以《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為研究案例，藉由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深描上下游新聞如何產製報導、歷經哪些轉變、內部如何互動等與新聞產製有關的面向，並從「與變共處」的塊莖生成觀點，檢視其「以變為常」的新聞實踐面貌與生成。

研究發現，上下游新聞會隨著組織人事流動、讀者閱讀習慣改變、內容市場競爭等內外情境變動而調整組織編制與報導產製模式，但因內部成員對於調整方向與幅度未能協商出共識，內部衝突因而日增。對此，上下游新聞目前試圖藉由共同守門模式以及制度化的組織運作降低內部衝突發生機會。

再者，從上下游新聞與域外物的互動經驗可以發現，臉書等社群平台是上下游新聞重要的消息來源與露出管道，對上下游新聞的報導產製影響重大。

另一方面，隨著組織受到各種內外情境變動的刺激，上下游新聞成員逐漸展現各自對於媒體角色定位的見解差異，成員紛紛在突破疆域界線的分裂點上，表明自己如何認知媒體角色定位，並由此開創不同於以往的新聞實踐樣貌。

關鍵詞：獨立媒體、另類媒體、另類媒體新聞學、新聞實踐、塊莖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notion of rhizome as a research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journalistic practices of alternative media in Taiwan.

Considering time limit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ble observation to examine the journalistic practice of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thesis—"News &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er looks into journalistic practices via Deleuze and Guattari's notion of "rhizome" and "becoming."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long with the context change, News & Market constantly adjusts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ay it produces news. However, since journalists cannot often reach an agreement altogether, the organizational conflicts would gradually increase. For now, News & Market manages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ies of organizational conflicts through the ways of "joint gatekeeping production mode" and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Moreover,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social media platform, taking the example of Facebook, has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news production of News & Market.

At last, because of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ontext change, the journalists of News & Market show different cognition on their role positions. When there is the time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 journalists would cross the border to provide different ideas and develop the journalistic practic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Keywords: independent media, alternative media, alterna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tic practices, rhizom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第二節、問題意識.....	3
第三節、研究目的.....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0
第一節、新聞專業規範的流變與反思.....	10
一、 新聞，一個逐漸體現的「專業」.....	10
二、 新聞專業規範的挑戰與反思.....	17
第二節、另類媒體與另類媒體新聞學.....	26
一、 定義另類媒體.....	27
二、 另類媒體新聞學.....	35
第三節、台灣另類媒體工作者的新聞工作圖像.....	42
一、 台灣另類媒體的發展歷史.....	43
二、 結構與經濟.....	49
三、 記者和讀者的關係、記者角色的轉變.....	51
四、 消息來源與草根報導.....	53
五、 另類媒體與新聞專業.....	55
第四節、塊莖思維.....	58
一、 另類媒體研究的四個研究取徑.....	58
二、 將另類媒體視為塊莖.....	63
第五節、研究問題.....	67
第三章、研究方法.....	71
第一節、研究設計.....	71
一、 研究對象：《上下游新聞市集》.....	71

二、	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	73
三、	研究者角色反思	78
第二節、	研究者的研究取徑：將自述視為塊莖	79
第四章、	研究發現	83
第一節、	以變為常：上下游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	83
一、	三種新聞類型的演變	85
二、	內部互動：成員相處與角色衝突	92
三、	守門：新聞處理	103
四、	守門：新聞蒐集	114
第二節、	在疆域內外遊走：上下游新聞與外部力量的相遇	127
一、	與讀者的互動	127
二、	雙面刃：臉書社群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138
第三節、	異質與非一：上下游新聞的分裂與再生	143
一、	獨於何者？上下游新聞的媒體定位	143
二、	立足何地？運作制度之於上下游新聞	155
第四節、	塊莖樣的上下游新聞	162
第五章、	結論	167
第一節、	研究結果	167
第二節、	研究反思與建議	175
一、	研究歷程反思與理論侷限	175
二、	研究建議	177
參考文獻		179
中文部份		179
英文部分		185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87

表目錄

表 2-5-1、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列表.....	69
表 3-1-1、《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歷來成員列表.....	76
表 3-1-2、本研究深度訪談概況.....	77
表 4-2-1、〈初心不變《上下游》對烏魚報導的說明〉.....	132

圖目錄

圖 2-5-1、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向.....	70
圖 4-1-1、《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內部編制與角色流動.....	84
圖 4-1-2、馮小非於報導下方留言回應 248 農學市集創辦人楊儒門.....	96
圖 4-1-3、上下游新聞臉書粉絲專頁新聞行銷案例.....	106
圖 4-1-4、陳吉仲於〈重大變化！檢討 42 年保價收購 試辦直接給付〉報導留言....	108
圖 4-1-5、報導修改版本比較.....	108
圖 4-2-1、上下游新聞徵人啟事.....	128
圖 4-2-2、上下游新聞與讀者的互動案例.....	134
圖 4-3-1、擷取自上下游新聞臉書虛擬編輯台.....	15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2015 年第十四屆卓越新聞獎的入圍名單中，出現幾個非隸屬於一般主流媒體的名字，獨立記者朱淑娟、廖芸婕及林龍吟，分別入圍平面類專題新聞獎；焦點事件的孫窮理入圍平面類新聞評論獎；上下游新聞市集的汪文豪、林慧貞、簡嘉穎入圍平面類調查報導獎；獨立紀錄片導演李惠仁則入圍電視類專題新聞獎。其中，朱淑娟以〈大旱望雨 尋找幸福的水台灣〉系列報導在 76 件報名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當年度平面類專題新聞獎。這類「非主流」媒體的數量、規模、資源皆遠不及在台灣媒體版圖中居處優勢地位的主流媒體，在這樣的情況下，非主流媒體能夠在有著「台灣新聞界最高榮譽」之稱的卓越新聞獎擁有如此成績已屬不易。

非主流媒體的出現與主流媒體的日益商業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媒體為了在競爭日愈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就得靠規模經濟提升自身競爭力，加上電子媒體營運成本極為龐大，除了資本雄厚的財團，一般大眾無法輕易涉足。當規模經濟到達一定程度，進入媒體市場的難度也會隨之提升，而已經在市場內的媒體更會朝向合併 (merging) 與收購 (Acquisition) 發展 (Graham & Davies, 1997)，媒體所有權集中化便是萌生於如此市場導向的產業環境。

另一方面，在追求利益動機的驅使下，新聞媒體向政治與商業力量妥協，不僅影響著閱聽人每日接受消化的新聞資訊，更對於社會整體的民主發展造成莫大威脅，資訊的公開流通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儘管我們看似擁有多元開放的媒體選擇，但這些傳播管道仍多掌控在財團與政治力量手中，不免讓人擔憂民主社會未來的發展。非主流媒體的實踐或許可被視作對於上述媒體商業化、所有權集中化

的一種反動，他們作為一種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另類 (alternative)」，打破既有的媒體框架，獨立於市場邏輯與政治力量，持續為新聞理念與公眾利益而努力。

近幾年，亞洲地區也出現許多非主流媒體，他們有很多名稱：獨立媒體、另類媒體、草根媒體、激進媒體等，從韓國的《打破新聞》、馬來西亞的《當今大馬》、澳門的《愛瞞日報》、香港的《立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網》到台灣的《沃草》、《公民行動紀錄影音資料庫》、《上下游新聞市集》、《苦勞網》、《報導者》、《移人》、《焦點事件》等，他們在各自的土地深耕，站在權力的對立面監督政府與財團，對於長期的公共議題論述與討論起了關鍵作用。

相較於一般大眾熟悉的主流媒體，非主流媒體展現許多異於彼的另類特質，因此在西方的研究中，多以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media) 稱之。另類媒體不依循資本主義經營邏輯、不從主流觀點看待議題、不依傳統方法行事、追求媒體近用與參與、重視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與觀點，是一種奠基在反權力壓迫理念之上的非營利性質媒體 (Fontes, 2010)。在組織結構上，另類媒體的所有權獨立、以小規模經營、內部決策民主化、組織結構扁平 (Downing, 2001; Atton, 2003)。

由於過往學者多聚焦於這類媒體如何在主流媒體的對立面發揮影響力 (Rauch, 2015)，使得傳播領域研究中，「另類」一詞的使用較「獨立」來得廣泛，但在華人社會中較常以獨立媒體 (independent media) 來稱呼這些非主流媒體 (管中祥, 2015: 11)。獨立媒體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 1999 年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中，參與運動的媒體工作者試圖建立一個對抗主流媒體霸權之外的傳播管道，因而自發性的創建《獨立媒體中心》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成露茜, 2009)。後來「獨立媒體」被用來泛指那些與資本所主導的媒體相對、獨立於政商力量之外的媒體。《香港獨立媒體網》創辦人葉蔭聰指出，獨立媒體指的是在財務上獨立於政府、政黨與財團之外、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並在內部編採上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的媒體組織 (葉蔭聰, 2009: 223)。無論使用哪個名詞指涉這些新興的非主流媒體，他們大抵上都有著相似的特質：是基進的、公民的、獨立的、自治的、

強調參與及對話的 (Rauch, 2015)。

第二節、問題意識

研究者對於另類／獨立媒體研究的興趣來自個人在社團法人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的工作經驗，研究者在因緣際會下進入該協會擔任執行秘書，除一般行政工作外，還扮演著推動組織內外溝通交流的角色，經常代替協會理事與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聯繫，並舉辦各式課程講座促進獨立媒體圈與一般大眾的交流。因職務使然，經常有人詢問研究者：「到底甚麼是獨立媒體？」我總會搬出人們耳熟能詳的說法：「獨立媒體就是獨立於政黨或財團之外的媒體」，起先這種回答方式已足以回應他人的疑惑，但隨著網路原生媒體的蓬勃發展，這套說詞開始受到挑戰。

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網路媒體的發展模糊了主流媒體和另類／獨立媒體之間的界線，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彈性且流動的光譜關係 (Atton, 2003; Rauch, 2015)。許多另類／獨立媒體展現出混合另類與主流的媒體特質，像是在內容上報導弱勢與基進議題、講求報導專業化及深度，同時採用相似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規格、組織化的工作常規等。Rauch (2015) 因而主張，「另類」應該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另類／獨立媒體研究者不能簡單的將「另類」視為對某些主流媒體特質的反抗，必須更細緻地關注產製者的意圖與實踐差異。葉蔭聰也提到：「愈來愈多的媒體其『獨立性』愈來愈複雜，按任何標準都難以說明清楚。」(葉蔭聰, 2015: 21)。當今這些自外於主流的另一類／獨立媒體所展現的「另類」、「獨立」，已非一句「獨立於政黨或財團之外」可以解釋，許多媒體所展現的新聞實踐也都溢出既有的另類媒體定義。

再者，研究者與獨立媒體組織或工作者接觸的過程中也發現，從事另類／獨立媒體工作的記者並不在乎外界如何區分主流、另類或獨立，曾有一位從事另類／獨立媒體工作長達十餘年的記者對研究者表示：「我就是個媒體，為什麼前面

一定要加上一個冠詞呢？」對他們來說，大眾、研究者或相關理論如何為他們進行分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就是在「做媒體」，唯有從每日的實踐中才能真正體現他們是誰。

另一方面，另類／獨立媒體實踐所體現的新聞學，是一種對於主流新聞學的批判，試著藉由另類的媒體實踐告訴其他新聞工作者：「新聞可以如何不同？有哪些可能？」(Harcup, 2015)，研究者所接觸到的獨立記者中，有許多人便是抱持這種「用不同方法實踐同一理念」的態度，試著在主流媒體外另闢天地，找尋跳脫傳統新聞學框架的媒體實踐方式。記者朱淑娟在「獨立」從事報導工作的六年裡，共獲得 4 座卓新獎獎座，她在 2015 年的得獎感言中提到自己開始當獨立記者後，的確產出較多優質的報導，但這並不代表過去在主流媒體的自己對工作投入較少，她提到「一個記者會因工作模式不同，報導品質產生相當大的落差。」

(朱淑娟，2015 年 11 月 18 日)。要回答資源與規模遠不如一般商業媒體的另類／獨立媒體，之所以可在台灣媒體版圖中占有一席之地、屢屢獲得新聞獎項的肯定，答案或許就深藏在朱淑娟所提到的模式，這些模式無法藉由理論定義描繪，必須深入新聞工作者每日實作場域才能發掘。

Downing (2001) 也提到另類／獨立媒體的實踐方式並非穩定不變，必然受到新聞工作者個人經驗、從業經歷與所處情境所影響。因此我們無法期待能夠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來看待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不同的境遇與情境會孕育出不同的實踐樣貌，若僅用理論定義來檢視他們，將會錯失潛藏在新聞工作者實踐經驗中的多樣性。再者，這些媒體所展現的「獨立」與「另類」不僅因組織架構、經營形式、產出內容而有所差異，新聞工作者對於記者角色的認知同時也影響著另類媒體的實踐方式 (Atton, 2003; Rauch, 2015)。

然而，既有文獻多就另類／獨立媒體的外顯特質如組織結構、內容形式進行探究 (Atton, 2003; Rauch, 2015)，未能走入新聞工作者實際的工作場域，從工作者的實作中理解另類／獨立媒體的行動者是誰、他們如何實作、又是怎麼從實作

中體現他們的「獨立」與「另類」。再加上不同地區的社會情境會發展出不同型態的另類／獨立媒體，但目前台灣對於另類／獨立媒體的理解多援引西方學者在相關概念上的定義，這只能幫助我們理解這類媒體大致上的輪廓，未能讓我們從在地經驗出發，深刻理解工作者如何與情境互動、如何在台灣的社會情境中發展、開拓新聞工作。

綜觀上述三點可以發現，儘管使用既有的理論或定義來理解另類／獨立媒體，可以幫助後進研究者建立對於這些媒體的初步認識，但由於理論定義缺乏與時俱進、因地制宜的彈性，另類／獨立媒體經常輕易地被劃分成一個具有同樣特質的整體，忽略潛藏在「另類」、「獨立」之名下，媒體變化萬千的實踐樣態。研究者認為如此實踐樣態唯有透過進入另類／獨立媒體的日常工作場域才有可能發掘。有鑑於另類／獨立媒體研究目前仍缺乏以圈內人觀點出發的田野探勘，本研究因而想要深入另類／獨立媒體記者的新聞工作場域，由他們作為發話者闡述自己的故事，深描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日常中的新聞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的情境下，有較多以新聞專業轉化的另類／獨立媒體（葉蔭聰，2015：21），像是《上下游新聞市集》、《苦勞網》、《焦點事件》以及《台灣立報社》等，近幾年這些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專業表現亮眼，在推動公共議題討論、促成社會行動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有越來越多新聞工作者投入其中，有的是加入既有另類／獨立媒體組織或成為獨立記者；有的是自行創辦新的另類／獨立媒體（管中祥，2015）。這些報導公共議題的另類／獨立媒體不僅產出許多有質量的報導，更豐富了近幾年台灣新聞媒體的實踐面貌。

基於研究者對於新聞工作的關懷，本研究將特別關注以新聞專業自許的另類／獨立媒體，研究者認為從媒體發展的宏觀視野來看，另類／獨立媒體的茁壯，不僅有助於深化台灣社會的民主內涵，更可透過各種方式促成另類／獨立媒體與主流媒體之間的互動與對話，使對社會發展有益的媒體實踐經驗能夠被保留在台灣新聞媒體的基因內、拓展新聞實踐模式的不同可能。如此主流與另類／獨立相

互截長取短的模式，就如同主流音樂與地下音樂的共生，兩者相互影響與學習，在潛移默化中深化台灣音樂產業的內涵。

第三節、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另類／獨立媒體會受到所處社會脈絡、媒體產業結構、工作者的從業經驗、對新聞價值的理解等因素的影響，因而發展出不同的新聞實踐面貌。另類／獨立媒體沒有一套可以固定複製的實踐模式，工作者多是在日常工作中邊做邊學，找出適合媒體自身與報導議題特性的新聞實踐樣態（朱淑娟，2016；郭佩君，2010）。因此，若僅由既有的理論定義去理解另類／獨立媒體，我們只能知道「這個媒體和那個媒體屬於不同類、這個媒體和這個媒體屬於同一類」，卻忽略潛藏在「不同」與「相同」之下的異質性，更無法得知異質性背後的意義。

但過去的研究多就另類／獨立媒體的外顯特質如組織結構、內容形式進行探究，或者嘗試從現象中找出概念和通則，提出一套能夠反映時下另類／獨立媒體特質的定義框架（Atton, 2003; Rauch, 2015）。一個媒體之所以會被稱為另類／獨立媒體，並不單單只是因為他們的報導內容、組織結構符合學界對另類／獨立媒體的定義，另類媒體之所以「另類」，植基於工作者每日的新聞工作實踐中。因此，唯有進入到另類／獨立媒體的日常工作實踐中，我們才有可能知道他們何以做新聞、怎麼做新聞、如何另類／獨立。考慮到理論定義無法反應不同時空脈絡下的另類媒體實踐樣態與異質性，研究者因而希望藉著走入另類／獨立媒體實際的工作場域，以圈內人觀點出發深描他們的新聞實踐。

另類／獨立媒體存在於一個開放的社會系統，隨著政經環境、媒介生態、組織經營方針、內部人事的不同，媒體的新聞實踐面貌勢必會有所差異，並在諸多互動中建／重構自己的面貌，Downing（2001）因而特別提醒，研究另類媒體時必須特別重視研究對象所處的脈絡。面對隨時因應脈絡差異而產生「改變」的另類媒體，過往另類／獨立媒體研究所採行的做法是試圖藉由捕捉特定脈絡下的媒

體實踐面貌、從中抽譯出某些共通特質，進而發展成理論見解。這些研究發現或許可以如實映照彼時彼地的另類媒體，但隨著時空脈絡的轉換，理論定義便會與實際的另類／獨立媒體實踐面貌產生落差。

因此，若想藉由田野探勘如實描繪他們的實踐樣貌，使研究者和讀者得以更加貼近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研究者不能再採用過往的研究取徑、試圖凝固此時此地的另類／獨立面貌，因為另類媒體隨時都在因應著內外環境的異動而產生改變，如只是用靜態的鏡頭捕捉媒體當下的「存有 (being)」，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發覺研究發現無法如實反映彼時彼地的另類／獨立媒體實踐樣態，落入「不夠用」、「過時」的窘境。

另一方面，主流媒體組織通常都具有一定規模、內部結構複雜，各科層互相牽引的經營方式，使得主流媒體較難即時反應外在世界的變化。再者，主流媒體著眼於數量龐大且同質性高的閱聽眾、以此獲取較大規模的經濟利益，這使得主流媒體報導以一般性的政治、社會、經濟議題為主，忽視或遺漏小眾、非主流議題。隨著社會文化日趨多元，主流媒體無法靈活地照應不同社會群體對於內容傳播的需求。另類／獨立媒體不受固定結構、形式限制的特質，使這類媒體可以更為靈敏地回應社會的變化與需求，在生成過程中與社會相互牽絆，與各種力量發展出既合作有對抗的動態關係。

面對不斷生成、改變的另類媒體，研究者勢必得採用一種與另類／獨立媒體的「變」共處的研究取徑，除了深入田野描繪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面貌外，還需進一步關注另類／獨立媒體產生「變」的生成過程。對此，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 提到以塊莖思維 (rhizome) 的生成邏輯看待另類媒體的發展，可以幫助研究者以動態視角發掘另類媒體如何繁殖、變形、聚合、分裂與連結、如何逾越既有疆域、如何聚攏各種功能與效果。林藹雲、葉蔭聰 (2009: 1) 也認為使用塊莖可以凸顯獨立媒體的集合與網絡特質，彰顯獨立媒體的多重、去中心化、分裂與連結。

塊莖思維強調塊莖體的異質、難以捉摸與偶然性（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以生成邏輯探詢塊莖體何以發展至此，並強調塊莖體隨時都有再度分裂、連結、重組或重生的可能。塊莖思維將「變」是為一種必然的常態、不將發展穩固的理論見解作為研究目的，轉而重視塊莖體的生成過程，從塊莖思維研究以「變」為特色的另類／獨立媒體，可以幫助研究者採用動態且彈性的視角關注另類媒體的各種變動、追蹤另類媒體的生成過程，像是產製方式的改變、網絡的流動、媒體的分裂、連結與重生等。

儘管由以塊莖思維進行的研究同樣只能映照此時此地的另類／獨立媒體，但其中描繪的生成過程，仍能幫助研究者與讀者以一種異於穩固理論定義的動態視角，追蹤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在新聞實踐過程中的種種足跡，藉此更加貼近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的工作面貌。也因為肯認「變」是一種常態，所以塊莖思維出發的研究不會宣稱研究結果已經穩固且具普遍性，隨著時空的轉換，塊莖體所展現的連結網絡與生成勢必也會有所不同，研究者能做的就是藉由此時此地的研究發現，捕捉塊莖體至今生成的動態過程，藉此提供後續研究者或讀者一個重新理解、認識另類／獨立媒體的視角。

當研究者決定以動態視角關注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著重媒體的生成與異質性時，就不能再將另類／獨立媒體視為可被化約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必須強調每個另類／獨立媒體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成過程。本研究無法提出一套詮釋本地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的理論，反之，研究者可以透過田野探勘呈現個別另類媒體在不同因緣際會下所生成的實驗樣態、展示其與眾不同的生成過程與異質性。因此，在選擇研究對象時，研究者並不會求多求廣，而是希望藉由單一另類／獨立媒體的實踐案例，呈現作為塊莖的另類媒體生處在何種經緯萬端的網絡、如何與網絡中的各種勢力互動、如何生成、如何建／重構自身的新聞實踐面貌。

在田野觀察對象的選擇上，研究者考慮到組織歷來發展、內部工作方式、工作者聘僱型態與財務來源等因素，將以《上下游新聞市集》做為田野研究對象。

《上下游新聞市集》自 2011 年成立以來，展現許多超乎既有印象的另類媒體實踐特質，像是採社會企業方式經營、與主流媒體合作等。再者，面對政經環境、傳播科技與台灣媒體環境的變遷，《上下游新聞市集》保持隨時變動的彈性以因應各種外在世界變化，當組織內部有所異動時，工作者也經常調整新聞工作方式，試圖從各種嘗試中找到切合當時情境的實踐模式。即便《上下游新聞市集》無法代表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但其多元且異質的新聞實踐仍可展示另類／獨立媒體面對不斷變動的內外情境，如何進行新聞實踐？如何生「變」？如何生成？。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並非試圖藉由塊莖思維與研究對象的案例，去證明另類／獨立媒體的「變」，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已經肯認另類／獨立媒體的變動性。反之，研究者想做的是以塊莖思維為視角，一方面挖掘另類／獨立媒體異質的新聞實踐面貌；另一方面依循另類／獨立媒體在變動過程中留下的線索，捕捉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的生成過程。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新聞專業規範的流變與反思

如前章所述，本文將另類媒體視為對於傳統新聞專業規範所提及之「新聞是甚麼？新聞應該如何實踐？」等工作樣態預設的挑戰，若將傳統新聞專業規範視為既存疆域，另類／獨立媒體便是從疆域逃逸的塊莖體，在游走於疆域內外的過程中，一方面與新聞專業規範對抗、另一方面從中汲取某些既有特質。因此本節會先說明新聞專業規範形成的演變與意涵、台灣的新聞媒體如何挪用新聞專業規範；接著再談新聞專業規範的實踐困境，以及本文所關注的另類媒體如何看待新聞專業規範。

一、新聞，一個逐漸體現的「專業」

(一) 新聞的專業化與專業規範

現代新聞業萌生於 18 世紀中後，彼時自由主義思潮對於民主、自由、理性與批判的重視，加上工業革命促進社會產生激烈的變動，使中產階級需要更多與政治或市場有關的最新消息。該時郵政流通系統的建置、印刷術的普及與識字率的提升，也都為新聞報紙提供快速發展的契機(彭芸，2008；Halin & Mancini, 2004／展江、陳娟譯，2012)。

新聞的基本功能是「提供資訊使人自由與自我管理」(彭芸，2008：13)，藉著告知閱聽眾生活所需資訊，協助社會日常生活正常運作、創造社會的共同知識。根據 Carey (2007；轉引自彭芸，2008：9) 的說法，新聞是一種可以發揮政治影響力的論述形式，是大眾型塑與發表言論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新聞應該是什麼？新聞有哪些功能？新聞專業是甚麼？記者應該做些甚麼？」的定

義與解讀並非穩定不變，不同時空的政經結構、媒介體制、流行思潮、社會對於媒體角色的解讀與期待，都會促使新聞發展出不同的內涵，並產生樣貌殊異的專業規範、實踐方式與常規（劉昌德，2007；張文強，2015）。舉例來說，現代新聞業之所以特別強調新聞的公共服務性質，一方面深受 20 世紀初期盛行於美國的進步主義所影響，當時的新聞業援引進步主義對社會進步與公共服務的強調，將新聞的本質定調為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則是民主思維在 20 世紀初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社會期待新聞成為替大眾服務、爭取公共利益及揭發權貴腐敗的社會公器，藉此促進民主社會的發展與穩固；而在新聞往專業化邁進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也依賴「新聞是服務公共」的宣稱，藉此建立起新聞的自主與權威性（彭芸，2008：12；Halin & Mancini, 2004／展江、陳娟譯，2012：36；姜華，2014：142-152）。三方力量的相互交織，讓公共服務成為現代新聞業的重要角色功能。

回到現代新聞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我們對於新聞角色功能的認知，大多可以反映當時社會對於「新聞為誰服務」的認知（彭芸，2008：14）。18 世紀中後，現代報業萌生之時，新聞扮演著鼓吹辯論、提供大眾公領域對話題材的角色。當時大部分的媒體都是依靠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支持才得以創立，報紙本身的黨派色彩濃厚，因此除了提供訊息及娛樂外，報紙還有著鼓吹特定政治行動的功用。到了 19 世紀末，商業化報業開始出現，在經濟利益的考量下，報紙為了擴大讀者市場、爭取更多的廣告客戶，因此在內容上捨棄過往採特定黨派立場的報導方式，轉而追求客觀中立的內容，希望能藉此爭取到不同黨派立場的閱聽眾（Halin & Mancini, 2004／展江、陳娟譯，2012）。然而，儘管此時期的新聞業開始重視報導的客觀中立，但許多報社依然未擺脫政治黨派的控制，新聞仍直接或間接地與政治黨派相關、具有為特定政治立場服務的色彩。

直到 20 世紀初，隨著民主思潮的盛行，新聞與國家、公共領域的連結愈發緊密，新聞的角色也從為政治黨派服務轉為替市民服務。彭芸（2008）指出，由

於新聞可以提供資訊與知識，讓大眾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擁有足夠的資訊做為判斷依據，並使大眾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員，新聞因而被認為對民主有積極性作用，功能也被定調為「告知與教育大眾、監督政府施政」。新聞更在當時進步主義重視專業與公共服務的浪潮下，發展出現代新聞學的專業規範。專業技術知識取代黨派立場，成為新聞工作的核心。

將新聞連結到民主的論述，背後預設資訊流通對於民主的發展影響重大，因為一個國家的民主自由是否可以穩固發展，端看民眾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進行決策並檢視政府的所作所為，而新聞作為一個傳播資訊的載具，便有著啟迪與告知大眾的功能。再者，民主社會也需要一個能夠監督、調查有權者的獨立機構，新聞可以透過監視有權者、調查與查證公共議題，為大眾「看門」、成為監督政府的「看門狗」，新聞因而被視為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張文強（2015：3）指出，鑒於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發展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新聞理應成為社會公器，而非黨派工具，理性地報導公共議題，為民主和公共服務。

新聞的功能之一在於鞏固民主、為民主制度奠定基石，此一特殊性提供新聞業一個與其他職業相互區隔的界線，並為新聞的專業化取得適格性。新聞業也主張唯有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專業，新聞記者才能不受外力影響地完成報導工作、藉著報導促進民主社會的發展，這也是民主國家之所以會立法保障新聞自由的原因。張讚國（2013）提到，在美國新聞是唯一一個受到憲法所保障的行業，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對於新聞自由的揭示，確保了新聞媒體在傳播過程中的自主性。

新聞的「專業化」最早出現在美國社會。19 世紀末以降，政黨的政治力量式微，媒體組織逐漸遠離政黨的控制，新聞業為了穩固自身的地位，引入專業標準、建立公共服務的角色功能，並承諾新聞業會擔負社會責任，加上當時的報業在反省黃色新聞時期的浪潮中，企圖擺脫小報聳動的扒糞式內容，因此主張新聞應該報導事實，並衍生出「新聞做為一種專業」的論述。到了 20 世紀初，美國社會尊崇科學與菁英主義的思潮，更提供新聞的「專業化」一個發展的沃土，新聞組

織在此脈絡下訂定許多程序化的工作守則與倫理規範（劉昌德，2007；張讚國，2013；張文強，2015）。當時的美國新聞界提出以「客觀性」與「社會責任」為核心的新聞專業規範，並衍生出「忠於事實」、「獨立於報導對象」、「保持客觀中立」、「以專業考量評斷新聞價值」、「積極調查與查明真相」、「重視公共服務」等工作倫理（彭芸，2008：12）。劉昌德指出（2007：113），所謂的「專業規範（Professional Norms）」指的是實踐新聞專業的觀念、倫理、共識與工作守則。

其中，驅使「客觀性」成為新聞專業規範核心的動力有三。首先，18世紀報紙剛出現之時，報業深受黨派影響，內容取材上對意見的偏好遠多於事實陳述，所以新聞工作者對於報紙客觀與否並不重視。到了19世紀中期，美聯社等現代通訊社基於內容銷售最大化的市場考量，開始區分報導、評論與意見，發展出單純陳述事實的報導方式，以便將內容提供給不同黨派立場的報紙；再者，當時的報業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報紙為了擴大銷售量、獲得廣告商的青睞，所以捨棄過往採特定黨派立場的內容取向，並逐漸擺脫報業的黨派色彩，發展出中立、不具黨派立場的報導，企圖以中立的內容爭取不同黨派立場的閱聽眾；其三為新興報業在黃色新聞時期的反省浪潮中，除了強調報導應基於事實外，更促使新聞業將客觀性視為新聞專業規範的核心（張文強，2015；彭芸，2008：9；劉昌德，2007：117-118）。

另一方面，新聞專業規範對「社會責任」的強調則是源自哈欽森委員會（The Hutchins Commission）於1947年發表的《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Baker（2002／馮建三譯，2008：192）提到，這份報告提出新聞傳播應以服務社會公眾為主要目標的「社會責任論」，強調媒體的責任在於產製客觀報導、成為公共討論的共同載具、構成社會的多元圖像、傳遞社會共有價值與目標、提供日常資訊等。為了回應這些角色責任，新聞應該提供客觀中立的資訊、透過報導啟蒙公眾並監督政府。

然而，儘管新聞業藉著新聞的民主意涵取得專業化的適格性，並隨著內部實踐經驗的累積，發展出獨樹一格的組織、行規、道德規範、專門的知識理論與教育系所，但職業的專業化需從長時間的教育訓練與經驗累積中，取得系統性的知識。新聞業缺乏具排他性的專業知識與制式化規範，新聞工作者也不需要通過職業考試取得從業資格，這使得新聞業難以建立醫業或法律業等傳統專業的權威性，外界對於新聞專業性地位的質疑與否定也時有耳聞（彭芸，2008：44）。

衡量一個職業究竟是否為專業，可以從三個面向的指標來檢視（羅文輝，1993：3；Halin & Mancini, 2004／展江、陳娟譯，2012：34-36）：

1. 知識及獨特的專業規範：從業人員從長時間的專業教育與工作經驗累積之中，獲得某些與工作相關的特殊知識與技能，並藉著這些知識技能與行規，將內部從業人員組織成一個整體。
2. 自治：從業人員能不受外力干預，獨立自主，從而證明從業人員在工作實踐的過程中，擁有較大的主控權。
3. 道德：職業內部具有自律功能的同業組織與共同道德規範，且從業人員以公共服務為職業取向並具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

若從以上三項職業專業化指標檢視，新聞業似乎只具有部分的專業特質，因為儘管目前已有許多專業的系所與新聞理論，但在專業知識上仍缺乏如醫業或法律業的權威特質，新聞工作者也不一定要受專業系所的新聞教育。再者，即使許多國家都將保障新聞自由納入憲法條文中，但新聞業受商業及政治力量左右的事件仍層出不窮，新聞工作者也無法完全掌控產製過程中的實踐方法，未能達到完全的自治。

因此，為了合理化「新聞應該成為一個專業」的宣稱，新聞業大多引用新聞工作本身公共利益導向、對社會進步與民主發展有正面影響等特質，來取得職業本身的權威性。Halin & Mancini（2004／展江、陳娟譯，2012：40）也提到新聞的專業化奠基在「體現公共責任」、「具備共同的專業實踐標準」、「重視新聞

專業的獨立自主」等三個基石之上，由此發展出新聞之所以異於其他行業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提到的自治指的不是中立，而是指新聞產製過程中的獨立自主，講究新聞工作者在進行社會判斷過程中的誠信與權威。

再者，單從前面三個職業外顯特質決定職業專業與否並不合理，Hall (1968；轉引自羅文輝，1993：4) 認為還可以從工作者個人的專業態度來評估職業的專業性。所謂的專業態度指的是工作者對於工作的觀點，從個人層面來看，新聞工作者重視專業論理價值、對工作持有責任與使命感，能夠進行獨立的知識判斷、對組織進行批判等工作特質，都符合 Hall 對於專業態度的要求。基於上述原因，羅文輝(1993：7)因而援引 Barber 於 1963 年提出的「逐漸顯現的專業 (Emerging on Marginal professional)」一詞，來指涉現代新聞業逐漸往專業化發展的現象。

(二) 新聞專業規範的在地化

上述美式新聞專業規範與工作守則隨著二戰後美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優勢，輸出至新聞發展後進國家，如：日本與台灣。台灣新聞界約在 1950 年代引入美式新聞專業規範，在挪用的過程中，商業媒體為了在當時社會的政治情境下尋求可被政府接受的合法性，因而順應政府的言論限制，將社會責任論連結到「反共愛國」的意識形態，以報導共產黨陰謀、國家安全與施政等政府希望媒體協助宣傳的議題為主要報導方向，藉此換取可以壟斷市場的特許執照，劉昌德(2007：129) 將此階段的新聞專業規範稱為「侍從責任論」。

到了 1970、1980 年代，經濟快速成長下的市場漸趨開放，政治場域也出現與政府立場相左的異議言論與運動，媒介市場因此陸續出現許多政治異議媒體，如：持有執照的《自立晚報》或挑戰報禁的黨外雜誌《美麗島雜誌》。政治異議媒體批判政府利用「侍從責任論」箝制言論自由，並與侍從媒體聯手隱蔽社會問題，因此政治異議媒體主張在不受政府控制的客觀性前提下，追求社會事實與真相，並另外發展出一套以「黨派中立」、「注重本土」、「追求被政府掩蓋的事實」的新聞專業規範（劉昌德，2007：132）。然而，政治異議媒體的主要目標

是政治改革而非媒體改革，因此未能對媒介體系的變革產生深刻的影響。

爾後隨著政治解嚴、報禁開放，且商業力量尚未成為媒介體制的宰制性力量，新聞工作者取得了更多發言的空間，也開始反思侍從責任論下的媒介角色。1994年隨著《自立晚報》經營權轉移，內部員工為了維護編採自主，因而推動內部新聞編輯公約，並催生台灣第一個新聞專業組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簡稱記協），記協隨後發表的〈新聞倫理公約〉，可被視為台灣首起由新聞工作者自主發起的專業規範運動，內容主張媒介須獨立於政治與經濟力量、報導必須真實等原則，並重視與採訪對象的關係（劉昌德，2007：134-135）。在這波新聞改造行動中，新聞媒體開始從政治威權中解放，並在日常工作職守中融入事實、客觀、社會責任等概念，建立起台灣新聞工作專業化的基礎。張文強（2015）以「農耕型」稱呼此時期的新聞工作實踐樣態，在農耕模型中，報社願意長時間將路線交給記者負責，在這種結構性因素中，記者有較多的時間與意願在各自路線裡經營關係、累積專業知識，藉此換來獨家新聞、調查報導或專業評論，並隨時間累積成記者的名聲。

可惜的是這起自主性的專業規範運動影響力有限，也未能形成一股普及於台灣新聞界的規範性力量。劉昌德（2007：136-139）提到，隨著1990年代後期商業邏輯抬頭，資本力量壓抑新聞專業規範的實踐，而政治場域中的藍綠黨派對立深化，更使得新聞媒體在報導政治議題時經常「先問黨派再問專業」，將新聞專業規範置於腦後。此媒介分化現象除了受到企業主與工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影響外，更是因為以政治立場作為市場區隔的手段有利於商營媒體獲取較多的利潤。新聞專業規範於此不僅無法約束新聞媒體的作為，甚至成為商營媒體挪用為行銷或爭取詮釋權的手段，當外界對媒體的專業性產生質疑時，新聞專業規範經常成為媒體的擋箭牌，阻擋外界對於媒體結構或產製手法的批判目光。

在實際工作場域中，隨著2000年前後報業式微，有線電視取代報紙成為媒體產業中的霸主，「農耕型」被「做電視型」所取代。客觀公正、重視正確事實、

社會公器等特質逐漸消失在電視新聞，並由展演、可拋棄的新聞取而代之；比起新聞專業，觀眾的喜好才是新聞產製過程中最重要的原則。儘管在 1980、1990 年代時，新聞專業規範只能有部分確切落實在實務工作之中，但近幾年的新聞實務工作卻愈發明顯地將新聞專業擱置，用媒體老闆或組織文化希望的方式做新聞。新聞專業規範中「理性、公共、進步」等專業特質，受到資本主義、傳統封建式管理的挑戰，逐漸被個人化、即時、商業化等特質所取代，並展現出不同的工作實踐方式（張文強，2015）。

二、新聞專業規範的挑戰與反思

（一）內外夾攻：新聞專業規範的實踐困境

新聞因特殊的角色功能與民主意涵，發展出一套奠基於「客觀性」與「社會責任」的專業規範，並在經久發展而來的組織行規、道德規範，乃至於養成處所與專業理論之中，逐漸建立自身作為一種專業的權威。然而新聞工作者實踐專業規範的場域並非真空，必然受到所居處的各种情境因素所影響，記者在日復一日的工作實踐中，不僅要採訪事實、產製報導，還要和消息來源、組織主管打交道，更需要與社會、政治團體、媒體組織等結構性因素互動（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在這複雜的產製過程中，由新聞專業規範發展而來的「行規」因此產生質變。

新聞媒體不僅是社會公器，同時也是一個商業機構，必然會受到經濟因素的制約（Halin & Mancini, 2004／展江、陳娟譯，2012）。尤其是 1980 年代過後，大型媒體企業迅速擴張，經濟獲益成為媒體的重要目的，商業媒體對於利益的追求經常大於專業上的考量，新聞專業規範因此受到資本主義邏輯的壓抑。加上廣告市場的競爭者越來越多、電子媒體營運成本提高、閱聽眾習慣的改變等因素使得媒體經營日益困難，媒體經營者為了提升利潤，只好先擱置某些新聞專業規範對於理想新聞工作實踐面貌的勾勒，轉而向商業力量妥協，因此產生置入性行銷、

小報化、速食新聞、言論自我審查等亂象。

此外，媒體也經常受到來自政治領域的干涉，除了政府可以透過法規、發放營運與頻道執照等方式影響媒體運作以外，政黨團體也能藉著自身在政治領域的地位與影響力，與媒體企業主私相授受，促使新聞媒體在利益的考量下傳播特定論述與訊息、迎合黨派利益的需求，而社會上的菁英階級更可挾帶政經上的優勢，透過新聞散佈穩定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建構出符合、強化既有階層化關係的社會（劉昌德，2007；張讚國，2013）。

上述來自商業與政治領域的干涉，有的明目張膽地直接對新聞產製部門下指導棋；有的則是與媒體暗通款曲，以人事管理、控制報導版面等方式，間接影響新聞產製。Halin & Mancini（2004／展江、陳娟譯，2012：36）指出，新聞媒體組織及工作者受到像是政府、政治團體及商業組織等外部力量的影響與控制，這種現象被稱為新聞媒體的「工具化」。新聞工具化將導致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下降，進而無法發揮新聞專業、實踐新聞作為一個社會公器的理想。

政治與商業工具化對於新聞專業規範的威脅隨處可見。例如，在媒體市場導向的驅使下，新聞工作者必須製作出能夠吸引閱聽眾目光的商品，如此一來業務部門才能將閱聽眾賣給廣告商。一味追求大眾偏好內容的結果，造成了新聞內容的同質化，不僅記者未能發揮守門人的專業、為閱聽眾把關新聞資訊，更使得閱聽眾無法從新聞媒體獲得參與民主社會所需的共同知識（Graham & Davies, 1997）。除此之外，政治力量也能透過補助、執照發放與政策管制等手段，與媒介所有者取得同盟，政治力量以手中資源換取新聞組織的服從與支持，使得媒介成為某些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團體的發言人，新聞儼然成為特定政治利益團體的工具，而非社會公器。當商業工具化與政治工具化的力量同時作用於新聞媒體，不僅侵蝕著新聞媒體的專業表現，更令人不免擔憂社會整體民主的發展。

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通常為組織雇員、在組織化的工作場域中產製報導，透過新聞工作才能體現的新聞專業規範，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結構性因素的

影響，而改變原先的實踐樣態。張讚國（2013）認為，在受到商業與政治工具化威脅之餘，新聞工作者也得面對來自工作組織內部的壓力、遭遇各種在工作場域中縝密交織的組織壓力並與之互動。彭芸（2008）指出，現代新聞業多以組織科層結構形式存在，因此內部勢必會產生分層管理與分工的現象，新聞工作者也必須遵守一定的工作規範或常規。加上新聞工作性質特殊，需要和不斷變動的社會互動，組織內的新聞工作者該如何決定應該要採訪哪些新聞、保留哪些內容、如何報導、如何編輯。新聞學中的新聞價值、對客觀中立的要求或許是可能的答案，但第一線的工作者往往更為依賴整個新聞業或組織經久發展而來的慣例或常規，以此作為處理每日新聞工作的依據。

新聞常規（News Routines）是新聞工作者的慣性工作方式，也被視為體現新聞專業規範中客觀中立等理念的實踐方法。從採訪、剪輯、撰寫到報導露出，新聞工作有一套秩序化處理新聞事件的流程，諸如每日固定的路線巡迴、拜訪消息來源、使用官方公關稿等，都是常規的表現，讓記者得以用較有效率、較安全的方式完成每日工作。然而，因為常規在形成的過程中，會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組織的文化與習性，因而給了組織利用常規控制新聞產製的機會，使得新聞工作者的相對自主性隨之下降（張文強，2009）。

劉昌德（2007）也提到，企業主經常因利益考量而加強組織的科層控制，藉此確保產品是企業主與閱聽眾想要看的新聞、提升產製效率。並透過各種人事機制，形塑採編團隊的組成及運作，藉此讓編採團隊產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新聞內容。新聞工作者為了保住工作飯碗，經常得順應企業主的意志與喜好，而新聞室內部主管對於報導內容的期待與預設，更深刻地影響新聞工作者的判斷，記者與編輯為了讓報導能夠獲得長官青睞，不得不揣測上意，依照長官可能會喜歡的角度與形式產製報導。加上組織為追求收視率而迎合大眾喜好的商業目標，更是迫使記者不得不依循一定的規則產製好讀的新聞。

除了受到外在的挑戰，新聞專業規範本身的正當性也受到質疑，質疑大抵來

自兩方面：第一、批判政治經濟學者認為，新聞專業規範是資本主義及社會宰治意識形態的產物，無法實現其所宣稱的公共性目的與社會承諾（彭芸，2008）。第二、Baker（2002／馮建三譯，2008）也提到新聞專業中關於社會責任的論述含有太多菁英論的色彩，此論點所描繪的新聞媒體並無法成為社會各群體抗爭與協商的動員機制。

從批判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的學者指出，社會主要的媒體多以商業化經營，且將營利視為組織重要的營運目標，所以研究者必須將這些媒體視為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一種商業文明，並重視在產製過程中，新聞工作者所面臨的來自市場經濟的壓力（Golding & Murdoch, 1979／馮建三譯，1990：150-154）。尤其在商業媒體中，資本力量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極深，經常可見管理或業務部門對於編採部門的介入。例如，當置入性行銷成為主流媒體重要的收益來源，新聞工作者變相成為履行廣告合約的業務，而非新聞報導者。因此，批判學者認為新聞工作者不可能在資本主義與商業邏輯的包圍下，落實新聞專業規範對於獨立、自主的宣稱。

再者，商業新聞多為組織化製造的產品，新聞工作者並無法自主定義新聞工作的專業性內涵，而是依附在組織之下，以新聞室內部文化所定義的新聞常規行事，甚至在實踐工作常規的過程中，修正個人的價值認知以配合組織文化。McChesney（2004；轉引自羅世宏等譯，2005）因而直接批評「新聞專業」是管理階層包裝出來的產物，目的是為了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替既得利益者服務。

批判學者更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新聞專業規範對於追求真相、社會責任與言論自由價值等核心價值的強調，不僅無助於提升新聞的專業表現，更變相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防火牆，讓資本家或菁英可以阻擋來自其他社會力量對於媒體的干涉，使得非菁英群體無法參與或監督報導的產製，新聞變相成為一種菁英的特權（彭芸，2008；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例如，媒體企業經常使用新聞專業規範作為企業的行銷或辯護手段，當大眾質疑媒體對名人的私生活報導有侵犯個人隱私之虞時，媒體往往以「滿足大眾知的權利」作為回應說法，

滿足大眾知的權利用在新聞專業規範的論述中，是為了實現言論資訊流通的自由，然而在此卻淪為企業卸責的手段，更屏蔽了來自外界的監督與批評。

另一方面，新聞專業規範之所以特別強調媒體的社會責任，背後的預設是大眾需要足夠的資訊與知識做出明智決策，民主才能妥善運行，因此媒介必須承擔傳遞資訊的社會責任，扮演教育、啟蒙公眾的角色。但這種「媒體是教育者，閱聽眾是接受啟蒙者」的定位，卻被批評者認為具有菁英論的色彩，進而產生將閱聽人視為單純接收者的新聞優位角色認知。Baker（2002／馮建三譯，2008）指出，社會責任論期待媒體的功能是提供資訊而非提倡討論，但民主社會的發展不僅需要良好的資訊流通，更需要能夠釐清事理、促成討論的溝通平台。僅僅負責傳遞資訊的媒體，一旦遇到社會衝突時，便無法協助社會的不同群體發展自己的言說、論述甚至動員機制，媒體也不可能如社會責任論所宣稱的「成為公共討論的共同載具並構成社會的多元圖像」。

（二） 挑戰新聞專業規範的另類媒體

承接上點，主流媒體新聞商業化和工具化的現象，使得新聞專業規範的理念與實踐之間產生巨大鴻溝，新聞專業規範不僅難以提升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表現、更無法實踐新聞作為社會公器的理念。然而，儘管傳統新聞專業規範在實踐上遇到困境，大多數的主流媒體還是將之視為「免死金牌」，一旦外界批評新聞產製有失妥當時，媒體總是拿出專業規範作為辯護的論述基石，以專業規範作為擋箭牌，阻擋外界對於媒體內部產製流程的批判目光；當新型態的新聞產製模式出現時，新聞專業規範同樣成為主流媒體評斷這些新嘗試是不是「新聞」的標準，例如，管中祥（2015）曾提到，台灣另類媒體《苦勞網》由於與社運團體關係密切，且報導方式與議題取向異於主流媒體所認定的報導守則，《苦勞網》記者因而被主流媒體記者稱為「假記者」。

但隨著社會情境的改變，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工作場域已不如以往，加上種種新聞專業規範因面臨外界壓力而導致的實踐困境，使得這套誕生於 20 世紀初

的新聞專業規範套用在現今媒體的適用性開始產生動搖。另類／獨立媒體的出現，便是要挑戰商業媒體與傳統新聞專業規範對於新聞實踐樣態與工作守則的慣習與預設，尤其是媒體與政商力量的掛鉤、強調客觀性的偏差、專業且菁英導向的新聞實踐、新聞消息來源的偏好、受商業箝制的新聞價值判斷等（Albert, 1997; Atton & Hamilton, 2008），以下會逐一說明另類／獨立媒體如何看待上述依專業規範而生的新聞工作守則。

首先，Atton & Hamilton（2008）指出，另類媒體所實踐的新聞學認為，所有的報導皆不可能完全不受個人或組織的價值觀所影響，過往主流媒體強調經營客觀報導所呈現的事實，並不可能反映真實世界的全貌，只能說是某一特定觀點眼中的「事實」。因此，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強調，比起「客觀」，新聞報導應盡可能呈現事實的「多元」面貌，讓多元性取代客觀性，成為另類媒體的報導守則。

當新聞專業規範對於客觀性的強調落實在新聞工作場域，產生了記者必須客觀中立、報導事實、正反雙方要有一樣版面、報導只能陳述受訪者所言、不能有記者分析等工作守則。Baker（2002／馮建三譯，2008）也提到，基於客觀性而生的工作守則儘管立意良善，但新聞產製是一連串的取捨與篩選的進程，每個環節都涉及工作者個人的選擇，而選擇勢必會受到工作者個人的價值視野所影響。即使新聞教育與組織訓練會教導工作者判斷新聞價值的依據，工作者在進行決策的過程中仍舊很難擺脫主觀意識或過往經驗等個人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新聞產製很難做到全然的客觀。

過於強調客觀的結果，也將使得新聞工作者失去監督權勢、挖掘真相的批判力道。Fiske（1989；轉引自 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便認為過往新聞專業所強調的客觀訴求中，隱藏著對於權力和特定立場的偏好，像是在人權議題如：戰爭、種族滅絕的報導上，若過度強調客觀中立，讓壓迫者和受壓迫者擁有同等的地位，反而會讓記者從保持中立，變成壓迫者的幫兇。因此，Fiske認為儘管事實和客觀仍舊是新聞報導的重要原則，但面對爭議性議題時，記者與

其強調客觀中立，不如在新聞中呈現解讀新聞的不同角度或方式，以多元性取代客觀性原則。

獨立記者朱淑娟也提到記者應該盡可能公正客觀地報導，但朱淑娟所說的「公正客觀」並非正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她稱這種作法是一種「假平衡」。真正的客觀是就事論事、根據事實進行分析、忠實地呈現議題脈絡與各方說法、該怎麼批判就怎麼批判、但不輕易在報導中呈現記者個人對事件的評價（郭珮君，2010：94；朱淑娟，2016：135）。換句話說，所謂公正客觀的記者，並非由客觀性原則衍生而出的「中立報導者」，而是透過報導呈現事件完整面貌，分析事件、主動揭發事實，追求報導調查性與分析性的「解釋者」。儘管記者不可能全然客觀，個人立場與價值觀一定會在無形中影響採訪工作，但記者還是應該試著公平的呈現事件的所有訊息，並避免在報導中參雜個人觀點；若真的需要表達記者自己對於事件議題的看法，朱淑娟會在段落最後使用「記者注」，藉此區別個人觀點和報導本身。

第二，媒體需要對於所處社會發生的事件與變遷具有高度敏感度，並將這種敏感度具體落實在報導中。然而商業媒體卻與一般大眾脫節，未能如實反映庶民社會的脈動（張讚國，2013）。此外，記者本身的背景如：學歷、種族、階級等，不僅可能影響記者看待事件的角度與觀點，有時也會在無形中使記者無法和報導對象產生連結，也無法反映自己所報導的社會現狀（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

第三、另類媒體認為，主流媒體在使用消息來源上有著系統性的偏差，經常使用在階級上具有優勢地位的菁英做為消息來源、由他們來主導議題的走向，這將導致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複製與鞏固，且邊緣化社會上的非菁英群體。這種因權力與社會資本而產生的話語權不平等，正是另類媒體欲改善的問題，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強調，媒體的存在目的是提供發聲管道給那些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的社會成員。因此，記者在產製新聞的過程中應該強調弱勢一方的聲音，而不是以掌握

資源的社會菁英作為議題解讀與分析的主要消息來源。(Atton & Wickenden, 2005: 348-349)。

在新聞專業的旗幟下，主流媒體記者為了使報導具有專業性與可靠性，會尋求在社會上具有一定名聲與地位的政商人士、專家學者等社會菁英 (elite)，作為提供報導事件相關訊息或意見的消息來源。使用菁英消息來源的出發點是為了提升報導的可信度與權威性、幫助記者減少報導出錯的可能，因此部分主流媒體將使用菁英消息來源納入具體的工作常規中。成露茜 (2009: 379) 曾提到，在主流媒體具有領導性地位的《天下雜誌》便要求記者進行報導時，必須正反並陳，並採訪到官方、企業和學者三方的說法。

然而在現實的工作場域中，記者受到截稿壓力的影響，經常不加思索地使用這群容易找到且具有影響力的菁英消息來源，引述菁英消息來源成了一種為了工作上的方便而形成的慣性行為。如此傾向使用菁英 (elite) 作為消息來源的慣習，使得具有權威與社會地位的個人或機構成為事件的主要框架者 (Harcup, 2009 / 董素蘭、顧淑馨譯, 2011)。本應替無法發聲的弱勢者實踐話語權的新聞媒體，在專業的旗幟下，反成了替掌握麥克風的菁英擴大發言聲量的工具，由他們來決定事件該如何被理解與詮釋。

有鑑於主流媒體系統性使用菁英消息來源，造成非菁英群體像是社運參與者或弱勢族群的「失聲」，另類媒體因而特別強調自身做為邊緣化族群發聲管道的角色。因此，在另類媒體的報導中，經常可以看到參與者的第一人稱敘述與目擊，並以庶民作為報導的重要消息來源。在台灣另類媒體發展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台灣立報》，在給內部工作者的記者須知中便特別提到，記者的採訪對象必須以事件中直接受影響的人為優先，並盡可能的在報導中回答：「誰支持？誰反對？誰得益？誰受損？」(成露茜, 2009: 379)。

Atton & Wickenden (2005) 針對英國另類媒體《SchNews》進行的調查也發現，另類媒體組織在訓練課程中會特別鼓勵記者使用當地草根組織或是與運動相

關的團體作為消息來源，透過發佈以運動者和庶民為基底的報導，平衡官方消息的宰制性地位。針對報導進行的內容分析也發現，在社會運動相關的另類媒體中，抗議者與草根團體是主要消息來源，佔據絕大部份的報導版面。

最後，針對一則事件是否具備「新聞價值」，在傳統新聞工作守則中大抵可以利用下列 12 項指標進行衡量，一個事件需要符合一個以上的衡量指標，才有可能成為新聞。(Galtung & Ruge, 1965: 70)：

頻率(frequency)、通過一定的強度門檻(threshold)、明確(unambiguity)、意義(meaningfulness，具有文化相似性或其他相關性上)、共鳴(consonance，具可預測性或需求性)、意外(unexpectedness，罕見的、突發的事件)、持續性(continuity)、構成(composition)、與主流國家有關(reference to elite nations)、與精英人士有關(reference to elite people)、與人有關(reference to persons)、與負面相關(reference to something negative)

但就像前面所提，新聞產製是一連串取舍與篩選的過程，每個環節都會涉及工作者個人的判斷，因此新聞價值的衡量同樣深受新聞工作者的主觀經驗影響。記者藉由過往的教育訓練與工作經驗，決定一則新聞是否有報導的價值，但究竟甚麼是有價值的新聞，結果可能因人而異。相同的事件對不同的群體來說，會有不同的意義，對某些人來說很重要的新聞，對另外一群人來說可能微不足道(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例如，關於農地徵收條例的報導可能無法引發從事服務業的閱聽眾產生共鳴，但對於居住在鄉村的農民而言，農地徵收條例就是關乎生存的重要大事。

倘若新聞能正視新聞價值的相對性，並試圖站在不同群體的立場判斷新聞的重要性，那麼關於價值判斷的相對性並不會構成太大的問題。但實際的情形是，記者習慣以目標閱聽眾的思維來衡量新聞價值，尤其是菁英或中產階級，這導致

現今主流媒體經常忽略對市井小民或弱勢團體來說很重要的議題。張讚國(2013)便提到主流媒體對新聞價值的考量早已被商業所箝制,在追求最大數量閱聽人的前提下,目標閱聽眾的喜好成了評斷與取捨新聞是否可以露出的標準,受到利益趨使的察言觀色更降低了訊息可靠性與媒體公信力。

新聞工作者使用同一套價值衡量框架評估新聞報導與否的作法,在內部同質性高、未出現分裂群體的社會中或許已足夠服務所有閱聽眾。然而,現實社會並非如此「和諧」,基於社經地位、性別、族群或職業的因素,社會存在著大小不一、樣態殊異的各種族群,當今媒體評估新聞價值的作法,並無法回應多元族群的需求。對此 Harcup (2009/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主張記者應對抗現有新聞價值,多報導長期議題、融入更多的脈絡、不要害怕報導複雜而不明確的事件、增加對於非主流勢力的報導。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也提到,除了流通一般資訊的傳媒,社會還需要彼此區隔、各持己見、具有特定族群色彩且能夠發揮動員作用的傳媒。

Harcup (2015)提到,針對主流新聞價值可能造成的困境,另類媒體主張採取和主流媒體相異的新聞價值,經常報導主流媒體輕忽或不感興趣的議題,擺脫既有新聞價值的評估框架,關注那些無法出現在主流媒體的群體或弱勢議題、增加他們的曝光度,不僅要滿足群體內部言說與論述的需求,更要幫助群體對外發聲。

第二節、另類媒體與另類媒體新聞學

如同第一章問題意識所提,本文的研究旨趣是希望藉著貼近另類媒體的工作場域,探詢在台灣情境裡的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樣態為何?如何生成?在進入實際工作場域前,研究者除了要知道另類/獨立媒體是甚麼之外,還得取得對另類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的基礎認知,例如在既有的理論定義中,另類媒體如何產製新聞?有哪些特別之處?

因此，本節一開始會先整理過往研究者所提出的另類／獨立媒體定義，以及不同定義之間的差異。接著再整理另類媒體相關研究可能的研究取徑與切入角度。最後耙梳另類媒體新聞學相關文獻，探詢既有研究如何陳述、概念化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和目標意圖。

一、 定義另類媒體

一般而言，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一詞指的是那些外於主流媒體機構與網絡的媒介（Atton & Couldry, 2003），在組織結構、內部運作、報導內容、媒體宗旨與目標、編採邏輯等層面皆和傳統主流媒體價值觀有所出入。他們以促進、履行社會正義為目的，捨棄資本主義邏輯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業常態，以非商業導向的經營模式像是捐贈贊助、群眾募資、閱聽眾訂閱、社會企業化等獨立於市場，使媒體免於受到政治、商業等社會機構的干涉，在內容取向上專注於報導具有社會公共性格、或某些不易於主流媒體出現的議題，並提升弱勢或非菁英的發聲機會（成露茜，2009；管中祥，2015）。

Fontes（2010）提到從 1960 年代後期以來，另類媒體領域的研究者使用各種名詞來指涉這些異於主流的媒體組織，例如：游擊影像、海盜電視、倡議影音、社區媒體、參與媒體、基進媒體、公民媒體、另類媒體、獨立媒體。不同名詞所指涉的意義各有差異。例如，使用「公民媒體」所強調的是另類媒體促使大眾能夠直接再現自己或社群的特質，而使用「獨立媒體」則是突顯出另類媒體外於社會支配性機構的獨立性。各種指涉名詞的差異，反映出另類媒體的多元面貌，也透露出學者在理論化另類媒體實踐、目標、策略以及影響時站立的位置與切入角度。Atton（2002）指出既有的另類媒體研究對於應該使用哪個名詞來稱呼這些媒體未能有一致的見解，一般而言，既有研究較常使用的名詞為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及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

主張使用基進一詞的學者以英國學者 John Downing 最具代表性，Downing (2001) 在《*Radical Media: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這本著作的書名便揭示了他將另類媒體視為激進的、反叛的且連結到社會運動的看法。這裡的「反叛」指的是透過另類媒體對抗政治霸權，同時也是一種對於媒體既有產製方式的反叛，另類媒體在革新內容產製模式的過程中，會引用某些他們對於政治領域的呼籲如，反霸權、水平溝通等概念，將之落實在另類媒體的產製實踐中。

Downing 指出，儘管另類媒體相關研究大多使用「另類 (Alternative)」一詞，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每一個媒體都是另類於其他媒體的存在，例如，相對於主流媒體，以貿易或工業為主題的雜誌也可以算是一種「另類」。因此，儘管「另類」可以凸顯這些媒體在主流媒體之外從事報導工作的對抗性特質，但卻有可能簡化另類媒體的本質、實踐與效果，也未能反映這些媒體最有價值之處——促成社會變革、發揮政治影響力，所以 Downing 主張以「基進 (Radical)」來稱呼這些媒體，藉此強調另類媒體促成社會變革的基進特質 (Downing, 2001: ix-xi)。

另一方面，Chris Atton 則傾向使用「另類 (Alternative)」為這些媒體命名，Atton (2002) 指出另類媒體並不限於政治性或抗爭性的媒體，也存在一些新型態的文化性媒體，他們未必具有基進特質，但確實為傳播實踐開創了不同的可能。當我們使用「基進」稱呼另類媒體時，是將這些媒體視為促成社會變革的行動者，但卻可能因此忽略另類媒體對於多元化新聞實踐面貌的貢獻，而「另類」則可以同時反映另類做法、創新思維以及媒體的社會影響，不僅包括基進、促進社會變革的概念，同時也含括另類的出版形式或組織結構，並凸顯這些媒體在議題上與近用方式上的特殊性。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另類媒體或基進媒體，他們都是外於主流媒體的存在，具有某種對抗霸權 (counter-hegemony) 的意圖，這個霸權有可能是政治上、文化上或媒體領域的霸權。如同當今媒體是中產階級為了挑戰貴族社會支配階層而

促生的產物，另類媒體同樣是為了對抗某些社會支配性力量、促成政治上的社會變革而生。尤其是 1990 年代後社會行動主義的重生，造就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當時的社會波動加上科技變革，促成另類媒體的蓬勃發展。換句話說，另類媒體可以說是為了社會變革而生，因此在社會運動中經常可以看到另類媒體的身影，像是萌生於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的《Indymedia》（Atton & Couldry, 2003）。參與另類媒體的實踐者，有些是為了進行政治性發聲、有些是想要促成基進的社會變革，無論其目的為何，另類媒體都發展出和主流媒體有所不同的媒體面貌，有些甚至直接與主流媒體對抗。

Atton（2002）指出，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主流媒體經常再現特定社會團體的觀點，這些社會團體通常由具權力與影響力的菁英所組成，其他非菁英團體因而被主流媒體邊緣化。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的研究（1976, 轉引自 Atton, 2002:10）便發現政治人物、企業主或企業經理人憑藉著自身權力獲得較多近用媒體的機會，進而影響相關個人或團體該如何被再現，而另類媒體的存在目的便是企圖提供一般平凡大眾及特定弱勢團體，如：勞工、抗議團體等，一個近用媒體的機會，讓這群資本不足的大眾可以透過另類媒體再現自己的面貌、處境與意見。Project Censored（1976, 轉引自 Atton, 2002:11）在 1976 年便透過調查發現，對於主流媒體因政治或商業壓力而不願刊登的議題而言，另類媒體便是他們的歸宿，另類媒體可說是一個露出在主流媒體上看不到的詮釋與訊息的場域。

另類媒體工作者 Micheal Albert（1997）也提到，主流媒體的目標經常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將他們的觀眾賣給廣告主，或著是建構出符合、強化既有階層化社會關係的社會。相反地，另類媒體則將自己視為創新組織與經營媒體、社會運動方式的計劃的一部分，不追求利潤最大化、也不會為了營收而將觀眾賣給廣告主，以推翻既有的階層化社會關係為目標，並且獨立於主要的社會機構之外。

從 John Downing、Chris Atton 與 Micheal Albert 對於另類媒體的觀察可以發現，另類媒體具有某些共同特質，像是不以營利為目的、強調公民近用、報導弱

勢議題等。但由於另類媒體之間的實踐樣態差異很大，每個另類媒體都有自己的運作規則、內容傾向、目標定位與表達方式，所以很難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標準。對於另類媒體在發展理論定義所面臨的困難，Atton（2002）認為一套有結構且可行的定義，勢必得奠基於另類媒體所產出的基進內容之上。也就是說，確保另類媒體的目標在於促成社會進步與變革，是我們在判斷一個媒體是否為另類的思考核心。若定義未能反映另類媒體本身的基進性，那麼這套定義就有改進的空間，例如，另類媒體研究的目錄式書籍《Alternative in Print》曾提出三個審核另類媒體的標準，出版物只要符合其中一個標準，便會被他們視為另類媒體（轉引自 Atton, 2002:13）：

1. 非營利、媒體的產製動力源自對議題的關心，而非利益；
2. 產製以服膺社會責任為原則、強調具創意性的表達方式；
3. 產製者自我標示為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in Print》的審核標準由於未特別強調另類媒體的基進特質，所以某些以非營利方式經營、但未能回應社會整體利益的媒體，像是財團利用基金會模式創立的媒體，也會被歸為另類媒體。財團所創的媒體儘管以非營利方式經營，但卻藉著報導提倡符合財團利益的理念如：全球化、自由貿易等，這種報導並不是為了社會整體的進步著想，而是為了財團私利，那麼他們還能算是另類媒體嗎？對此，Atton（2002：27）提出另一套奠基於基進特質的另類媒體定義，除了強調另類媒體內容促成社會各層面變革的作用外，也涵蓋另類媒體不同於主流媒體的產製特色。這套定義的前三項指標是與內容有關的特徵，後三項指標則與產製和流通過程相關：

1. 內容具有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的基進特質、採用另類的新聞價值；
2. 呈現形式多樣；
3. 印刷方式創新；
4. 傳播平台與網絡另類、不易察覺、反對著作權；

5. 強調社會關係與媒介角色不同既往，如去專業化。並且力求讀者、作者與新聞組織之間關係的改變；
6. 強調水平連結的網絡式傳播過程。

另一方面，將另類媒體稱為基進媒體的 Downing (2001) 則指出，另類媒體指的是以小規模經營且形式各異、表達另類於霸權觀點的視野與見解、促進社會變革的那些媒體。Downing 以 1980 年代美國與蘇聯雙雙宣布要增設核武的爭議事件，說明小規模的另類媒體如何發揮影響力。1980 年代初期，美蘇雙方領導人各自宣布計畫增設以對方為目標的核武，當時兩國的主流媒體大多以雙方領導人的立場做為議題切入角度。然而，此舉引發世界各地的反核武抗議潮，德國的另類媒體甚至大規模地以報導攻擊美蘇的核武競賽，在美國本土也出現一些反核武的紀錄片。各地基進另類媒體在反核武議題的著墨，滋養了相關社會運動與大規模示威，最終迫使美國與蘇聯的領導人在 1987 年的雷克雅維克 (Reykjavik) 高峰會中，討論逐步裁撤核武一事 (Downing, 2001: v-vi)。

Downing (2001) 提到自己在理論化媒體時，刻意同時採取二元對立式與反二元對立的另類媒體定義，目的是為了批判研究當時 (1984 年) 主導傳播領域的兩種媒介組織模型—西方資本主義媒體與蘇聯共產主義媒體。Downing 一方面試圖以不同的理論取徑出發定義另類媒體、嘗試打破「資本主義 vs. 共產主義」此二媒介模型的主導，Downing 奠基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英國馬克思女性主義者、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打下激進另類媒體理論的研究基礎、建立反二元對立的另類媒體定義；另一方面，Downing 也強調另類基進媒體之於主流媒體的對抗性，發展出「主流 vs. 另類」的二元對立式定義，此定義的背景深受冷戰時期各種美蘇對峙的政治事件所影響，促使 Downing 相信另類基進媒體能夠在主流媒體之外，發揮促成政治影響的效果。

但 Downing 特別提醒，單單強調另類媒體對抗性的理論定義，可能會簡化另類媒體的本質與實踐，因此他在 2001 年出版的書籍中，刻意逐點詳細說明為

何另類基進媒體與傳統主流媒體有所不同 (Downing,2001:ix-xi)。

首先，Downing 主張使用「基進 (radical)」一詞來命名這些媒體，藉此強調這些媒體促成社會變革的基進特質。儘管使用「基進」來稱呼這些媒體，可能會將某些宗教媒體、少數族群媒體納入另類媒體的研究範疇內。但平心而論，就算「基進」這個形容詞未能恰如其分地指稱這些媒體，只要研究者可以在名詞之外，考慮媒體的內容與脈絡，也就能夠彌補「基進」一詞可能過於廣泛的缺失。畢竟，評斷一個媒體是否可以被定義為另類基進媒體時，脈絡和產出是最主要的指標。

再者，就位置而言，基進媒體站在一個有利於觀察社會變動或採取行動的位置，可以直接再現反對者的觀點、對抗主流媒體。值得注意的是，當基進媒體處在一個政治高壓的社會、經常受到來自系統的壓制或審查時，這些媒體越有可能會成為與主流媒體對立的媒體，前述美蘇擴核的案例便可說明。

第三，基進另類媒體避免使用具渲染力的內容達成目的，而是藉著基於基進主義的討論深度，促成社會變革。透過另類的內容，一方面垂直地表達來自權力結構下層的反對意見；另一方面建立橫向連結反對力量的網絡。

第四，基進另類媒體的實踐模式極為多元，不同基進媒體之間的實踐模式甚至是互斥的。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實踐模式各異，但基進媒體還是有一些共通點，例如，相較於傳統主流媒體，另類基進媒體組織的內部運作通常皆較為民主，並且試著透過具另類性、基進性的新聞實踐打破某人的規則 (Break somebody's rules.)。

最後，另類基進媒體都是小規模的，且經常資金不足。有些另類媒體生命很短；有些則可以延續數十年。

儘管 Atton 和 Downing 對於應該要使用哪個名詞來稱呼另類媒體有著不同的看法，但他們兩位所提出的另類媒體定義，均奠基在另類媒體促進社會變革的基進性上，並反映出另類媒體獨特的產製方式。也就是說 Atton 和 Downing 所提出的理論定義，大多與另類媒體可能的「影響力」與異於主流媒體的「產製模式」

有關。異於兩者的定義框架，Fontes 則是以另類媒體和其他社會機構的「關係」為基礎，提出定義另類媒體的通用原則。

Fontes (2010) 指出，既有的另類媒體研究可區分為鉅觀與微觀等兩種研究取徑。從鉅觀社會取徑定義另類媒體，會特別注重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對抗、產製對抗性訊息的能力，以及另類媒體建構反霸權社會的角色。鉅觀社會取徑的學者認為，概念化另類媒體的過程中，必須強調另類媒體發展政治化運動的角色能力。微觀取徑的學者則是將研究重心放在另類媒體實踐如何改變個體／團體的主體性與社會日常關係，主張必須經過時間的累積，才能發現另類媒體如何強化草根組織或在地社區的抗爭，進而看到另類媒體的影響力。Downing (2001) 便曾提到，另類媒體可以促進草根團體的團結，並以「慢火 (Slow Burn)」醞釀社會變革的能量、使反抗能量得以延續，並在適當的時機爆發。Fontes 認為，上述兩種取徑都是將另類媒體限縮在特定的脈絡中，這將導致研究者在理論化另類媒體的過程中，忽略另類媒體之間不同的組織形式、操作模式，以及在不同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Fontes (2010: 383) 主張，另類媒體的研究者應該擺脫微觀—鉅觀二分的方式，以幾個通用的原則區分另類媒體，並以不同層級的脈絡，從小團體、社區、特定公共領域、社會運動到國家或國際層面，來看待另類媒體的實踐。這種方式可以避免研究者陷入鉅觀取徑或微觀取徑的兩難抉擇，並專注於另類媒體實踐放置在不同脈絡的關係與突破。

Fontes 認為，另類媒體具有幾個通用的原則。首先，另類媒體實踐奠基於社會團結、拒絕壓迫的倫理道德之上，以公民近用與參與媒介產製為核心宗旨；內容上特別注重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或觀點；在結構與產製層面則是強調媒介產製過程中互動關係與決策的民主化，且不以利益為營運導向、以小規模經營。期待藉由另類的內容與新聞產製方式，建立個體或集體的認同，成為喚醒大眾政治意識、推動政治行動的踏腳石。

從上述三位學者對於另類媒體的定義可以發現，另類媒體具有某些共通的特質，像是產出具基進性的內容、內部運作民主化、以小規模且非營利的方式經營等，但由於研究取徑與切入角度的差異，不同定義之間所強調的另類媒體特質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像是 Downing(2001:v)從媒體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的研究取徑切入，將另類媒體視為可以突破社會霸權規範的行動者，具備凝聚草根對抗性力量並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潛力，有著改革社會的基進意義。Downing 在定義中特別提到另類媒體對抗霸權、促進社會進步的特質，另類媒體以草根行動，直接在報導中再現來自權力結構下層的公民觀點與意見，並藉著報導內容的基進性特質與討論深度推動社會變革。從 Downing 的另類媒體定義可以發現，另類媒體是具有社會運動意義的行動者，一方面藉由自身的對外連結凝聚草根力量、引領公眾自主表達反對意見；一方面以基進的報導突破社會霸權的壟斷與宰制。

另一方面，Atton 則將另類媒體視為同時進行社會改革行動以及新聞實踐創新的機構 (Atton & Hamilton, 2008)，除了從對抗霸權的政治性視野檢視另類媒體透過基進性內容促成社會變革的特質外，Atton 特別強調自己也以新聞學的觀點，將另類媒體視為一種新聞實踐，藉著不同於既往的新聞產製型態，對傳統新聞學常規化與機構化的工作慣例提出質疑。因此 Atton (2002) 在另類媒體定義中，特別強調另類媒體對新聞報導內容與呈現方式，以及組織運作模式進行創新或實驗的特質，透過新型態的新聞產製，挑戰傳統新聞學對於「做新聞 (news-making)」的預設與框架。

不同於 Atton 和 Downing 強調另類媒體促成社會或新聞學變革的特質，Fontes (2010) 提出的定義則是從公民政治參與的角度出發，將公民對另類媒體的近用視為另類媒體新聞實踐的核心，在定義中特別凸顯另類媒體的近用性。Fontes 認為，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積極促成公民在報導中直接陳述他們的目擊、想法或知識，提供公民「以自己的口吻說自己的故事」的機會，使公民可以藉著使用另類媒體參與公共辯論、或是在公共領域進行在再現，進而從微觀的社區

參與，進化到鉅觀的政治參與，提升社會整體的民主素質。

儘管不同學者對於另類媒體的理論定義會因為各自研究所重視的面向與取徑而有所差異，但綜觀 Atton、Downing 與 Fontes 所提出的定義，我們仍可以知道某些另類媒體的共通特徵。另類媒體是一個不以商業利益為營運目的的小規模媒體，在主流媒體之外從事報導工作，企圖以對抗性報導推動社會變革、開創新型態的新聞實踐方式。在產製層面重視組織內部運作的民主化；在媒介角色上強調一般大眾對媒體的近用，主張大眾可以透過參與另類媒體，自主再現；在議題的選擇上採取和主流媒體不同的新聞價值，重視被主流媒經常報導具基進性的內容。最重要的是，另類媒體會因所處脈絡、實踐目標、產製模式等因素的差異，發展出極為多元的實踐樣態。

二、 另類媒體新聞學

承接前一小節，另類媒體期待透過媒體的行動與報導促成社會進步與變革，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另類媒體因而發展出異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實踐面貌。建立在另類媒體實踐經驗之上的另類媒體新聞學（Alternative Journalism），將另類媒體視為一種行動或實踐，而非一種內容形式或組織模式；不單單將另類媒體視作是與主流媒體對抗的機構，更將之視為一種為了翻轉現存社會支配性力量、豐富新聞學內涵的存在。另類媒體新聞學欲透過實踐研究回答「究竟另類媒體如何做新聞？實踐面貌為何？」。

（一） 另類媒體新聞學做為一個研究取徑

Atton & Hamiltom(2008: 1)提到另類媒體不僅可以促成社會的進步與變革，他們所實踐的新聞模式更是挑戰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式、組織結構、議題取向及新聞價值，以及傳統新聞學對於「新聞是甚麼？怎麼做新聞？」的認識論，尤其是消息來源選擇方式、倒金字塔寫作格式、階級化與資本化導向的經營方式、專業且精英導向的新聞實踐、將閱聽人視為接收者的新聞優位角色認知等層面。

Downing (2001) 也提到另類媒體的價值在於促成社會或政治變革的潛力，他將另類媒體視為由政治行動者為了特定政治或社會變革而進行產製的基進媒體。但 Downing 特別強調，將另類媒體視為基進媒體的研究觀點，不能只去看他們傳遞哪些訊息、發揮哪些激進作用，卻不重視另類媒體怎麼產製新聞。因為在發揮政治影響力的過程中，內容儘管重要，但組織所處的脈絡、媒體的運作與產製模式，以及媒體在關係與報導位置上的轉換，同樣在基進媒體透過報導促成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無論是 Downing (2001) 以基進媒體的觀點看待另類媒體實踐，或是 Atton & Hamilton (2008) 將另類媒體視為對傳統新聞學的挑戰，兩者的研究取徑都主張，另類媒體研究除了去看媒介內容如何產生社會影響力外，更應該關注在內容產製過程中，組織內的運作與產製模式、產製者（無論是一般公民或是另類媒體工作者）和其他社會機構的互動、媒體的每日實踐如何影響產製者的認同等新聞實踐面貌。也就是說，當另類媒體研究者在評斷另類媒體是否夠另類時，不能只看這個媒體的產出是否具對抗性、基進性，而不看報導所從出的產製過程與實踐樣態。

然而，Atton (2003) 指出，既有的另類媒體實證研究多著重另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扮演哪些角色，鮮少關心另類媒體如何操作他們的新聞學、另類媒體記者的角色與報導位置，遑論透過研究描繪另類媒體所實踐的新聞面貌。刻意在另類媒體後方加上新聞學這一個名詞，便是希望藉由另類媒體新聞學的研究去填補另類媒體研究中新聞實踐這個主題的不足。Atton 於 2002 發表的書籍《*Alternative Journalism*》便以「另類媒體新聞學 (Alternative journalism)」一詞，來稱呼探究另類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的研究取徑。一般而言，另類媒體新聞學的研究面向大致可分為下列五個面向 (Atton, 2003: 268-271)：

1. 結構與經濟

在討論另類媒體如何實踐新聞前，必須先回到經濟和組織這兩個結構層面來

看另類媒體。對於另類媒體新聞學來說，另類媒體和市場導向主流媒體之間在組織和經濟層面上的實踐差異，能夠反映出另類媒體的意識形態並影響其他層面的新聞實踐面貌。

另類媒體新聞學在組織層面的反階層化、反菁英中心的特質，也透露出另類媒體將「平等的媒體結構」視為媒介重新省思並實踐社會責任的重要前提。這裡的去階層化，所指的不僅是組織內部成員的水平關係，同時也指涉另類媒體與讀者之間的去階層，讀者不再只是單方面的接受記者的內容餵養，也可以反過來參與內容的產製。另類媒體藉由組織的去階層化，避免各層面的媒體近用出現階級化的落差。

2. 另類媒體的發展歷史

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可能早於當前強調特殊化、專業化的現代新聞學。回溯另類媒體發展的歷史，可以幫助研究者挑戰當前主流新聞學對於商業化、專業化、私有化的強調，更可以提升現代另類媒體實踐對於主流媒體的挑戰力道。

3. 記者和讀者關係與角色的轉變

既有另類媒體研究除了探究媒體社會角色的轉變外，也強調記者角色的轉變、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親近且去階層化。尤其在社會運動中，讀者和記者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甚至難以區分兩者。以社區為重心的另類媒體（無論是因興趣而集結的社區或是地理上的社區），經常可見社區成員成為記者，主動再現他們的現實生活。換句話說，在某些另類媒體新聞學的案例中，記者經常也是運動參與者，Atton（2003: 269）將他們稱為“*activist-journalist*”。

在報導上，另類媒體新聞學將社會責任視為報導首要考量，以倡議實踐取代客觀實踐、採用不同風格的報導方式。

4. 草根報導、消息來源

Forde, Foxwell & Meadows (轉引自 Atton, 2003: 270) 認為，鑑於另類媒體對公民近用的重視，我們必須將另類媒體新聞實踐視為一個文化賦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內容產出不是主要目的，幫助社區組織才是重點，另類媒體記者在這個賦權的過程中，不僅產製內容，同時也協助維持社區的文化、創造社區的公共領域、建立社區的群體認同。也就是說，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具備一定程度的對抗性與草根性。

另一方面，傳統新聞的消息來源多為菁英或專業團體，但在另類媒體新聞實踐基於本身的草根傾向，在報導與社群相關的新聞時，社群成員被視為是新聞最為根本的消息來源。

5. 另類媒體與新聞教育

除了上述四個與新聞實踐相關的研究面向外，另類媒體新聞學也關注新聞教育。一般來說，傳統新聞教育忽視另類媒體的理念和實踐，即便提到另類媒體，也只是將之視為特例。Atton (2003) 認為，另類媒體新聞實踐中，公民做為平凡報導者如何再現自身面貌、意見與見證，提供新聞教育一個重塑新聞認識論的機會。Skinner (2001, 轉引自 Aton, 2003: 271) 提到，傳統新聞教育所灌輸新聞價值認知，會讓學生將新聞簡化為一門依規則操作的工藝。透過另類媒體實踐的案例，能夠讓學生有機會重新省思新聞的認識論，並對社會現實的建構產生批判性的思考與反思。

此外，Atton 指出，當前公共媒體因所處情境受資本主義影響很大，即便重視媒體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卻因為市場的力量，而讓公共媒體深受機構化、專業化的大眾媒體所影響。反之，站在圈外的另類媒體比較有機會可以提供新聞教育一個較具批判性與反身性的激進觀點。

另類媒體新聞學研究的目的，便是要透過對於上述幾個研究面向的關注，批判既有新聞學機構化與常規化的工作慣例、提出實踐新聞學的其他作法，並為想在公民的媒體 (citizens' media) 工作的人，提供機會與技能。

(二) 另類媒體新聞學與新聞實踐

Atton & Hamiltom (2008) 提到另類媒體研究不能只關注基進的另類媒體如何影響社會、或另類媒體如何透過公民近用促成個人或集體自覺的崛起，更應該要關注促成這一切目標得以實現的關鍵——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 (journalistic practices) 與產出內容，也就是另類媒體新聞學。Curran & Seaton (1997, 轉引自 Atton & Hamilton, 2008: 125) 提到另類媒體新聞學以小規模甚至是拮据的方式經營；內容產製上，主要關注社會各種因權力造成的不平等，記者在進行報導工作時，會將自己視為促成社會變革的行動者；在對外關係上，和基進或勞工團體保持親密的連結，且顛覆傳統新聞學中記者與閱聽人必須保持相當距離的預設，和閱聽人的關係密切。

而 Atton 與 Hamiltom (2008:125) 所提到的新聞實踐 (journalistic practices)，便是另類媒體體現另類媒體新聞學的實際工作內容，像是組織結構與運作、取材與報導面向、新聞價值、與閱聽人的關係……等與新聞內容產製有關的實踐方式。另類媒體《Z MAGAZINE》的創辦人 Micheal Albert 便根據自身實踐經驗指出，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必須不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不以廣告做為營利來源、努力觸及非菁英閱聽眾、建立一個挑戰既有性別、種族、階級工作結構的場域，並且講求民主化的決策模式，在實踐另類媒體目標的時候避免和企業或商業力量妥協 (Albert, 1997)。以下將分點說明各面向的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

在組織結構上，另類媒體採用非商業導向、小規模的經營模式，企圖讓自己成為一股平衡主流媒體的力量 (Atton & Hamilton, 2008)。「另類媒體」鑒於商業與政治力量對於新聞專業的侵蝕，因而主張媒體應藉著獨立於市場邏輯與政治勢力，實踐新聞理念並爭取社會公義。有別於商業媒體的操作，另類／獨立媒體在結構上獨立於政府、政黨與財團等社會機構之外，不受這些社會機構的控制，不將販售閱聽人或內容做為組織營收的手段，經常以群眾募資、捐款等非營利模式經營。另類媒體希望透過結構與財務上的獨立，確保媒體在內容編採流程中的自

主性（葉蔭聰，2009；Albert, 1997）。

除了強調結構上的獨立外，另類媒體組織也十分重視新聞工作的去階層化、水平化與民主化。Fontes（2010）提到，另類媒體的產製經常是去階層化且對外開放的，例如：關注反全球化議題的另類媒體《Indymedia》，在內容產製上直接去除傳統守門人的審核機制，只要報導者覺得內容足以露出，他都可以直接在組織的網站刊登他們的文章。這種內容傳播形態也就是 Atton（2002: 27）所說的「傳播過程的水平連結」，在另類媒體的傳播過程中，工作者與工作者之間保持著去階級且平等的關係，每一個報導者在產製過程的決策中皆具有同等的決策權力。如此實踐方式，可以避免另類媒體屏除特定的觀點，或刻意區別某些議題。

延續另類媒體新聞實踐對於去階層化與水平化的強調，由於另類媒體記者將自己定位為促成社會變革的行動者，在產製過程中，另類媒體新聞工作者不會將自己視為主導內容產製的專業人士，反之，另類媒體力求和閱聽人關係地去階層化，相較於主流媒體，另類媒體和閱聽人的關係也較為親近。此外在某些另類媒體中，閱聽人也是報導者，兩者之間的界線消失，像是在社區媒體中，經常可見社區成員成為記者（無論是因興趣而集結的社區或是地理上的社區），自行再現他們的現實生活（Atton, 2003）。換句話說，另類媒體的報導者並不限於新聞工作者，也可以是運動組織、對抗性或邊緣性的政治團體、社區成員、甚至是特定領域的粉絲等，這些另類報導者經常是未受過大量專業新聞訓練的業餘人士，以公民、運動者、愛好者的身分發表報導。

此外，由於截稿壓力以及新聞專業論述對於客觀性的追求，主流媒體新聞報導的大量使用菁英作為主要消息來源，導致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複製與鞏固，這種決定消息來源的方式，讓一群容易找到、受人尊重且有信用的菁英團體或機構，透過他們在社會階級上的位置與名聲主導議題的走向，記者也經常使用菁英所提供的架構，作為他們理解事件的起始點。另類媒體作為對抗主流媒體霸權的新聞實踐，提供那些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的人一個能夠發聲的管道，這種反階級的報導

方式是另類媒體實踐中很重要的一環，當這種理念落實在實際的新聞工作中，使另類媒體記者傾向使用庶民（ordinary）的消息來源（Atton & Wickenden, 2005）。

Harcup（2015）也提到「為弱勢發聲」的理念，已經以各種形式內化到另類媒體記者的每日工作，另類媒體記者經常認為自己應該先去問弱勢的一方，而不是掌握資源的菁英，並重新省思自己和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對另類媒體記者而言，訪問就是一種承諾，提供讓鮮少被聽到的民眾有發言的機會，且消息來源的回答不僅會在報導被呈現，更會影響消息來源原先的生活。由社會責任論發展而來的新聞工作規範（Baker, 2001／馮建三譯，2002），為了維護客觀性、確保記者不受消息來源左右報導內容，因而主張記者必須和消息來源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工作規範儘管立意良善，但卻有可能成為一種合理化利用消息來源的藉口，為了避免如此缺失，另類媒體記者在撰寫報導時，會向消息來源確認自己的引用是否有誤，並在採訪當下向消息來源解釋訪問內容會如何被使用（Harcup, 2015）。

在取材與報導面向上，另類媒體在決定「要報導哪些議題？哪些議題具有新聞價值」時，所考慮的不僅是哪些議題足以成為新聞，新聞採集的方式、新聞的報導者以及新聞如何被呈現，都是另類媒體的新聞價值所考量的層面。Atton & Hamilton（2008）認為這種新聞價值的衡量方式，可說是一種對於主流媒體新聞價值所側重的客觀性的挑戰，另類媒體新聞學主張報導不可能毫無偏頗，因為報導不可能完全不受價值觀的影響，無論這個價值觀是個人的或組織的。因此，新聞報導所呈現的「事實」，並不可能反映真實世界的全貌，只能說是某一特定觀點眼中的「事實」，而另類媒體新聞的存在，便是要突破主流媒體對於事實再現的壟斷，藉著另類的新聞報導，盡可能的呈現「事實」的多元面貌。此外，Downing（2001）也提到，另類媒體採用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價值，以公民的觀點作為評斷新聞價值的準則，鼓勵公民產製自己的報導、為自己發聲。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另類媒體的報導者多是不具新聞專業背景的公民，且採取不同於新聞專業規範的新聞價值，但這不代表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就完全不需

要專業新聞工作者的參與，在某些另類媒體新聞學的案例中，仍可發現專業新聞工作者的蹤影。Atton（2002: 16）認為專業工作者可以成為公民的顧問，協助公民完成他們的報導工作，專業新聞工作者的涉入不代表以公民觀點為主的新聞價值就會被抹滅，他們過往的從業經驗能夠協助公民提升報導的完整度與易讀性。韓國另類媒體《OhmyNews》便是一個專業新聞工作者與記者合作，一同進行報導的案例。此外，在台灣的案例中也可以發現許多以新聞專業為號召的另類媒體（葉蔭聰，2015），他們由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組成，基於新聞倫理與專業訓練，產製具一定品質與深度的報導。也就是說，新聞專業雖然不是另類媒體新聞實踐的必備條件，但我們不能說，另類媒體就一定不具新聞專業。

儘管前述詳列許多另類媒體新聞實踐的特質，但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具有高度的偶然性，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都會展現出上述特質（Atton, 2003）。也就是說，另類媒體的實踐方式極為多樣，不會遵循固定的發展套路，會因脈絡的不同而發展出具個別特色的新聞工作形態。

第三節、台灣另類媒體工作者的新聞工作圖像

Downing（2001）提到，新聞工作者所處的社會與文化氛圍等情境因素會影響另類媒體的實踐方式，在不同的脈絡下，另類媒體這一名詞會有不同的名稱與指涉，所展現出來的傳播內涵、組織架構、經營形式、產出內容也不盡相同。由此可見，另類媒體的實踐面貌並不會遵循固定的模式，必然受到另類媒體所處的社會脈絡、新聞工作者對於媒體位置的認知、個人經驗與實作等因素所影響。因此，從另類媒體新聞學觀點出發的經驗性研究，必須將另類媒體放置在個別媒體所處的脈絡中檢視，發掘在地另類媒體新聞實踐潛伏在情境之下的特色。為瞭解台灣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樣貌，本節試圖藉由既存文獻對於台灣獨立／另類媒體新聞工作的描繪，瞭解台灣獨立／另類媒體工作者如何「做新聞」。

由於與另類媒體相關的經驗性研究所關注的實踐面向十分多元，為了妥善比

較不同經驗性研究所呈現的個別面向、豐富各面向的實踐面貌，本文利用 Atton (2003) 對於既有另類媒體新聞學研究面向的整理，包括：結構與經濟、另類媒體的發展歷史、記者和讀者關係與角色的轉變、草根報導與消息來源、新聞教育等，以較為結構化的寫作方式呈現台灣在地豐富的另類媒體實踐面貌。然而，由於本文所關注的是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工作，所以另類媒體對新聞教育的影響並不在本文的研究範疇內，因此本節僅使用前四個面向來整理相關實證研究。此外，相較於香港、中國、澳門等地，台灣有較多以新聞專業為號召的另類媒體，為了瞭解另類媒體如何與新聞專業規範對話、截長補短、甚至是融合，本節因而在 Atton 提出的面向之外，另外新增「另類媒體與新聞專業」這個面向。

一、 台灣另類媒體的發展歷史

台灣另類媒體在主流媒體之外嘗試進行報導的濫觴，最早可回溯至 1950 年代，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威權統治的社會，政治異議者為了爭取言論自由、推翻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制度，因而開始自行創辦異議性報刊或黨外雜誌，對威權統治、主流媒體與黨國之間的侍從關係進行批判。異議性報刊與黨外雜誌可以被視為台灣另類媒體的原型，最早的異議性報刊《自由中國》創刊於 1950 年，直到 1988 年報禁解除、1989 年《自由時代》社長鄭南榕自焚為止，期間陸續出現許多發出反對性政治意見、爭取言論自由的異議性報刊或黨外雜誌，如：《文星雜誌》、《台灣政論》、《夏潮》、《美麗島雜誌》、《春風》、《新潮流》等。這些報刊生成於威權政體強力控制言論發表的專制社會，黨政軍一方面藉著法規與政策進行內容審查；另一方面投入媒介經營、建立宣傳管道。在如此高壓的言論環境中，異議性報刊與黨外雜誌是政治異議份子唯一可以發表反對性意見、組織動員的管道（管中祥、劉昌德，2001：23-27）。

由於異議性報刊及黨外雜誌可能威脅到威權政體的統治，經常可見他們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打壓與整肅，像是《自由中國》成立之初與政府關係良好，甚至還

收到來自官方的金援，後期因為報刊言論直接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貪腐與專制，以及報刊參與者投入組織新的黨派，因而引來國民黨的不滿，最後自由中國的創辦人雷震遭到逮捕並送交軍法審判。另一個著名的肅清事件則是發生在 1979 年 12 月的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由黨外人士組成，組織結構具有準政黨的特質，發行量最高曾達十萬份，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該刊的主導者們接受軍法審判後入獄，美麗島雜誌因而停刊。

爾後，隨著科技的進步，異議份子與黨外人士開始使用電子媒介進行傳播，在內容上也不同於異議性報刊及黨外雜誌專注於政治性言論，同時也報導在地意見、文化議題，以及社運團體的圖像與訴求。這個階段的另類媒介包括：另類錄影帶、民主台與地下電台（管中祥、劉昌德，2001）。

1984 年 6 月導演鄭文堂等人對海山煤礦崩塌事件進行的影像紀錄，是另類錄影帶的先河，該影像紀錄促使相關單位重新處理對礦災罹難者家屬與受害者的補償。此外，另類錄影帶首次以影像紀錄直接挑戰傳統老三台對社會團體的汙名化的案例，則是 1986 年由綠色小組發表的《中正機場事件》（管中祥、劉昌德，2001：29）。管中祥（2009：205）認為另類錄影帶不僅具有政治改革的意涵，同時也是進行媒體抗爭的工具，一方面透過影像紀錄台灣社會運動、推動政治與社會的變革；另一方面藉著傳遞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報導面向，挑戰傳統老三台對言論與意見傳遞的壟斷。

除了另類錄影帶透過影像呈現來自弱勢的聲音，地下電台也在發表政治異議言論之外，透過節目常見的電話 call in 環節提供社會邊緣者或弱勢者，像是勞工、婦女等，一個發聲的管道，使之能與資本主義或父權體制對抗（管中祥，2009：205）。管中祥、劉昌德（2001：33-35）提到，相較於電視系統，廣播媒體的運營成本較低且頻率取得容易，因而成為反對運動者或黨外人士喜愛的理念宣揚工具，紛紛利用地下電台進行政治宣傳，1992 年第一個地下電台「全民電台」開播，該台便是由時任民進黨秘書長的張俊宏所創。

另一方面，與異議政治運動結合的民主台（第四台）則是出現於 1990 年—由民進黨支持者創立的《中和民主有線電視台》，民主台可以算是民進黨及其支持者嘗試在黨政軍壟斷的電視系統之外，建立傳遞政治意見與意識形態管道的試驗，除了透過政治節目傳遞政治理念，也會製作在地新聞與文化節目。爾後隨著 1993 年有線電視法通過，私有有線電視台開始合法化與建制化，民主台因而逐漸式微（管中祥、劉昌德，2001：30-33）。

台灣另類媒體的發展歷經異議性報刊、黨外雜誌、民主台、地下電台與另類錄影帶的轉變，不同階段的另類媒介形式皆深受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情境、科技演變所影響，而產生異於彼此的樣態與內涵（管中祥、劉昌德，2001）。2000 年政黨輪替後，隨著社會的開放、社會運動組織與主流媒體關係的轉變，這些以社會運動、異議言論為特色的另類媒體逐漸沉寂（成露茜，2009）。但近幾年隨著社群媒體興起、社會公民意識的再起，台灣另類媒體也有再起的趨勢。管中祥（2015：113）指出，現今以報導公共議題、社會運動為主的台灣另類媒體大致可分為四種主要型態：

（一） 網路原生媒體，以及融合平台與資料庫功能的另類媒體

台灣「最早」網路原生另類媒體是《南方電子報》，創立於 1995 年，以電子報形式傳遞有別於商業邏輯的另類聲音，內容以文化評論為主。最「長壽」的網路另類媒體則是創立於 1997 年的《苦勞網》，《苦勞網》標榜自己是「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主要關注社會基進性議題。除了即時提供社運消息、報導社運相關脈絡、論述或評論社運議題外，也會透過報導進行社會動員（管中祥，2009：208）。

2014 年底，創辦《苦勞網》的孫窮理有感於社會運動相關訊息的專業性與複雜程度提升，導致一般閱聽眾經常無法理解，決定嘗試以有別於大篇幅文字的報導形式來呈現社運議題，因而決定於 2015 年 1 月離開《苦勞網》，另創《焦點

事件》。《焦點事件》著重在議題的深度論述、並嘗試以資訊圖表解釋複雜的議題脈絡（陳順孝，2015：43-44）。

而以環境議題為主的《環境資訊電子報》則在 2000 年成立，由台灣環境資訊中心發行，除了報導台灣在地的環境新聞、分享國外的環境議題與運動之外，也會舉辦環境新聞志工營隊，培訓關注環境議題多元面向的新聞志工（管中祥，2009：209）。

此外，以社會企業形式經營的《上下游新聞市集》則創立於 2011 年，關心農業與友善土地議題，報導面向以農業、環境、食安為主，除了有專任記者產製每日新聞與專題報導外，也有公民寫手在網站上自行發布相關文章。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產製內容的網路媒體外，也有些另類媒體以平台形式存在，提供一個傳播或紀錄另類議題的管道。例如，同時具備平台與另類媒體兩者特質的《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成立於 2007 年，基於主流媒體對於各種公民行動的忽視，因而決定主動透過影音記錄各種公民行動，成為一個公民行動者得以分享、記錄、保存行動足跡的網路影音資料庫。期待透過這些影音紀錄，使大眾可以對社會運動有更深的認識與理解。公庫網站上的影音拍攝主題以具爭議性的社會運動為主，截至 2015 年底，共累積 2400 多則的社運影音（管中祥，2009：211；陳順孝，2015：71）。

同樣進行社會運動影音記錄的網路平台《沃草》則創立於 2013 年，以國會監督為平台主要目標，期望藉著議事直播、以易懂的方式解讀議事內容等方式，提升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除此之外，《沃草》也推出許多促進公民討論與政治參與的計畫，像是「市長給問嗎？」、「總統給問嗎」、「沃草公民學院」、「立委出任務」等。當重大的社會運動發生時，沃草也會到運動現場進行影音直播，將現場消息透過直播傳遞給螢幕前的公民（陳順孝，2015：62-68）。

（二） 另類媒體集團

另類媒體集團的代表為由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創立的台灣立報社，該社以發出社會異議之聲、強調媒體社會公器特質為特色。旗下有《台灣立報》、《破週報》與《四方報》等三個另類媒體。《四方報》以越南文、泰文、柬埔寨文、印尼文、緬甸文與菲律賓文等東南亞語言發行，其中，最早創刊的越南文版發行於 2006 年，讀者主要為東南亞移工，除了報導移工所需資訊外，同時也提供移工抒發己見的機會。以批判思維、社會運動新聞與評論、教育議題著名的《台灣立報》則創刊於 1988 年，而姐妹報《破週報》則是強調對主流文化與價值的批判，著重在青年發聲與文化意見（管中祥，2009：216；管中祥，2015：114）。

然而，世新大學受到少子化的衝擊，經營出現困難，在財政的考量下因而決定停止對台灣立報社的經費挹注。《破週報》遂於 2014 年停刊。《台灣立報》則宣布進行休刊重整並資遣全數員工（管中祥，2015），重整後於同年八月復刊。在《破》、《立》停刊與重整之際，《四方報》因收入穩定而免於類似待遇，但隨著紙本銷售量下滑，《四方報》的經營也開始出現危機，起先世新大學要求《四方報》朝向社會企業方式轉型，但在轉型未果之際，2016 年 04 月世新大學宣布《四方報》停刊，改版後於同年 08 月復刊。儘管《四方報》、《立》皆於重整改版後再次出刊，但卻被曾在《台灣立報》服務多年的媒體人張正形容為「斷手斷腳」，已不具過往強調批判思維、異議聲音的樣貌（張正，2016 年 04 月 14 日）。

（三） 公民新聞

除了以團隊方式經營的另類媒體，也有許多單打獨鬥的報導者，像是公民記者。管中祥（2015：117）指出，公民記者是不以新聞為本業的業餘報導者，報導以社區或在地議題為主。公民記者的報導多匯集在《peopo 公民新聞網》，該網由公共電視於 2007 年成立，是一個以公民新聞為主的網路平台，提供公民自主在網站上發表報導、與其他公民交流的管道；強調平台本身的開放性質，平台

不具內容上的審查規範，所有公民皆能使用《peopo 公民新聞網》作為傳播管道；另一方面，為了提升公民參與程度，《peopo 公民新聞網》也會舉辦公民記者的培訓營隊，教導公民一些基本影音拍攝與剪輯技能（管中祥，2009）。

（四） 獨立媒體人

有別於公民記者多為業餘報導者，獨立媒體人則是以新聞為本業。他們不隸屬於任一媒體機構，在主流媒體之外實踐新聞專業、獨自從事不同領域的報導工作，朱淑娟、李惠仁、楊虔豪等都是著名的獨立記者。這些獨立記者有的具備主流媒體的工作經驗；有的則是在畢業後便直接走上記者的獨立之路。

綜觀上述不同階段的另類媒體，我們可以發現各時期的台灣另類媒體所展現的面貌殊異，每一種實踐樣態都受到當時媒介和政治、社會情境的關係，以及傳播科技所影響。管中祥、劉昌德（2001：51）指出，這些反對性媒體的形式與角色，可以反映出不同歷史階段的媒介控制形式與對抗主體。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在主流媒體之外發表異議性言論、傳遞政治理念、爭取新聞自由的另類媒體，像是異議性報刊、另類錄影帶、民主台與地下電台，他們的對抗對象通常是威權政體，以爭取外部新聞自由為目標。

之後隨著1988年報禁解除，台灣媒體生態開始走向解管制，在這個過程中，新自由主義的力量與反對黨政軍介入媒體的力量結合，促成政府在媒介管制法規上的逐步解禁。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私有化等市場原則，且強調政府應盡可能減少對市場的介入或規範。後續的媒介管制政策為了回應新自由主義的訴求，以解管制的思維修改傳播法規，結果導致傳播法規大幅朝企業傾斜。媒介高度私有化與市場化的結果，使得台灣媒介往高度集中化發展。這些壟斷性企業將利益視為首要考量，忽視言論的多元與弱勢者的立場，並且經常汙名化威脅到當權階層的社會異議聲音（劉昌德、管中祥，2001：28；管中祥，2009：203-204）。此階段另類媒體的對抗主體則為服膺於資本主義的企業主或商業力量，後續提到的網路原生另類媒體、另類媒體集團、公民記者與獨立媒體人，皆採取不同於市場

邏輯的方式經營媒體，在主流媒體之外從事另類且獨立的報導工作，著重於社會公共議題、異議意見與弱勢者的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些另類媒體不以利潤最大化為媒體運作目標，但他們還是得面對維生問題，下一個段落將說明他們如何取得經營所需資源，以及組織如何運作。

二、 結構與經濟

（一） 如何維生：另類媒體的資金來源

陳順孝（2014：38-41）曾針對 21 名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進行研究，瞭解這些在主流媒體之外從事報導的新聞工作者如何維生？訪談發現他們的收入來源極為多元，包括：來自主流媒體／另類媒體的稿費或合作專案收入、書籍版稅收入、政府單位的補助與標案收入、公益組織的捐贈、學術機構經費補助、公眾捐款、專業服務（如：架設網站）與銷售產品收入等。

像是《苦勞網》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小額定期捐款，約占總收入的 95%，在 2014 年，每月定額捐款可達十八到十九萬（陳順孝，2015：4）。除了小額定期捐款之外，另有網頁製作、政府或學術補助等其他補充性收入。

以學術、政府單位補助與標案為主要經費來源的另類媒體，則有《環境資訊電子報》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環境資訊電子報》的經費來源以接政府標案為主，捐款或會員費為輔。《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起初為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的數位典藏計畫，經費來自學術補助，持續了五年，直到 2012 年數位典藏計畫終止後，開始轉為以小額募款、群眾募資等方式維生，每月固定捐款額度約為八萬元（陳順孝，2015：77-78）。

不同於上述另類媒體以小額捐款、政府或學術補助維生，沃草則是由股東出資成立，後續接著以群眾募資、發行文創商品的方式籌措資金。其中，群眾募資是《沃草》旗下國會直播計畫《國會無雙 2.0》透過 flying V 平台所進行的募資

計畫，該計畫扣掉紀念品支出後的收入約為二百多萬。然而，2015 年中，沃草發生管理者不當使用公款的爭議，內部經過討論後，為了避免發生類似爭議或影響其他進行群眾募資的團體，因而決定不再透過群眾募資取得營運經費，轉而以發行電子刊物及開發、販售文創商品等方式，開創新的財務收入來源(陳順孝，2015: 79-81)。

另一方面，以社會企業形式經營的上下游新聞市集，取得維持新聞部門運作所需資金的方式則以開發、販售友善土地的產品為主。搭配來自基金會或個人的捐贈，以及同屬於小額定期捐款模式的「共同辦報人」制度(陳順孝，2014: 37)。

綜觀各另類媒體的經費來源，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另類媒體的經費來源主要有：集團或股東出資，像是《沃草》；販售非新聞類產品，像是《上下游新聞市集》；政府或學術補助、專案執行費用，像是《環境資訊電子報》；以及募資，募資又可分為小額定期捐款與群眾募資，目前大多數的另類媒體皆採取募資作為財源之一，但在不同另類媒體之間，募資所占的收入比例不一。再者，上述另類／獨立媒體的經營大多同時採取多種財源，陳順孝(2014)因而以「組合式工作」形容台灣另類／獨立媒體不依賴單一收入、經費來源多元的維生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閱聽人對於另類媒體的信任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另類／獨立媒體有別於主流機構的所有權獨立性之上。但近幾年隨著社會氛圍與數位科技的改變，有越來越多的另類媒體組織嘗試利用各種方式，改變另類媒體的經營模式，另類媒體和商業、政治、主流媒體等機構的關係也日趨複雜，儘管另類媒體仍舊主張自己獨立於各機構之外、不受其影響報導產出，但仍免不了被閱聽眾用放大鏡檢視另類媒體是否真的「夠獨立」。

黃文慧(2015)便從社會企業觀點出發，以 2011 年成立的《上下游新聞市集》為例，從組織結構、內部溝通、各部門使命對象與運作模式、新聞與產品的行銷管道等面相，探詢另類媒體如何在組織目標和收益行為之間取得平衡、又會遇到哪些衝突。《上下游新聞市集》結合經營電子商務的產品部門以及產製報導

的新聞部門，將產品部門的營利直接投注於新聞報導，讓媒體得以自立更生、不受外界資助多寡而影響組織運作。

然而這種結合商業與新聞的經營模式，也讓不少人質疑新聞部門的獨立性（黃文慧，2015），對此《上下游新聞市集》的創辦人馮小非提到：「新聞教我們學會要自我揭露」（轉引自黃文慧，2015：104），一旦發生爭議，無論是產品部門或新聞部門，《上下游新聞市集》都會在爭議發生的當下主動對外說明內部運作，並回應讀者的提問，藉此維持外界對組織的信任。由此可見，當另類媒體因經濟資源的取得方式而受到外界質疑時，為了避免被貼上商業化、政治化工具的標籤，主動自我揭露、公開內部運作方式並建立讀者的溝通管道，是解決衝突、維持閱聽人信任的不二法門。

（二） 組織內部結構

此外，在內部結構層面，另類媒體組織大多採水平化運作，決策過程強調民主共識，內部新聞工作者的獨立性較高（管中祥，2015）。黃文慧（2015）以《上下游新聞市集》為研究對象，觀察組織內部運作時便發現，《上下游新聞市集》的記者擁有較高的選材自主性，在內容的寫作上也較為自由。孫窮理也說，苦勞網的團隊以「資源共創共享，事物共議共決」的方式運作（陳順孝，2014：51），內部決策皆為團隊成員討論後，共同決議。

三、 記者和讀者的關係、記者角色的轉變

讀者和記者關係的轉變，是另類媒體新聞實踐的重要特質之一。Atton（2003:269）提到，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中，記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親近且去階層化，有時甚至難以區分兩者。在某些社會運動的案例裡，記者經常是具雙重身分的「activist—journalist」，一方面以記者身分進行報導工作，另一方面以運動參與者身分進行運動抗爭。

然而，在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案例中，如此行動者與報導者的雙重身分，

卻使得另類媒體受到許多質疑，並造成另類媒體在運動現場進行採訪時，經常遭受來自官方與其他主流媒體的阻礙（管中祥，2015：124）。不可諱言地，另類媒體的確與運動團體關係密切，原因是另類媒體對於促成社會進步的強調，使得另類媒體經常成為社運團體優先的媒體露出管道。某些另類媒體記者也會就本身的經驗，給予運動團體行動上的建議（陳順孝，2015：58）。管中祥指出（2015：128），另類媒體與運動團體的親密關係，加上另類媒體報導本身的基進性質，使得另類媒體報導者經常被貼上「假記者」的標籤。究竟具主體性與獨立性的另類／獨立媒體該如何面對這種親密關係，是另類媒體工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對此，《眉角》記者鐘聖雄提到，自己和社會團體的確有私下的交流，但是，一旦到了社運現場，自己還是會做好記者的採訪工作，不會一下是報導者、一下是運動者。《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也表示，他的報導工作確實一直都以社會運動為核心關懷，但這不代表《苦勞網》就是社運團體的外圍組織，《苦勞網》也會特別避免由運動參與者來撰寫與該議題相關的報導。孫窮理說：「怎麼可能在台上拿麥克風喊一喊，回來又寫一篇報導？那樣怪怪的，會區隔開來」（陳順孝，2015：58）。

另一方面，關注農業與友善土地議題的《上下游新聞市集》同樣提出類似的角色區隔概念。《上下游新聞市集》創辦人馮小非提到：「我們的心態是想改變這個社會，而且透過的是專業的新聞，不只是透過有態度的自白。」（陳順孝，2015：22）。儘管《上下游新聞市集》期待透過對於公共議題的報導，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但這不代表《上下游新聞市集》的立場就一定朝農夫或消費者傾斜，對抗官方，而是同時與議題各方關係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媒體自己對該領域的專業知識為基礎，問出或發掘真正該被重視的問題，藉此促成社會的進步。

黃文慧（2015）針對《上下游新聞市集》進行研究時也發現，作為一個結合新聞內容與電子商務導向市集的另類媒體，使得《上下游新聞市集》的記者與被報導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儘管同樣重視和消息來源、被報導者之間的良

好關係，但為了避免讓人懷疑新聞內容是否有為市集產品宣傳之嫌，必須特別小心處理與被報導者、公民寫手、產品生產者之間的關係。

為了維護新聞的獨立性，《上下游新聞市集》落實「產品一旦上架就不再報導」的原則，若產品上架後因考量到為農民發聲、共同承擔問題的組織目標而需要提供相關報導時，則「只報導人、不報導產品」。第二種情況出現在當產品生產者背景特殊或農作手法符合《上下游新聞市集》理念，並且具有一定新聞價值的前提下，新聞部門會以報導呈現農民與農產品的故事。但當產品生產者成為被報導者，該怎麼做才可以避免影響讀者對新聞的信任？除了回歸到新聞價值來決定是否值得報導以外，也會透過工作日誌保持組織利益關係的公開透明。

曾在主流媒體工作者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則是以「三條線的距離」比喻自己和採訪對象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每天都會見面的政府官員、情感上認同的運動團體或居民，朱淑娟和所有的採訪對象保持三步遠的距離，讓記者可以維護採訪時雙方需要的信任，也可以避免因為過於親近而在報導上有所偏頗（郭佩君，2010）。

由此可見，不同於具備雙重身分的 *activist—journalist*（Atton, 2003），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儘管對於弱勢或社會運動團體會有較多的情感涉入，但基於本身對於獨立性的堅持，另類媒體報導者並不會刻意將自己安置在運動者或弱勢立場來進行報導工作，甚至會刻意和兩者拉開距離。對此，管中祥也認為（2015：129），另類媒體不是社會運動團體的附庸，是一個具有主體性與獨立性的組織，必須和所有的報導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包括社會運動團體。

四、 消息來源與草根報導

另類媒體工作者之所以能夠成就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工作實踐，有很重要的一部份是另類媒體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依循著一套截然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消息來源選擇方式，並和消息來源保持持續互動。

傳統新聞專業規範認為記者為了追求新聞客觀性，記者不能對受訪者有過多

的情感涉入，兩者之間的關係因而較為疏離。另一方面，奠基在新聞專業規範之上的主流媒體新聞工作常規，經常傾向使用社會菁英為消息來源，包括：政府、企業或學者，因而忽略庶民的意見。與主流媒體相反，Harcup（2015）指出另類媒體則是刻意強調自己替／讓弱勢發聲的功能。對於傾向優先使用非菁英作為消息來源的另類媒體來說，訪問不單單只是從受訪者身上取得需要的素材，更是一種對受訪者的承諾，讓鮮少被聽到的弱勢或非主流聲音有發言的機會。受訪者的回答不僅會影響報導呈現，更會對受訪者的生活造成影響，記者會在採訪前向受訪者解釋訪問內容會如何被使用，兩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會結束在訪問結束的剎那，因為訪問本身就是一種對於受訪者人生的涉入，記者必須意識到對於自己的涉入並且對其負責。

然而，如前所述，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為了維護媒體的獨立與專業，所以不會刻意傾向弱勢或非官方的立場。同理，在使用消息來源的方式上，台灣的另類媒體記者會避免只偏重特定一方的說法，而是根據議題的脈絡，盡可能地在報導中安置所有的關係人。

獨立記者朱淑娟便提到，記者並不是事件任何一方的代言人，就算記者對於運動團體或抗議民眾產生同理心、對於議題有個人的關懷與觀點，也不能直接和報導對象站在同一陣線、或直接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而是讓涉及事件的所有當事人都能發表言論，不能只側重特定一方的說法；因為詳實的報導事件全貌、揭露真相與分析事實，本身就是一種促成社會改變的方式，這也是一個實踐新聞專業的記者應有的使命（朱淑娟，2016；郭佩君，2010）。

另一方面，由於另類媒體重視奠基在專業知識之上的提問、陳述與分析，所以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會盡可能地呈現各方意見對事件或議題的看法。張傳佳（2013：97-101）針對獨立／主流媒體如何從事環境報導的研究發現，環境報導因議題本身的特殊性，讓相關報導的消息來源極為多元。因此，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環境報導並不會強調非官方或庶民的消息來源，而是讓不同的意見，像是

官方、環保團體、專家學者、在地居民等等，在同一個議題上交鋒。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媒體記者由於路線的限制，能夠接觸的消息來源有限，反之，獨立媒體反而比較能夠接觸各方消息來源，讓環境報導的意見能夠更為多元。

五、 另類媒體與新聞專業

另類媒體經常被定位為主流媒體的一種補充，角色定位是非正式的、流動的、非主流的。但近幾年台灣另類媒體在新聞工作上的表現亮眼，不斷打破既有的媒體框架、開拓議題視野，許多另類媒體組織在新聞的專業表現上與主流媒體相比毫不遜色，更屢屢獲得新聞獎項的肯定（陳順孝，2014；管中祥，2015）。

曾在主流媒體工作的獨立記者朱淑娟（2016）說：「一個另類媒體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專業報導能力。」主流媒體由於易讀性與收視率的考量，較為重視事件的衝突面向，經常忽略事件背後的議題脈絡與討論，在人力成本的考量下，記者也時常更換路線或負責採訪的部門，這本不利於專業領域知識的累積。另一方面，一個議題所涉及的層面經常跨越不同政府部門，但由於主流媒體「各跑各的」的路線分派方式，記者只能跑涉及到自己路線的那一部分，其他超出自己負責路線範圍的部分就由其他的記者負責，這種分線方式讓記者對於事件僅能有片段式的理解、不利於記者描繪議題全貌，而版面篇幅的限制更使得記者無法完整敘述事件脈絡。若想在當今的媒體環境實踐新聞的專業與理想，另類／獨立媒體或許是較好的選擇。

郭佩君（2010）針對三名曾擔任主流媒體組織雇員的獨立記者進行研究，探詢他們在轉換職場的過程中，新聞專業意理觀念的形塑與實踐歷經哪些改變。朱淑娟在媒體生態不利自己當一個「真正的記者」的時候離開主流媒體、開始當一個獨立記者，離開組織後的朱淑娟獲得更為自由的報導空間、可以自行決定要追蹤的題材以及報導的方式，並讓她得以使新聞事件中所有的採訪對象都能有完整的發言空間，在報導中呈現完整的事件脈絡與論述，也讓她有更多的時間鑽研事

件議題。黃文慧（2015）也提到另類媒體較能提供記者空間與時間消化文獻、經營報導議題。

再者，另類媒體經常打破記者的路線之分，相較於主流媒體記者大多在專注於自己負責的路線，對於其他類型的新聞工作也鮮少涉入，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支撐組織的運作，另類媒體由於結構扁平化，讓參與另類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有機會在不同的工作位置之間遊走，加上組織規模通常不大，一個文字記者可能同時得兼任攝影、網路編輯。Harcup（2015）便提到「多技能」是另類媒體工作者重要的特質之一，而同時經營多條路線更讓另類媒體記者能夠用較為特殊的觀點看待新聞事件。

此外，朱淑娟（2016）提到因為工作模式的不同，讓她比起主流媒體記者更有機會產出有品質的報導。在成本的考量下主流媒體日益減少調查報導的產製，而另類媒體組織和獨立記者由於工作模式的差異，能夠有比較多的時間深入鑽研議題細節、對議題進行仔細的研究、採訪、寫作。

這也衍生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講求水平化結構的另類媒體，守門人的角色消失了，那麼另類媒體該如何在日常實踐中確保報導的品質呢？朱淑娟（2016）提到當初離開主流媒體自立門戶後，她就意識到自己是報導的監督者，要對自己寫的東西負起完全的責任。由此可見，在另類媒體或獨立記者的新聞產製流程中，記者就是最重要的守門人，為新聞報導品質把關的責任從組織回到記者個人身上，這點和主流媒體有很大的不同。

上述原因可以解釋為何台灣有許多由專業新聞工作者經營的另類媒體，路線自由、報導空間與時間、自行決定採訪題目、不受版面限制等工作模式的差異，或許就是另類／獨立媒體之所以較能讓記者體現專業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一些服務於台灣另類媒體的記者而言，「另類」只是一種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形容詞，回歸到實務層面來說，另類媒體所做的不過是展現到新聞工作原先就該有的樣貌。這些以新聞專業和社會關懷作為核心價值的台灣另類媒體與獨立記者，

在日常的新聞實踐中講求針對某一個領域的議題深入挖掘脈絡、給予事件完整的論述面貌，親自到新聞現場取材，在引述消息來源時，也不會刻意避諱政府官員、學者、特定領域權威的言論，而是根據議題給於相對應的陳述（郭嫻君，2010；黃文慧，2015；朱淑娟，2016）。

另一方面，即便另類媒體反對主流媒體的常規化工作規範，但這不代表另類媒體的新聞工作就不存在「常規」。Atton & Wickenden（2005）便指出儘管另類媒體不重視、甚至反對新聞專業規範與常規化的新聞工作，但這不代表另類媒體就可以免於遭受那些和主流媒體相似的產製壓力，例如：截稿時間、基本稿量等等，這些產製壓力同樣會促使另類媒體發展一套新聞室的「產製規則」。過於理想化地將另類媒體視為一個全然自由的新聞工作場域，會將另類媒體從每日實踐、結構因素中抽離，我們必須意識到另類媒體也會發展出一套應用於自身的工作規範，甚至是常規，並應用到每日的新聞工作實踐。

例如，由於另類媒體的報導題材通常較為艱澀，篇幅也較主流媒體長出許多，經常難以吸引閱聽人目光，為了開拓閱聽人市場、增加報導的曝光率，另類媒體有時也會採用一些較具衝突感的標題，或者引入主流媒體行銷的經驗，藉此引起閱聽眾的注意。黃文慧（2015）指出，以農業、食品安全、環境議題見長的《上下游新聞市集》，便曾聘請一位具多年主流媒體經驗的編輯，擔任編輯台專任主編，除了日常新聞編輯工作外，也負責臉書上的社群行銷。專任主編讓報導內容在社群上的曝光率大大增加，但同時也改變了《上下游新聞市集》原有的自主新聞產製模式。

另類媒體內部運作重視水平化的組織溝通，當組織主編導入主流媒體的編採與內容行銷經驗，的確提升新聞產製的效率與成果，卻也變相促使另類媒體成員必須更改過去的工作模式，配合專任編輯所引入的制度化工作規範，記者能夠自由發揮的空間也就受到限縮。另一方面，包裝過的標題固然可以增加新聞的閱讀率，但經營衝突感的分寸該如何拿捏才可避免爭議，牽涉到另類媒體編輯台對於

事件的評斷與經驗（黃文慧，2015）。

另一方面，即使是單打獨鬥的獨立記者，也會從日常新聞實踐中發展出一套具有規律的工作模式，郭佩君（2010）提到離開主流媒體、走一條另類的媒體實踐之路的朱淑娟儘管自立門戶，但仍然會在日常工作中，納入主流媒體的產製規格與方法，她將離開主流媒體後成立的網站《環境報導》視作正式的新聞媒體，網站上的內容也遵守一定的新聞報導寫作方式。

離開《苦勞網》、自創《焦點事件》的孫窮理也提到，《苦勞網》從1997年創辦至今，發展出一套固定的團隊工作模式，記者或編輯每天都得跑線或產出報導（陳順孝，2014：43）。這種工作模式讓團隊可以穩定產出報導，但也使記者受到工作模式的限制，無法執行長期的計劃、維持行政工作。

由此可見，無論是獨立記者或是另類媒體組織，都不可能全然「自由地」產製新聞內容，仍舊遵循某些個人化或組織化的工作模式。從《上下游新聞市集》的例子來看，制度性的規範確實幫助組織成長，但代價是記者個人掌控個人報導工作上的程度隨之降低，在組織成長、記者工作自由、媒體理念與內部產製效率之間該如何取捨？

第四節、塊莖思維

一、 另類媒體研究的四個研究取徑

由於另類／獨立媒體在產製模式、風格、媒體角色定位等不同實踐面向皆具有高度的異質性，並沒有一個單一的定義可以完整涵蓋所有的實踐模式。基於另類媒體的異質性，另類媒體研究取徑也未有一個統一的切入取徑或理論框架，研究者基於所處的脈絡、心中對於另類媒體的想像、對於另類媒體功能的認知等，會使用不同的研究取徑切入另類媒體研究，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2008: 7-30）整理出既有的另類媒體研究，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個研究取徑：

(一) 取徑一：側重另類媒體服務社區的功能

此一取徑認為另類媒體以服務社區為導向、扮演中介雙向傳播的角色所謂的社區是由一群具有相同興趣、處境、知識、關懷或困難的人所組成，可以跨越地理的限制或存在於網路虛擬世界，有著以下幾個功能：強化社區（群）、提升社區參與、建立社區成員可以使用與參與的傳播管道、促成社區相關議題的討論、開啟與其他社會機構溝通的管道，以及解決外界錯誤再現、誤解或忽視社區的問題。

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11) 提到，此一取徑的另類媒體研究著重於媒體提升社區參與的角色與過程。所謂「社區參與」有兩種不同的層次，一個是公民直接參與 (participate in) 媒體產出的過程，包含參與內容產製、媒體內部決策等，透過這些參與讓公民得以實踐自己的傳播權利，培養民主且具公民意識的參與態度，藉此強化涉入鉅觀公民社會的能力；另一層次的參與則是公民藉著另類媒體，取得參與大規模公共辯論或自我表達的機會 (participate through)、開啟與其他社會機構溝通的管道、解決外部錯誤再現及輕忽社區權利與需求的現象。

此一取徑的研究發現，以社區為服務對象的另類媒體，運作目標大多是賦予並促進公民近用與參與的能力，讓庶民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傳遞庶民的意識形態與陳述、使得公民得以參與和社區相關的討論等。

(二) 取徑二：側重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另類媒體

這個取徑的研究者著重在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之間的差異，將另類媒體視為主流媒體的補充，甚至是一種對於主流媒體的反霸權批判，並主張另類媒體的實踐無法與意識形態、支配性霸權的概念分割。例如，Atton (2002: 15) 曾提到另類媒體作為對政治場域、媒體既存角色、常規與概念的挑戰與轉型，足以讓另類媒體被視為一種對抗霸權的次文化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Gramsci 針對霸權與意識形態提出的概念與論述，對這個取徑的研究者尤其重要。這個取徑的另類媒體研究者認為主流媒體是傳遞霸權的工具，傳遞支配性的言說或再現（representation）。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2008）指出，再現在政治脈絡中所指涉的是意義的爭奪、是社會意識形態產製的重要來源。現實生活的意義是經由具脈絡意義的語言與言說的再現而建立，在這個過程中，現實會遭到扭曲。例如，媒體報導外籍移民時所使用的語言符號，會影響本地居民對於他們的認知，在媒體再現與現實世界的連結中，符號的使用是鑲嵌在語言與文化中，並與意義和政治決策的過程產生連結。另類媒體的存在，便是為了替那些被主流媒體錯誤再現，或是再現不足的意識形態發聲。

此一取徑的另類媒體研究者主要關注以下兩點，第一、他們特別重視社會次要團體如何透過使用另類媒體產製具抵抗性的言說，挑戰霸權並傳播過往被邊緣化、錯誤再現或再現不足的觀點，這些觀點通常具有對抗性意義；第二、他們經常將研究重心放在另類媒體和主流媒體在內容與結構上的差異，像是在內容層面，另類媒體如何呈現異於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再現與言說，提供在地文化、弱勢團體、社區團體或熱門政治議題一個示威與展現的空間。

（三） 取徑三：側重連結公民社會的另類媒體

此一取徑將另類媒體視為公共媒體與私人商業媒體之外的「第三種聲音」，主張另類媒體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對民主發展具重要性，當媒體提升大眾近用資訊與傳播資訊的機會，使大眾可以藉著使用另類媒體參與公共辯論，將對社會的民主化大有幫助。

這個取徑同樣受到 Gramsci 的影響，Gramsci 以互動式觀點看待公民社會與霸權對抗的過程，場域中的行動者會藉著組織公民促成社會變革或抵抗霸權，同時也會有其他的行動者組織反動力量抵抗變革、再製霸權。換句話說，公民社會不僅會再製霸權、同時也會挑戰、對抗霸權（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 21）。不同於取徑二的研究者將另類媒體視為對抗主流媒體的存在，這個取徑的

研究者將另類媒體視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著重於另類媒體促成民眾從微觀的社區參與，進化到鉅觀的政治參與的過程，並重視另類媒體如何藉著產製對抗性言論挑戰霸權。

（四） 取徑四：視另類媒體為塊莖

此一取徑的研究者深受 Deleuze 與 Guattari 的「塊莖」隱喻（metaphor of rhizome）所影響（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 26）。Deleuze 與 Guattari 的塊莖思維奠基在樹狀與塊莖等兩種隱喻之上，樹狀的隱喻引用樹的結構特性，從樹根、樹幹到樹枝，都具有一定的階層系統，且生成物都是源自樹根、以樹幹為核心而演進，藉此指涉那些具有核心、線性、階層化、固定的結構；不同於樹狀結構有根與骨幹，塊莖是於土壤淺層蔓延生長的植物，如馬鈴薯。塊莖不具固定的生存模樣，可以從各種不同方向的分岔繁殖成長，並進一步與其他塊莖凝聚。Deleuze 與 Guattari 援引塊莖植物的特質，來隱喻將事物視為非線性的、無政府的、可隨時斷裂與連結的、有著多元的入口的、且遊牧的思維方式（陳永國，2014）。

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2008: 27-30）提到使用塊莖思維作為另類媒體的研究取徑，會將研究重心放在下列三個層面：

第一、將另類媒體視為塊莖的研究取徑，捨棄過往的二元邏輯，一方面拒絕單純將另類媒體視為反政經霸權的行動者，主張另類媒體和政經力量之間，並非只存在敵對關係，另類媒體偶爾也會涉入兩者，或基於生存的原因和兩者建立合作關係；另一方面，這個研究取徑也拒絕使用社區與國家（或其他更大的場域）的二分法來理解另類媒體的定位，另類媒體可以是社區的、可以是國家的，也可以兩者皆是。另類媒體作為將組織或運動連結到公民社會的媒介，不僅可以持續紮根於在地社區，同時也可以進入跨社區的網絡，這也恰好可以回應塊莖結構的流動特質；

第二、另類媒體的特徵之一是高度的「難以掌握性（elusiveness）」，另類媒體深植於流動的公民社會，某些另類媒體因而具有時而出沒、時而消失的特性，

例如，為了特定社會事件而展出來對抗官方的另類媒體，在抗爭結束後經常消失不見或轉往其他議題發展，加上另類媒體實踐樣態的多樣性，都使得我們難以捉摸到底何謂另類媒體；

另一方面，另類媒體的「難以掌握」讓其保有更多的流動潛力與生成可能。由於另類媒體不具固定的特質或規則，使得既有的國家或商業秩序難以控制另類媒體。另類媒體憑藉著自身的彈性與流動特質，建立與政經力量互動時的抵抗能力，並使另類媒體得以在不喪失自身主體性的前提下，跨越既有疆域，和國家與市場建立關係，並在與之互動的過程中，混合、吸收或同化域外既存物。如此既合作又對抗的互動，也讓另類媒體得以用更為猛烈的方式批判霸權，且更為靈活地使用或破壞支配關係。當另類媒體與公共及私人媒體接觸，能夠藉著其高度的流動性質，突破兩者所建立的疆界，將流動的觀點帶入死板的媒介組織內。

第三、不同於取徑三將另類媒體視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將另類媒體視為塊莖的觀點強調，另類媒體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其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而是因為另類媒體具有促使不同觀點的人們能夠相遇與合作的潛力。位處各類型運動相遇十字路口的另類媒體，不再只是幫特定議題的弱勢團體發聲，更成為一個重新構連公平與中立理念的平台，藉此組織來自不同背景但同樣都在爭取公平正義的人們或團體。

之所以特別強調另類媒體能夠連結不同抗爭的特質，在於反抗性團體得以藉著連結彼此進行合作，來避免因為單一抗爭成功而導致其他抗爭權益受損的情形出現，例如某些勞工運動所獲得的成果，對於反性別歧視、反種族歧視運動者而言，可能是一種變相的剝削。再者，透過連結，抗爭運動者更有機會用不同形式表達自己的理念，並從中體會到他們作為公民的主體性。

從上述整理可以發現，「服務社區」、「作為一種主流媒體之外的另類」、「連結到公民社會」等三個取徑，透露出這些取徑的研究者將另類媒體視為對抗霸權的機構，這三個取徑也不約而同的強調另類媒體的公民近用、去專業化、庶

民自我再現等特質，並刻意凸顯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的對立。以對抗霸權的思維來看待另類媒體，反映出這些研究取徑深受二元的思考邏輯所影響，基於「另類」、「獨立」或「基進」等特質，所以就將他們視為對立於主流媒體的存在。

然而，隨著另類媒體和其他社會機構互動越來越多，以及另類媒體自身實踐經驗的累積，另類媒體的「另類」，或許不再只是單純地對立於主流媒體，而是跳脫二元的框架，型塑出關係更為複雜、性質更為多元的實踐方式。用二元邏輯的思考方式來理解另類媒體是甚麼，已無法反映出另類媒體實踐的現況，也無法幫助研究者認識另類媒體的真實面貌。因而有了將另類媒體視為塊莖的研究取徑，塊莖思維跳脫二元的認識論，以「生成」的觀點凸顯另類媒體的發展並不是單向的「由A影響B」、「由A衍生B」或「由A對抗B」，而是在諸多互動中相互形構與生成。「生成（becoming）」是線和線連結的運動過程、是異質之間的相互對話、連結與形構，異質之間既能融合、也能隨時斷裂、拆解，進而重生（吳姿嫻，2014）。生成並不是事物穩定的狀態，生成不具固定的發展目標。以生成為本體論的塊莖思維，不會提出「塊莖將生成什麼？」的問題，反之，塊莖思維所重視的是塊莖的功能是甚麼、與外部的關係為何、塊莖如何繁殖、引發哪些變形、如何聚合（陳永國，2014：155）。

二、 將另類媒體視為塊莖

另類媒體存在於一個開放的社會系統，隨時都在「改變」，並在諸多互動中重構自己的面貌。不同於過往追求同一的樹狀思維，塊莖思維重視本體和異質對話與連結，以動態的視角關注塊莖自身的繁殖與變化，而採用塊莖思維看待另類媒體的發展，可以幫助研究者以動態的觀點，發掘另類媒體如何繁殖、變形、聚合、分裂與連結，如何往返於疆域化與解域化之間、如何聚攏各種功能與效果。

Deleuze 與 Guattari (1980／姜宇輝譯，2010) 以塊莖植物開放的、不規則的、無法預測生長方向等特質，隱喻一種異於樹狀結構的思維方式。在樹狀思維

中，一生成二、二生成四，依此類推，最終所有事物都會回到一個具有開端與終結的統一結構。與樹狀思維不同，塊莖不會發展出穩定的存有（being），塊莖始終都居於中間（in between），既沒有開端也沒有終結，若樹狀結構是具有系譜關係的結構，強調「A 是 B，不是 C（A=B=not C）」，塊莖則是結盟，以連接詞「……和 A 和 B 和 C 和……（……+A+B+C+……）」揭示塊莖體自身拼貼式的變化多端與連結（麥永維，2007：62）。

Deleuze 與 Guattari 提出的塊莖思維採用一種動態且具開創性的視角看待事物，將事物視為與異質不斷連結（Connection）的塊莖體，在這塊莖體中的任何一點都可以且必須和另外的點連結，連結的對象不限於疆域內，也能和疆域外的事物連結，讓不同特性的事物之間產生關係。與各種域內／外物的不斷連結，讓塊莖成為一個去中化的異質物（Heterogeneity），而當塊莖體與其他事物產生連結時，自身的特質也會產生變化，所以塊莖也是由各種生成構成且沒有固定意義的多樣體（Multiplicity），結構隨時會隨著新元素的進入而產生改變。此外，塊莖體也可能隨時被打破、或是從某個點分裂，並從原生的點或新的生成點開始重生，創造出新的概念、意義、連結或關係。Deleuze 與 Guattari 採用「表意的破裂（Asignifying Rupture）」這個概念來彰顯塊莖體在變動過程中的分裂與重生（麥永維，2007：66；吳姿嫻，2014；Deleuze & Guattari, 1980／姜宇輝譯，2010：7）。

另一方面，塊莖思維拋棄傳統線性邏輯關注事物發展狀態（being）的視角，轉而採用與發展並行、與變化共處的「生成（becoming）」觀點。生成以動態視角看待塊莖體的連結、繁殖與分，是一種有關越界、逃逸、解域的哲學。塊莖體藉著開闢突破既有疆域的逃逸路線，突破僵化的關係，並與異質進行對話、連結與相互形構。生成不是事物穩定的狀態（being）、不具固定的開端與終結，總是「在中間（in between）進行」（陳永國，2014：155；吳姿嫻，2014：22）。在每一次的生成中，塊莖體與異質必然會有一方進行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另外一方則是進行再疆域化 (reterritorialisation)。解域化指的是塊莖體經由逃逸路線，突破既有疆域的限制，沿著這條路線與域外物產生連結，然後再次建立疆域。值得注意的是，塊莖思維所重視的不是疆域的邊界為何，而是塊莖在逃逸路線上的移動，這種流變思維才是 Deleuze 和 Guattari 哲學的核心(麥永維, 2007)。

陳永國 (2014: 164) 提到：「解域化之前必須先疆域化」，塊莖體在突破既有疆域前，既有疆域需發展到一定強度並建立疆域的界線，塊莖體才會踰越界線、經由逃逸路線連結域外物。爾後，塊莖會在與域外物相互形構、連結的關係中，聚攏各種各樣的領域、功能、效果，建立新的疆域，並當新的疆域也發展到一定的強度後，再次進行解域化與疆域化。無論是解域化或再疆域化，任何一方都不會以另一方作為原型進行模仿，而是視當下的脈絡發展出獨特的生成樣態 (Deleuze & Guattari 1980 / 姜宇輝譯, 2010: 11-12)。

在這不斷流轉的過程中，塊莖會產生質的改變，也就是說，塊莖的性質是在塊莖與各種域外物互動過程中形成，並在疆域化、解域化、與其他事物連結的過程中產生變化。由於塊莖不具有主體與客體，只有數量、特質、面向等各種特質，這些特質是在塊莖體與各種因素互動過程中形成，並在疆域化與解域化的過程中產生變化。塊莖隨時會被瓦解，但它會在斷裂的線或其他的線上重生，沿著解域化路線與其他事物產生連結，並再次建立疆域，不斷地在「疆域化 (territorialisation) — 解域化 — 再疆域化」之間流轉生成 (Deleuze & Guattari, 1980 / 姜宇輝譯, 2010)。

Deleuze 和 Guattari (1980 / 姜宇輝譯, 2010: 14-15) 以地圖繪製 (Cartography) 與拼貼 (Decalomania) 來隱喻塊莖的生成。在樹狀結構中，事物以模仿或再製前一階層的方式進行繁殖，所以樹狀思維會採用階級式的思考方式追尋、探究事物。但塊莖的生成是開放的、沒有固定形式且可以不斷修整的，塊莖的生成如同地圖般，沒有一定的繪製起始點且具有多重入口。另外，就像是拼貼沒有固定的圖樣，塊莖也不會參照特定的樣式進行生成，隨時都可以分解、連結、改變且具有自身的逃逸路線。塊莖體與以模仿進行繁殖的樹狀結構相反，她無法追溯或發

展成「同一」，所以世人不能用任何既定的模型或結構來理解塊莖體，同樣得採用地圖繪製式與拼貼的觀點，從地圖上的多個入口進入塊莖體，探索塊莖地圖上留下的生成痕跡、發掘塊莖獨特的拼貼圖樣。

當前尚未有研究者使用塊莖思維進行另類／獨立媒體研究，但已有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使用塊莖思維摸索日常生活遭遇的問題。許瑋庭（2013：67-68）在〈流變與開創：一位音樂創業者的生命敘說〉一文中，以生成觀點取代傳統的創業觀點，重新檢視獨立音樂人如何「開創」自己的音樂事業。該文研究對象所歷經的樂團解散、樂團力量不足，在傳統創業理論框架中都是「失敗的」，但若從塊莖思維來看，這只是一次塊莖斷裂，是從一條路線到另外一條路線的逃逸，藉著對既存觀念、價值、知識、關係、角色做出逃逸，創業者反而能創造出異質的生成可能。許瑋庭（2013）認為使用塊莖思維進行創業研究，可以彰顯創業是一個不斷改變的歷程，創業者也不再是僵化的存有，而是異質且不斷在流變的「在中間」。

吳姿嫻（2014）則是以塊莖思維處理日常生活中複雜纏繞的媒介使用、還原媒介使用的動態變化、發掘在媒介、使用者與脈絡等諸多元素之間的互動與連結，從「變」著手，捕捉媒介使用中的生成變化。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認為若要採用生成概念的捕捉日常生活媒介使用，必須先掌握生成的多重路徑，亦即從不同的切口捕捉媒介使用的路徑。研究者具體採用的方式是從研究對象媒介使用情形的「變化」切入，從中描繪在變化的過程中，生成路徑的向內／外開展、節奏與強度。

林藹雲、葉蔭聰（2009：1）提到，使用塊莖（rhizome）一詞可以凸顯獨立媒體的集合與網絡特質，彰顯獨立媒體的多重、去中心化、分裂與連結。相對於主流媒體穩定甚至是死板的結構，另類媒體由於缺乏清楚的通用地基（common ground），使得另類媒體可以隨時跳脫原先的實踐模式，開創新的新聞實踐、複雜化媒介組織的樣態（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使用塊莖思維來看待另類媒體，有助於研究者凸顯另類媒體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並且幫助研究者

擺脫既有研究的二元思維，發掘另類媒體實踐的各種可能。另一方面，塊莖的生成觀點也可以幫助研究者處理另類媒體不斷變動的特性，這些「變」有可能是另類媒體自身的演化、發展與繁殖、與域外物的連結；也有可能是另類媒體組織的分裂、重生與再生。此外，塊莖思維強調在塊莖體中的每個段關係都有可能隨時斷裂，並從斷裂點創造出新的關係，任何斷裂都是可能的，斷裂後塊莖會持續向外蔓延繁殖（陳永國，2014；吳姿嫻，2014）。斷裂的概念，也可以彰顯當前另類／獨立媒體之間一方面相互合作、牽連；一方面分裂出各自的實踐分支，並在新、舊發展的場域中繼續向外繁殖、向下紮根的特質。

第五節、研究問題

Downing（2001）提到另類／獨立媒體基於不同的脈絡會發展出異質的媒體實踐面貌。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另類／獨立媒體多具社會動員功能，在台灣，有較多以新聞專業為號召的另類／獨立媒體（葉蔭聰，2015），近年有日多的新聞工作者投入另類／獨立媒體組織或成為獨立記者，並以新聞專業自許。因此，本地研究者不能僅用既有的理論框架檢視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實踐面貌，得實際進入田野、由工作者自行發聲，才能發掘植基於台灣情境的另類媒體發展歷史與實踐面貌。

另一方面，從本章第三節的回顧與研究者日常觀察可知，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無法輕易被視為同一整體，面對變動頻頻的社會，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總是與時俱進、不斷調整自身實踐方式。再者，另類／獨立媒體之間也會因為組織目標、核心理念、組織結構、財務來源等差異，而發展出迥異的新聞實踐面貌。

相較於對抗主流媒體的傳統定位，當前台灣另類／獨立媒體之所以另類，早已跳脫「主流 vs. 另類」的二元對立，以其複雜且多元的實踐方式，體現他們的另類、獨立與基進。研究者認為從二元對立式的觀點來看待另類／獨立媒體的「另類」，將會忽略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的多元面貌，以及其不斷變動的特質。

因此，研究者選擇採用塊莖視角檢視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以變為常」，以此彰顯另類／獨立媒體之間的異質性，以及媒體內部多元且複雜的生成網絡。

塊莖思維的「生成」的觀點可以反映另類媒體的演進已非單向地「由 A 衍生 B」或「由 A 對抗 B」，而是在「疆域化—解域化—再疆域化」的流轉中，與各種域外物相互形構與生成。另一方面，相對於主流媒體制式化的結構，不受固定樣板限制的另類／獨立媒體可以隨時跳脫既有理論定義的框架，另類／獨立媒體也有可能隨時分裂、重組，並從原生的點或新的點重生，開創新的新聞實踐方式。使用塊莖思維來看待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將有助於研究者發掘另類／獨立媒體如何打破原本的實踐模式、進行分裂、重組與連結，凸顯台灣另類／獨立媒體不斷變動的動態生成特質。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研究肯認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以變為常」、另類／獨立隨時都會因為時空變化而開展異質的新聞實踐，研究者不能再將另類／獨立媒體視為可被化約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因此，研究者並不認為本研究可以提出一套映照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群像的理論，反之，研究者可以透過進入另類／獨立媒體的工作場域，發掘個別另類／獨立媒體在不同因緣際會下所生成的新聞實踐面貌、展示其與眾不同的生成過程與異質性。因此，在研究對象的挑選上，比起「普查性」的田野工作，研究者決定從台灣網路原生另類媒體組織選擇一個具有多元工作模式且不斷生成變動的另類／獨立媒體，深入發掘其新聞實踐面貌與生成，藉此揭示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與流動。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從文獻有關另類／獨立媒體的定義以及近年台灣的媒體地景來看，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大抵可以分為「網路原生媒體組織」、「另類媒體集團」、「公民記者」以及「獨立媒體人（獨立記者）」等四種型態（詳見表 2-5-1）（管中祥，2015）。考慮到本研究關切的是以專業自許的另類／獨立媒體如何進行新聞實踐、如何從實作中體現自己的另類與獨立，研究者將研究範疇限縮於有專職新聞工作者的另類／獨立媒體，因此研究對象先排除業餘進行報導工作的

公民記者。此外，研究者考慮到已有研究者針對台灣獨立媒體人的新聞工作進行研究（郭姍君，2010），因此本研究將關注以組織型態運作的本地另類／獨立媒體。然而，另類媒體集團「台灣立報社」於2014年開始進行一連串重整，《破報》自此走入歷史，《四方報》、《立報》則先後停刊、進行重組改版，儘管兩者皆於重整後復刊，但考慮到當前的經營方式仍在試驗階段，研究者因而決定先將之排除在研究對象的範疇之外。

表 2-5-1、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列表

媒體形態	媒體名稱
網路原生媒體組織	上下游 News&Market 新聞市集
	焦點事件
	苦勞網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沃草
	環境資訊電子報
	報導者
	移人
	小地方新聞網（停刊）
	南方電子報（停刊）
	新聞 e 論壇（停止每日出刊）
另類媒體集團	立報
	破報（停刊）
	四方報
公民記者	We 公民新聞（停刊）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公民攝影守護台灣民主陣線
獨立媒體人 （獨立記者）	朱淑娟
	楊虔豪

資料來源：整合自管中祥編（2015）。《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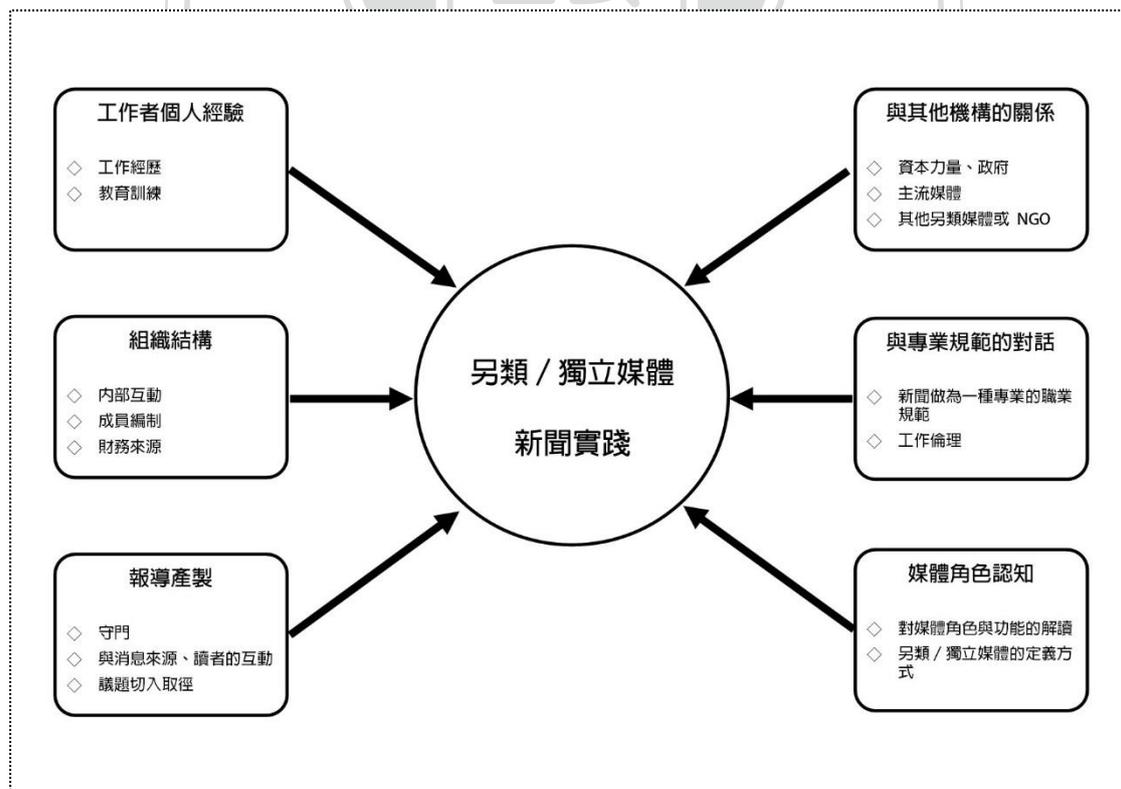
台北：紅桌文化。

研究者考慮到組織成立時間、內部工作方式、工作者聘僱型態與財務來源等因素，從網路原生媒體組織中挑選《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以下簡稱上下游新聞）做為研究對象，並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1. 《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當前的新聞實踐面貌為何？
2. 《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的新聞實踐樣貌是如何生成？如何進行分裂、連結與重組？

本研究所要探尋的「新聞實踐（journalistic practices）」，指的是另類／獨立媒體實踐另類媒體新聞學的實際工作方式，根據本章第二節有關另類媒體新聞學的文獻回顧，包括組織結構、內部運作與互動、新聞蒐集與處理、新聞價值、與閱聽人的關係等與新聞內容產製有關的實踐面向（詳見圖 2-5-2）。

圖 2-5-1、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向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一方面希望藉著走入另類／獨立媒體實際的工作場域，發掘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的每日工作樣態，並由工作者以圈內人觀點說明與詮釋他們的所作所為，藉此深描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另一方面，面對隨時因應內外情境變動而產生改變的另類媒體，研究者選擇採取一種與「變」共處的研究取徑，以塊莖思維關注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與工作者一同行走於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的地圖之上，從各種入口探索塊莖樣的另類／獨立媒體在地圖上留下的生成痕跡。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研究者選擇採行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除了藉由參與觀察法盡可能地瞭解另類／獨立媒體的工作樣貌外，更要藉著深度訪談讓工作者親自說明與詮釋他們的新聞實踐，確實描繪其新聞實踐樣貌，由工作者擔任塊莖「地圖」的導覽員，從不同事件（入口）進入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

第一節、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上下游新聞市集》

《上下游新聞市集》成立於 2011 年 09 月，是一個結合獨立媒體與電子商務的社會企業，組織分為新聞與產品兩個部門，分別對應大眾對農業資訊接觸有限、小農產品通路不足這兩個問題。產品部門除了販售小農產品外，也會主動開發友善環境的農產品，一方面提供小農銷售自製產品的通路、一方面將市集營業利潤投入新聞部門，支持農業資訊的產製與流通，2011 年至 2013 年產品部門主要以網路作為販售管道，2014 年另於台中開設實體店面「上下游基地」。新聞部門則採獨立運作，不收廣告、不做置入性行銷、不接受專案委託，報導農業、食品安

全、友善環境、食農教育等公共議題，除了聘請專職記者從事報導工作外，新聞網站也開放關注類似議題的公民寫手自行撰寫報導。

上下游新聞成立六年以來，內部工作者歷經許多有關新聞工作模式的嘗試與改變，實踐經驗豐富。再者，儘管現存另類／獨立媒體類別中，最為「資深」的媒體是成立逾 20 年的《苦勞網》，但相較於《苦勞網》，上下游新聞有較多採「團體戰」產製的報導，且在內容形式、財務來源等面向上有著較為多元的實踐方式。

再者，本研究將另類／獨立媒體視為開放、多元、異質、且具有多元入口的塊莖體，以塊莖思維看待另類／獨立媒體可以彰顯媒體的自我生成，也可以展現不同機構相互形構與生成的現象（吳姿嫻，2014：28）。研究者認為儘管另類／獨立媒體主張自己獨立於政商等社會機構之外，但仍會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與其他機構或媒體相互牽連，並受社會脈動左右媒介的實踐方式。也就是說，另類／獨立媒體的實踐場域並非真空，媒介生成的過程必然與其他機構、媒體組織、工作者或社會氛圍與變化有關，而上下游新聞便具不斷與域外物進行連結的特質。在財務來源上，儘管上下游新聞確實獨立於政府或企業之外，但其藉著販售商品支持報導工作的社會企業經營方式，便顛覆過往另類媒體新聞學在財務面向的認知。在對外關係上，上下游新聞曾與主流媒體《蘋果日報》合作，將報導露出於《蘋果日報》網站。2016 年末發表的《失控的低溫物流，揭開四大宅配亂象》調查報導，更成為《蘋果日報》報紙頭版，可見其與主流媒體的關係並非絕對分立敵對。

另一方面，上下游新聞面臨內外情境的轉變，經常調整組織的工作方式，成立六年以來，上下游新聞的面貌早已不同於往。上下游新聞面對政經環境、傳播科技與台灣媒體環境的變遷，隨時保持著改變的彈性以回應變動性極大的外在世界，而組織內部的人才流動，也隨時牽動著內部的新聞工作面貌，在每一次的組織重組中，上下游新聞都得嘗試重新找到適合當時團隊的實踐模式，這種變動也會反映在報導的選題、切入取徑等外顯特質上。

本研究認為上下游新聞多元、異質且不斷變動的實踐面貌，可展示以變為常的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如何進行新聞實踐、如何生「變」、如何生成。本研究選擇同時採用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一方面實際進到上下游新聞的工作場域觀察他們的日常新聞工作樣貌；一方面針對上下游新聞的歷來成員進行深度訪談。

二、 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

(一) 參與觀察法

要回答「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為何？工作者每日實作的樣貌為何？」研究者得實際進到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工作場域，才能從受訪者的所說所做中，發掘他們如何從事新聞工作、並從工作中體現自己的「另類」與「獨立」。針對上下游新聞進行參與觀察，將有助於研究者從工作者在新聞工作中的所做所言與詮釋中，描繪上下游新聞的新聞實踐面貌。

潘淑滿（2003：270-280）提到，參與觀察法源自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是一種深入被研究者世界、針對研究現象或行為進行資料蒐集與紀錄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觀察所欲研究的現象或行為，並取得被研究者對所作所為的詮釋，藉此深入紀錄、描述與理解研究所關心的現象與行為。黃應貴（2012：3）也指出，經由田野的參與觀察，研究者較容易接觸到來自被研究者主觀的文化觀點，這些觀點被稱為在地觀點。

上下游新聞不同於傳統媒體，沒有實體的辦公室，成員之間有關新聞工作的討論都在網路虛擬空間進行，因此當研究者詢及參與觀察的可能性時，上下游新聞創辦人馮小非建議研究者，與其進到記者每日的工作場域（如各部會），不如加入上下游新聞的臉書工作社團，實際觀察成員們在社團中的互動與討論，因為有關新聞選擇、報導切入取徑、觀點與可能的受訪對象，以及成員行蹤與當日負責工作等與日常新聞實踐有關的田野資料，都會出現在這個臉書工作社團。因此，研究者自 2017 年 04 月起以個人臉書帳號加入上下游新聞的臉書工作社團，從旁

觀察組織成員的互動、工作分配、資訊流通以及報導編採流程。

(二) 深度訪談法

研究者認為若僅由自身觀點理解從參與觀察獲得的田野資料，仍舊未能如實呈現工作者切身的工作經歷與想法。因此，除了參與觀察外，研究者也會訪談任職於上下游新聞市集的工作者，請他們談談自身的新聞實踐經驗(詳見表 3-2-2)。此外，研究者從過去和另類／獨立媒體人接觸的經驗中發現，對另類／獨立媒體而言，比起利用理論去驗證當前另類媒體的實踐，在每日新聞實踐中的所作所為才能真正彰顯自身的另類與獨立，如此種種實踐足跡，研究者唯有透過訪談取得受訪者的自我詮釋，才得以理解他們如此實踐的原因。

訪談在知識論上有兩種不同的立場，Kvale (1996, 轉引自吳嘉苓, 2012: 34) 以「挖礦」及「旅行」兩種隱喻探討訪談法的理論意涵，「挖礦」背後是實證主義的傳統，以「挖礦」的心態進行訪談，即是將受訪者視為知識所在的寶礦，只要方法得宜，任何礦工(研究者)都能挖掘到同樣的礦物。畢恆達(2010: 103)也提到，實證主義重視標準化的訪談方式，藉此力求不同受訪者皆能受到相同的「刺激」，透過訪談的標準化，研究者可以趨近於真實。此種作法忽視訪談過程中訪談時空、參與者等情境因素，以及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訪談資料的蒐集。「旅行」的隱喻則是受到建構論的影響，將訪談則是旅程，旅人(研究者)在這趟旅程中，可以根據事先規劃好的地圖踏上旅程，也可以視當下情境決定往哪個方向前進，與途中相遇的人一同創造每一場談話。

質性訪談或深度訪談比較像是一趟「旅行」，強調每一場對話都是萌生於特定的脈絡，所以受訪者勢必會因為訪談情境而給出不同的資料，研究者也會因為情境差異而改變提問與談話的方式(Kvale, 1996, 轉引自吳嘉苓, 2012: 35)。所以訪談資料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其模樣，受訪者並不是如實的呈現現實，而是視情境、與研究者的相處方式、自己對研究主題的理解等，決定自己要用何種方式重構經驗或想法(畢恆達, 2010: 104)。以旅行隱喻訪談，將訪談

視為受訪者和研究者在不斷互動的過程中，一同建構經驗、想法與意義的過程。另一方面，訪談的意義不能只放在受訪者給予的情境中理解，必須同時放在外部脈絡中檢視（畢恆達，2010），因為社會價值觀同樣影響著受訪者選擇回答問題的方式，而受訪者與研究者所處的訪談情境，也同樣影響著訪談的進行方式與內容（吳嘉苓，2012）。

研究者希望透過深度訪談瞭解當前另類媒體（暫時性）的新聞實踐面貌、另類媒體與外部的關係、至今歷經的變形與聚合等。再者，當研究者採用塊莖思維面對以變為常的另類／獨立媒體時，勢必得以動態的生成視角視之。Deleuze 和 Guattari（1980／姜宇輝譯，2010：14-15）以地圖繪製（Cartography）與拼貼（Decalomania）來隱喻塊莖的生成，將所欲研究的塊莖體視為地圖繪製者，研究者則是在地圖上的旅行者，從不同方向進入塊莖體在地圖上繪製的各式軌跡。研究者會因為入口的差異，而看到塊莖的不同面向，就如同前述將深度訪談視為旅行一般，研究者勢必會因為種種情境因素的差異，而看到研究對象的不同面向。不同面向的變化、不同受訪者的陳述，都可以被視作進入塊莖的多重入口。

考慮到上下游新聞內部歷經多次人員變動（詳見表 3-2-1），本研究所選擇的訪談對象不限於現職的記者或編輯，也會訪問曾參與上下游新聞實踐的離職成員（詳見表 3-2-2）。除了訪談仍在職的共同創辦人馮小非，以及三位現職專任記者孔德廉、賴郁薇、蔡佳珊以外，本研究同時訪問了曾於 2011 年 09 月至 2016 年 05 月，在上下游新聞擔任共同創辦人兼資深記者的汪文豪，汪文豪從上下游新聞成立之初便加入該媒體的新聞團隊，對於上下游一路走來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有著不可輕忽的影響力。另外，本研究認為必須取得於不同階段在職的工作者的觀點，才能完整描繪上下游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考慮到在職時間長度，本研究也訪問了在上下游任職約四年的記者林慧貞，以及任職 1 年 10 個月的記者郭琇真。總計訪問四位現職記者、編輯，以及三位已離職記者，總計七位受訪者。

在取得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本研究將視研究發現討論情境所需，決定受訪

者身分匿名與否。由於馮小非、汪文豪皆為上下游新聞共同創辦人，對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影響重大，為使讀者更容易進入訪談內容的情境脈絡，兩人的訪談內容皆具名處理。另一方面，其他五位受訪者除訪談內容可直接辨識受訪者，像是可從訪談提及的報導案例得知記者身分等，其他部份所引述的訪談內容皆匿名處理受訪者身分，以英文字母 A 至 E 代稱之。

表 3-1-1、《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歷來成員列表

受訪者	職稱	在職期間	在職時間長度
馮小非	共同創辦人、主編	2011/09~	5 年 11 個月（現職專任）
蕭名宏	共同創辦人、網站工程	2011/09~	5 年 11 個月（現職兼任）
孔德廉	記者	2016/08~	1 年（現職專任）
賴郁薇	記者	2016/08~	1 年（現職專任）
蔡佳珊	記者	2016/08~	1 年（現職專任）
李慧宜	特約記者	2016/05~	1 年 3 個月（現職兼任）
簡嘉穎	特約駐日記者	2014/07~	3 年 1 個月（現職兼任）
鄭傑憶	特約駐義記者	2015/02~	2 年 6 個月（現職兼任）
蔣慧仙	共同創辦人、主編	2011/09~2012/05	9 個月
鄭雅云	編輯	2012/05~2012/6	2 個月
汪文豪	共同創辦人、資深記者	2011/09~2016/05	4 年 9 個月
何欣潔	記者	2013/05~2013/11	7 個月
林慧貞	記者	2012/10~2016/08	3 年 11 個月
楊鎮宇	記者	2013/12~2015/03	1 年 4 個月
章倩萍	主編	2013/08~2013/10	3 個月
趙敏	記者	2015/03~2015/05	3 個月

潘子祁	記者	2015/04~2016/08	1 年 7 個月
郭琇真	記者	2015/04~2017/02	1 年 11 個月 ¹
羅健宏	記者	2017/06~2017/08	3 個月

表 3-1-2、本研究深度訪談概況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長度	訪談方式
馮小非	2017/05/07	3 小時	面訪
馮小非	2017/08/09	2 小時	面訪
汪文豪	2017/05/12	2 小時 50 分	面訪
賴郁薇	2017/04/30	2 小時	面訪
蔡佳珊	2017/05/07	1 小時 50 分	面訪
郭琇真	2017/05/12	2 小時	面訪
林慧貞	2017/06/08	2 小時 10 分	面訪
孔德廉	2017/06/09	1 小時 30 分	面訪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塊莖思維強調塊莖體有各種入口、沒有固定的參考模式，研究者得避免受既有觀點束縛，以多元且開放的思維嘗試從各種入口進入塊莖體，但作為一個經歷尚淺的研究者，若真採用完全開放的田野資料蒐集方式，將有可能使得研究充斥失去焦點的田野資料。因此，研究者基於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在進行田野探勘時以工作者組織結構、報導產製等面向，作為研究者進入另類／獨立媒體的入口（詳見圖 2-5-1），接著逐步視田野情境或當下所蒐集到的資料，

¹ 資料更新至 2017 年 08 月 20 日

向外擴充不同的關注面向。

吳嘉苓（2012）指出訪談分為結構化訪談與半結構化訪談兩種進行方式，結構化訪談依事先設計好的訪綱進行，要求受訪者按照已安排好的問題進行回應；進行半結構化訪談的研究者同樣會事先設計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但研究者會根據受訪者在訪談當下回答的內容，調整提問順序或問題內容。本研究選擇採用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事先根據上述關注面向列出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一）。

三、 研究者角色反思

為了彰顯研究者涉入現象可能造成的影響、確保研究者在進行訪談資料分析時能夠掌握訪談對象所欲表達的主觀經驗與意義，並擔保自己對現象提出的詮釋或解釋，能夠被其他研究者檢驗或接受（林本炫，1998：55）。研究者認為自己須揭示個人經驗會如何影響研究的操作、並反思自我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者曾於 2013 至 2015 年於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擔任專職執行秘書，期間接觸許多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與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密集互動。這個工作經驗會為研究者帶來正反兩面的影響，一方面將有助於研究者進入田野情境、並與現象產生連結，研究者也較能基於過去的互動經驗，理解研究對象所說所做背後的弦外之音、發掘可以繼續追問的問題；另一方面，研究者過去與工作者的互動經驗，以及研究者對於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既存觀察與理解，將有可能限縮研究者的視野，使研究者未能突破自身觀點的盲處，像是研究者可能會因為相似的現象不斷出現在過往的工作經驗中，而將現象視為理所當然，未能及時「搖紅旗」（藍佩嘉，2012：67），這是研究者進行研究時須克服的問題。

另一方面，黃應貴（2012：3）指出今日以參與觀察法進行的田野工作，試圖超脫研究者主觀或客觀位置的對立，轉而關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反身性關係，以及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角色，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也必須找到自身的立足點。由於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會無意識地影響研究者對被研究者的瞭解，所以

研究者根據自身瞭解所建構出來的知識，極有可能受到研究者的文化偏見所影響，在進行陳述與分析時，研究者需反思自己與被研究者或研究現象的關係，以彰顯透過田野觀察而得的知識，極有可能潛藏研究者觀點與偏見。

在研究操作與研究發現的書寫上，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提到，傳統的研究者試圖採取一個具有距離感的位置呈現受訪者的自述，就像自己完全外於受訪者的自述。然而，這種呈現方式會讓讀者誤以為受訪者自述就如鏡子般，完整呈現真實的自我、個人特質等，且研究者在自述中缺席。然而，訪談是受訪者與研究者一同經歷的旅行（吳嘉苓，2012；畢恆達，2010），除了情境外，研究者的存在同樣影響著受訪者決定以何種方式進行自我敘述，所以研究者從來都不是外於自述而存在的客體，他實際參與了自述的產生。因此，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建議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發現的書寫時，必須明確地呈現自己在研究過程及寫作中的位置。此外，研究者必須體認到自己無法呈現完整的「地圖」，研究者和受訪者只能一同經歷部分的地景，並創造出具有時空限制的訪談內容，這些內容無法呈現受訪者真實且完整的自我，因為塊莖總是在變動且永遠不會結束，研究者能做的只有呈現自己進入塊莖的路線。所以研究者所採行的寫作方式必須要能喚起讀者的塊莖式思維，藉著呈現不同的故事線、介紹不同的入口、從不同的「I」（受訪者）切入等，明確地告訴讀者研究所呈現的內容只是眾多可能的敘述之一。

第二節、研究者的研究取徑：將自述視為塊莖

首先前往你的第一株植物，從那點出發，仔細觀察水流的痕跡。雨一定已將種子帶到遠處。沿著水流所形成的小溝，你將辨認出水流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尋找那株離你所在植物最遠的植物。所有那些在兩者之間生長的魔鬼草都屬於你。隨後，最後這些植物又將傳播他們自己的種子，而通過跟隨從每株植物出發的水流的痕跡，你得以擴張你的界域

(Carlos Castaneda, 1968, 轉引自 Deleuze & Guattari, 1980 / 姜宇輝譯, 2010 : 13)

Deleuze 和 Guattari 所引用的這段話，說明了採用塊莖思維的研究該如何探尋塊莖的生成。如前所述，塊莖以地圖繪製與拼貼式的方式進行生成，不同於樹狀的模仿或再製可以追溯／發展到同一者，塊莖的每次生成都是獨特且不可預測的，研究者無法事先決定該往何處前進，只能從多重的入口進入地圖，沿著塊莖體在地圖上的生成痕跡，繪製出塊莖體可能的生成樣態。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指出，任何的研究者都只能探窺到地圖的某個部分，對於地圖上的其他部分只能匆匆一瞥或截然未知。就如同上述這段話，儘管研究者看似已經找到「最遠的那株草（疆界）」，但這株草隨時都會再次向外擴界，「最遠」其實只是研究者循線到達的「中間點」，研究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裡，窮盡塊莖體中所有的入口、繪製完整的生成路線。

本研究參考 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將自我敘述視為塊莖的做法，希望讓受訪者自行決定要從哪裡開始陳述媒體的生成、選擇對自己來說是重要的生成過程。但若受訪者無法決定陳述的內容，研究者將從上下游新聞的「變」切入，請他們談談對自己來說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變化，瞭解上下游新聞當前的新聞實踐樣貌是如何生成、歷經哪些轉變、如何進行分裂、重組與連結，以此探詢上下游新聞疆域化—解域化—再疆域化的生成路徑，

其中，研究者將訪談視為一趟與受訪者一同進行的「旅行」，讓受訪者作為旅行的導覽員，帶領研究者經歷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在這過程中，受訪者會視情境、與研究者的互動、對研究主題的理解等情況，決定要用何種方式重構自身經驗或想法（畢恆達，2010：104）。透過訪談，研究者冀望可以發掘受訪者對於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樣態的說明與詮釋，以及受訪者在另類／獨立媒體生成過程中的經驗，而這些資料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訪者的自我陳述。

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認為，後現代時空下的自我陳述 (narrative selfhood)，是不流暢、非線性、去結構與去中心化的，且不同的人會採用不同的自述方式，並不存在與生俱來或固有的自述結構。因此，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建議研究者採用將自述視為塊莖的隱喻，隱喻作為一種指引我們進入世界的視野、一種調查世界特質的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擺脫傳統敘事結構的限制，採行有助於反映後現代自述特質的觀點。將自述視為塊莖具有下列幾項特質，首先，作為塊莖的自述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它有多重的入口，每一個入口都會導引至一個暫時性的自述描繪。受訪者從話語和書寫中創造自我，每次創造中都會創造出不同的自我，「self」從一個穩定的名詞，轉變為總是在進行中的動詞。所以研究者從田野經驗中所獲得的自述資料，其實都只是進入塊莖體的暫時性入口 (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638-640)。另一方面，根據入口的不同，會導引受訪者與研究者進入不同的自述故事，所以做為塊莖的自述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敘述方式，每一次的敘述都是暫時且因情境而定的。

入口的選擇則是受到當下情境所影響，如同 Kvale (1996, 轉引自吳嘉苓, 2012: 35) 所提，受訪者勢必會因為訪談情境而給出不同的資料，研究者也會視情境而調整提問與談話的方式。研究者得意識到脈絡會形塑自述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會限制自述的內容。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也提到，每一次的自述都是對當下故事情節的接管，暫時排除其他種可能的情節，但隨著脈絡的轉變，會導引自述至另一個入口或故事情節。所以研究者必須構連自述資料與訪談的產生脈絡，檢視自述產生的情境、訪問的問題，以及研究者和受訪者的位置等情境因素對自述內容的影響。

再者，將自述視為塊莖時，傳統自述研究中的因果思考將被拼貼思考 (patchwork thinking) 所取代。如同每條線都有和另外一條線連結的可能，自述情節之間的連結也隨時都有可能斷裂、轉而被新的連結所取代。現象可能會和某一事件連結在一起，以解釋現象的成因，但他們之間的連結隨時都有可能被斷開，

現象轉而跟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產生連結，找到另外一個觀看現象的入口（Sermijn, Devlieger, & Loots, 2008: 642-644）。

最後，Sermijn, Devlieger, & Loots（2008）指出，若將自述視為一幅地圖，訪談就是受訪者與研究者一同繪製地圖的方法。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和受訪者共同經歷一段旅行，一起經歷、暫時安身於地圖上的某一部分。在這段旅程（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和受訪者的遊牧足跡並不會死亡，他們會在其他路線或連結（其他研究）中，進一步成長。這種說法就如同建構論者將訪談視為旅行的觀點（吳嘉苓，2012；畢恆達，2010），將訪談視為受訪者和研究者一同建構經驗、想法與意義的過程。



第四章、研究發現

第一節、以變為常：上下游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

《上下游新聞市集》成立六年來，歷經多次組織編制調整與成員流動，由於上下游新聞未具制式化的報導產製流程，隨時都有可能因應內外情境的變動而調整組織工作方式，成員及組織編制的變化時時牽引著上下游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為幫助讀者進入本節相關討論的背景脈絡，研究者先於本節一開始簡略說明上下游新聞從 2011 年成立至今六年來的人事及職務變動（參見圖 4-1-1）。

上下游新聞成立之初採行近似於獨立記者的工作模式，成員編制僅有資深記者汪文豪及主編蔣慧仙，此時主編僅負責執行上稿工作，記者握有大部分的新聞產製決策權力，2012 年上旬蔣慧仙離職，改由馮小非暫代主編，編輯職務內容不變。爾後隨著年輕記者加入，資深記者汪文豪同時身兼採訪主任角色，協助年輕記者改稿與選題，馮小非則是繼續暫代主編。

2013 年下旬，上下游新聞考慮到自身對臉書社群經營的需求，增聘專職主編章倩萍負責編輯與社群經營工作。此波職務調整中，馮小非理應徹底回歸產品部、與新聞部脫鉤，但此時新任主編對網站頁面編輯仍不熟悉，馮小非因而在處理產品銷售與開發之餘，仍協助編輯新聞網站頁面與上稿。2013 年 11 月，因上下游新聞內部對於該如何處理報導爭議有著不同的見解，專職主編主動提出離職，此時由馮小非回接主編，負責上稿、下標與撰寫臉書推文。

2014 年以降，馮小非有感於上下游新聞選題與寫作方式逐漸與讀者脫節，未能即時回應外部情境變動與讀者需求，因此逐漸增加對新聞部門報導產製過程的介入，包括加入選題討論、調整年輕記者寫作方式、明定交稿時間等。另一方面，期間資深記者汪文豪曾因個人因素留職支領半薪，退出日常稿件產製，僅以顧問角色參與組織運作，代為管理新聞部運作的馮小非因此增加與年輕記者互動

的機會：「我也逐漸增加與記者互動（的機會）、甚至介入題目討論。（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自此因與新聞部成員互動頻率增加、且雙方對於馮小非嘗試推動的制度化工作模式未能取得共識，馮小非與新聞部成員之間的衝突日增：「因為與過去較為鬆散自由的方式不同，逐漸引起摩擦。（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2015年07月，為了明確區分內部職權，新聞部門改由汪文豪全權負責，身兼主編、採訪主任與資深記者，馮小非則是回到產品部門全心投入小農產品的銷售與開發。同年10月，汪文豪因個人健康及學業因素卸下新聞部主管一職並留職僅領半薪，馮小非再次暫代新聞部主編工作，統一處理下標、上稿、選題、工作分配、改稿等工作。2016年05月汪文豪正式離職後，馮小非正式接任主編，職位與負責職務維持迄今。

圖 4-1-1、《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內部編制與角色流動



一、 三種新聞類型的演變

就如同主流商業媒體的報導可依更新頻率、報導內容、文章結構等性質上的差異，分成每日新聞、即時新聞、調查報導、專題等新聞類型，上下游新聞的報導同樣可區分為每日即時（daily news）、日常主文與深度專題等三種新聞類型。每日即時處理的議題為政府部會發佈的政策資訊、相關團體活動，以及農業食安事件最新消息等，單篇字數約 1000 至 1500 字；日常主文主要報導產業現場、特色食物、環境生態、產業論壇等，相較於每日即時，日常主文對於報導脈絡的描寫較為深入，且著重再現報導的現場與故事線，單篇字數約 1500 字；深度專題則是關注議題長期性的趨勢，探究一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產業現象、政府忽視的產業問題等，字數因議題而異。

然而，上下游新聞並非一開始就確立這三種新聞類型。點開《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的歷史頁面可以發現，成立之初上下游新聞的報導類型以關注農業、食物與友善環境的日常主文或深度專題為主，多是記者主動發掘的農民及產地故事、或是探討特定現象的報導等，當時上下游新聞編制僅設有記者 1 人及主編 1 人，分別是資深記者汪文豪及主編蔣慧仙，平均每周發稿 2 至 3 篇。到了 2013 年上旬，有關抗爭活動、政府部會記者會等每日即時新聞的出現頻率日增。

成立初期，上下游新聞自許成為一個「獨立的新聞媒體」，在創辦宣言中特別提到《上下游新聞市集》要讓記者進行獨立的報導與調查（上下游編輯部，2011 年 09 月 04 日）。當時，「獨立」所映照的是主流媒體受政商力量與廣告主牽制，壓縮記者報導空間的現象。為了實踐「獨立」，《上下游新聞市集》除了透過販售小農產品取得財源上的獨立以外，同時採取一種近似於記者個人獨立作業的新聞工作模式。儘管當時組織已設有主編與記者等兩種職位，但記者仍具有絕大部分的報導產製決定權，可以自行發掘議題，稿件的守門也由記者獨立進行，記者將完成的稿件上傳臉書共同社團，若主編沒有太大意見便直接對外發佈稿件，有時甚至由記者自己上稿、不需經手主編。這種工作模式讓記者個人對新聞的定義

與見解，直接呈現在上下游新聞的報導中。時任資深記者一職的汪文豪便認為，上下游新聞是一個剛成立、知名度不高的小型媒體，有鑒於當時主流媒體的報導多強調輕薄短小，上下游新聞必須藉著深度的專題才能建立品牌特色，打出與主流媒體不同的市場區隔，藉此慢慢累積知名度：

如果我們要去跟一般的媒體去拚每天的即時性新聞，我們沒有任何的優勢，因為我們的粉絲團很少嘛，然後也默默無聞。那如果你今天是要人家對你上下游這個品牌有感覺，你就是要做一些比較深度性的報導（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因此，從2011年09月成立至2012年末，上下游新聞的報導類型多是強調深度與分析性的深度專題及日常主文。有別於主流媒體講求速度、忽略深度與廣度的報導，上下游新聞的報導深入探究議題的脈絡與成因、發掘不同的切入角度、盡可能地呈現議題的多元觀點，期望藉此讓默默無聞的上下游新聞在媒體市場中突顯自己的特色並建立公信力。以2011年05月陸續爆發的新北市校園營養午餐弊案為例，當時主流媒體的報導多著重在檢調搜索進度、不法回扣金額數目等，上下游新聞記者汪文豪不跟隨主流媒體的報導框架，轉而從新聞資料庫、調查報導等歷史資料，試圖切出一些異於主流媒體的報導角度，最後從法規、校園食品中毒案件、有機營養午餐案例、校園食農教育等不同觀點切入，以系列專題報導。有別於主流媒體以社會案件觀之，上下游新聞發揮了食農專業媒體的功能，從各面向深入剖析營養午餐相關的結構性問題。

2012年中，由於資深記者汪文豪無法同時顧及農業、食物與環境三條路線的新聞，上下游新聞因而聘用記者林慧貞，該時組織一共有1名主編與2名記者。由於林慧貞對於上述路線的相關專業知識認識尚淺、無法獨自經營分析性的深度專題，因此當時由其發表的報導以1500字的日常主文為主，題目多由資深記者汪文豪或主編馮小非推薦，在向其說明可能的切入角度與受訪者後，由林慧

貞執行採訪報導：「他們也會指定給我，比方說農委會的新聞稿，就會 pass 給我叫我去問，或者也會請我自己去發掘。(林慧貞，2017 年 06 月 08 日)」

此階段上下游新聞所發表的報導類型，仍以深度專題與日常主文為主，但組織內部開始擺脫過往近似於獨立記者的工作模式，慢慢發展出團隊合作的運作形態。除了主編和記者之間的討論變多以外，資深記者與新進記者間也發展出類似「師徒制」的相處方式，由汪文豪帶著林慧貞到各新聞現場進行採訪報導，並傳授農業、食物與環境的知識與人脈：「一開始都是他（汪文豪）帶著我跑。(林慧貞，2017 年 06 月 08 日)」

到了 2013 年，食安事件一樁接著一樁爆發，從是年 5 月「違法使用順丁烯二酸酐的毒澱粉事件」、8 月「胖達人香精麵包」到 10 月爆發的「食用油油品事件」，都讓主編馮小非覺得在食安事件中，民眾需要即時知道哪些食品有安全疑慮、該如何應對，因此在處理相關議題的新聞時，上下游新聞應該採用有別於以往重視深度與分析性的處理方式，轉而強調新聞資訊的更新速度：

我那時候覺得我們不能不做即時，因為我們做的東西（新聞）是每一天就像吃飯一樣的事情，例如說這個食安，不是等你久久再去追一次之後，就可以滿足的事情，他天天都在發生啊。(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食安議題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議題的特性讓上下游新聞開始嘗試做即時新聞、追蹤當日發生的新聞事件或政府資訊，記者的交稿頻率也從過往的 2 至 3 日交一篇稿，改成每日交 1 篇稿。相較於馮小非考慮到食安議題的特殊性、看重食安議題的資訊流通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以平面紙媒為例的主流媒體則是在考量到網路點擊率牽動廣告收入，轉而開始大規模追即時新聞。爾後由《蘋果日報》帶起的即時新聞浪潮更進一步讓馮小非意識到，在台灣媒體市場流通的新聞文類正在產生轉變。2013 年 06 月，蘋果日報由總裁黎智英向下推動數位化轉型，積極開拓網路市場，這波轉型的關鍵是以即時新聞搶攻網站及 App

流量，藉由即時新聞的高流量換取廣告。《蘋果日報》總編輯陳裕鑫將自家報社的即時新聞比喻為記者在現場的採訪筆記，極為講求速度，內容未必會按照新聞寫作的格式書寫，通常以片段、聚焦在某一個特點的方式寫作，記者每天發稿的則數為 5 至 6 則（何國華，2014 年 05 月：5）。

當《蘋果日報》大量發佈即時新聞、以輕薄短小且更新速度極快的新聞搶攻網路及社群市場，改變了讀者對於新聞的更新速度的要求，其他媒體也發現比起傳統的每日新聞或專題報導，即時新聞更能有效獲得點閱率，因而紛紛群起效尤，而即時新聞迅速更新的特質，也能幫助媒體在臉書等社群中得到使用者的關注。儘管上下游不以追逐點閱率為目標，但做為一個原生於網路的新聞媒體，上下游新聞不可能不受這波即時新聞浪潮的影響：

因為我那時候開始有感覺到，就是我覺得好像社會上的人其實是想要看即時新聞的。坦白說，我不覺得只是所謂收視率的考慮，因為收視率對我們來講並不會換成錢，所以不是去在乎它轉換的經濟效益，在乎的是，你如果沒有讀者，是不是表示你根本沒有影響力？（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馮小非認為，當其他網路媒體開始瘋狂追逐即時新聞，進而帶動讀者對新聞的需求產生改變，若上下游新聞未能因應外在媒體環境的轉變而調整自己所產製的新聞類型，將在這波浪潮中逐漸被邊緣化、無法發揮媒體的影響力。對此，汪文豪也提到，這波由《蘋果日報》所帶起的即時新聞浪潮，確實帶給馮小非很大的壓力：「我覺得大概就是蘋果即時新聞的影響，因為蘋果那時候是最快開始做即時的，她意思是說如果沒有 follow 蘋果的話，就是很擔心會被邊緣化。」（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

當馮小非表明上下游新聞也應該提供即時新聞這種新聞類型給讀者時，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編輯曾就是否要採用即時新聞展開爭論。上下游新聞成立初衷是

要產製具深度與分析性的報導，藉此發掘在主流媒體輕薄短小的報導取向中所忽視的議題或觀點，記者們擔心，若跟隨主流媒體的浪潮採用即時新聞，是否可能模糊上下游新聞的成立初衷：

我會覺得說，我們就不是蘋果喔，包括連 FB 什麼這些，我們規模是不一樣的，那你如果沒有獨特的角度觀點這些，你是沒有辦法在那個這麼龐大的社群裡面被大家看到的。(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

儘管即時新聞確實是主流媒體在社群獲得關注的方式，但資深記者汪文豪認為，上下游新聞是一個規模很小的網路媒體，人力、資源皆不如主流商業媒體，無法用數量與之競爭。例如《蘋果日報》便有 300 至 400 名的記者，每天約可產出 400 至 500 則即時新聞(林靖堂，2014 年 10 月 27 日)。再者，跟隨浪潮產製在其他媒體也能取得的即時新聞，並無法幫助上下游新聞在社群紛雜的資訊大海中脫穎而出、吸引讀者關注。汪文豪因而主張在報導中提供深入、廣泛的觀點與面向，才是上下游新聞的利基。與其將人力放置在即時新聞，不如致力發展具有獨特角度或觀點的報導，以此作為上下游新聞在社群世界與其他媒體競爭的「武器」。

另一方面，即時新聞帶給記者的工作壓力也是上下游新聞在採用即時新聞過程中所產生的爭論之一。上下游新聞在 2013 年開始嘗試跑即時新聞時，組織只有汪文豪、林慧貞兩名記者，其中汪文豪主要負責深度的專題報導，因此即時新聞的供稿大多由林慧貞負責。此時上下游新聞所提供的每日即時新聞，不同於《蘋果日報》每則 300 至 400 字的即時新聞，文長仍舊維持日常主文 1500 字的篇幅，內容除了記者會或相關活動所傳遞的訊息外，記者還會額外去訪談與事件或政策有關的關係人：「雖然是 Daily，但是跟一般的報紙媒體或你現在看的即時新聞來比，它內容資訊深度還是比較多一點。(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當記者以日常主文的規格處理即時新聞，但交稿頻率未因即時新聞的深度與分析性而有

所調整、同樣維持一天一篇的交稿頻率時，記者需負荷較大的工作與時間壓力：

「我覺得稿量的負擔太重。(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在處理即時新聞時，除了得注意時效性外，記者仍將內容深度與議題脈絡的完整性視為重要考量。對此主編馮小非認為，上下游新聞的每日即時新聞確實較一般即時新聞完整、深入，但對於其中的分寸該如何拿捏、該跑到何種程度，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編輯未能凝聚共識，以至於雙方都對於彼此的工作形態與要求有所怨言，馮小非提到：「(記者)的確就是會把 Daily 的東西撐大，撐大的確也會很辛苦啊、他的工作時間變得很長。可是我真的不希望是這樣，我不覺得要用主文或專題的規格做 Daily。(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即便上下游新聞成員都認為每日即時能夠幫助年輕記者培養農業、食物與環境路線的專業知識，就如同既有新聞學所提的「路線經營」，記者長期在特定路線深耕、經營關係、累積專業知識，藉此換取有品質的新聞產出(張文強，2016)。然而，在未調整出合理人力分配及工作模式的前提下，便以原有的人力與報導方式去回應讀者對即時新聞的渴求，對於記者來講是很大的勞動負擔，就算記者能夠理解每日即時新聞是經營路線的途徑，仍難免心生怨懟，汪文豪便提到：「我會覺得說你今天要做什麼之前，你要先回來檢視你的資源有多少，對，那今天你在人力就是不夠的狀況，你還要去跑那個所謂的即時……(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

主編馮小非認為，上下游新聞內部對於是否應該要跑即時新聞的討論，是上下游新聞成立以來面臨的第一個內部爭議，期間記者陸陸續續將自己的看法、旁人的意見、採訪報導時的實際體會等反應給馮小非。馮小非考慮到外在媒體情境的轉變，以及將每日即時視為培養記者專業知識與人脈的途徑，仍舊堅持推動每日即時成為上下游新聞處理的新聞類型。經過多次討論後，上下游新聞對每日即時新聞交稿頻率的要求仍維持一天 1 篇，主編與記者也未能就每日即時的規格與內容達成共識，以至於即便上下游新聞新聘記者加入工作團隊，依然未能減輕記

者的勞動負擔，埋下後續上下游新聞內部分裂的導火線。

新聞類型的改變，同時也反映到人員編制與各職位的工作內容。不同於 2013 年中開始嘗試跑即時新聞時，記者需同時兼顧日常主文與每日即時，上下游新聞到了 2014 年上旬設置了專門跑每日即時的記者職位，輪值每日即時新聞的記者需固守部會，不需處理日常主文，只要處理當日即時新聞即可，但當時未明定每日交稿則數，目前（2017 年）則是每日交 2 篇稿，會視當日情況調整交稿篇數。上下游新聞當前的編制共設有一名主編與七位記者，由馮小非擔任主編，七位記者中有三位是特約兼任記者，分別是高雄特約李慧宜、日本特約簡嘉穎與義大利特約鄭傑憶。另外四名則是專任記者，包括主跑深度專題的記者蔡佳珊，以及輪流跑每日即時與日常主文的記者孔德廉、賴郁薇與羅健宏。依負責新聞類型的不同，記者的工作型態也會有所差異。

負責每日即時的記者，每天固定於臉書虛擬編輯台提報隔天記者會或活動的時間與主題，讓主編有審稿、上稿的心理準備，交稿量為每日兩篇，單篇字數為 500~1500 字不等，會視情況調整稿件篇幅與交稿時間。另一方面，負責跑即時的記者因為上班時間大多駐守在農委會、有較多機會培養政府部會人脈，因而成了同仁接觸政府部會最新消息的橋樑，除了即時回報政策的脈動外，當處理日常主文或深度專題的同仁需要部會官員回應手中處理的議題時，有時也會請主跑每日即時的記者協助詢問。

有別於過去記者和主編對於即時新聞的篇幅和交稿頻率缺乏共識，當前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主編會視議題的特性，於事前決定報導篇幅，若議題沒有特別突出的新聞點，便以短篇新聞處理，交稿時間為議題發生後的一個小時內；若受議題面向較廣或聯絡不到受訪者等因素影響，使記者得花較多時間處理，記者需即時知會主編並說明所需時間，以便主編調整當日新聞的發表排程：

過去沒有討論這件事（交稿時間、處理篇幅），那現在的話它就成為一個共識……我們現在的團隊有發展出一種衡量時間的辦法，例如說這個

是短稿，一個小時就寫出來，這個稿子如果滿重要而且滿難寫、有一些需要再去確認的地方，好那你就去寫，但是不要超過晚上六七點，如果要超過的話一定要講為什麼。(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負責日常主文的記者則是固定於每周五提報下周預定處理的議題與出差地點，每周工作五日，其中有一日為記者發掘、評估線索、聯絡受訪者、整理稿件的在家工作日，其餘四日則是每日進行一則採訪，交稿量約為每周三到四篇，字數約 1500 個字：

(每周工作五天，交 3 至 4 篇主文) 有一天小非會留給我找題目、聯絡受訪者，然後把整周的稿件再整理一下。沒大事的時候理論上六日休假，但有時候要支援論壇之類的就一定會吃到禮拜六的假，所以我可能就是挑平日補休。(受訪者 A 訪談資料)

負責深度專題的記者同樣每周工作五日，採行一種近似於雜誌月刊的採寫模式，日常工作大抵是在研究議題、當地採訪、在家寫稿之間重複循環。考慮到報導處理的面向較為複雜，每篇專題所需工作時間也會視報導議題大小而有所差異，上下游新聞為了提供負責深度專題的記者較多專研議題的空間，沒有硬性規定深度專題的交稿頻率，但記者會主動定期於臉書虛擬編輯台回報專題的處理進度。深度專題的題目線索有可能來自政府部會發布的新聞稿件、官員發言、時令農業議題或記者之前的採訪經驗等：「比較是以議題式的出發點，不是即時，而是一個長期性的觀察或趨勢。(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二、 內部互動：成員相處與角色衝突

《上下游新聞市集》由馮小非、蔣慧仙、莊惠宜、蕭名宏、楊偉林與汪文豪共同創辦，成立六年以來，部份創辦人並未實際參與《上下游新聞市集》運作；

部份則是因特定因素離開上下游，只有馮小非和蕭名宏兩人從 2011 年 09 月成立至今，持續參與經營《上下游新聞市集》。相較於蕭名宏仍有其他工作，馮小非是全職投入《上下游新聞市集》，無論是產品部門的產品開發銷售，或是新聞部門的報導產製，都能看到馮小非參與其中，可以說《上下游新聞市集》當前所展現的面貌受馮小非的影響極深。因此，本研究試圖以馮小非於上下游新聞所扮演的角色為中心，向外推展描繪馮小非與其他成員，以及成員間的互動。

《上下游新聞市集》組織分為新聞與市集產品兩個部門，市集產品部門將販售小農產品所得的營業利潤投入新聞部門，新聞部門以此產製農業、食物與友善環境的相關報導，兩部門各自獨立運作。《上下游新聞市集》剛成立時，馮小非主要負責產品部門的產品開發與銷售，2012 年中新聞部門前任主編蔣慧仙離職後，馮小非才開始參與新聞部門的運作，爾後隨著內外情境的變動而對新聞部門的介入越來越深，如今已然成為上下游新聞的領導人。馮小非在上下游新聞的角色定位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是內部歷經多次的人員流動才發展至今，一如馮小非所說：

我在新聞團隊的角色一直在變化，到現在才真的很明顯，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我都是在弄產品啊，編輯也不是我……在那之後（蔣慧仙離職）我才開始去擔任編輯的角色，而且一開始是比較協助性的，就是上稿，後來才慢慢越介入越深。（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馮小非所謂的介入，指的是自己對上下游新聞報導產製的參與程度。《上下游新聞市集》成立之初，新聞部門僅設有兩名專任成員，分別是主編蔣慧仙及資深記者汪文豪，馮小非則是產品部門的主管。不同於主流媒體科層結構下，各職位分工十分明確，在小規模運作的上下游新聞內部，各職位所負責的工作內容是流動的，有時記者同時也得擔負編輯的角色，即便是擔任產品部主管的馮小非，也都有可能以編輯身分參與新聞產製。但就如同前節所提，此階段上下游新聞採

取一種近似於獨立記者的工作模式、不太干涉記者的報導產製，因此即便此時馮小非偶爾會參與新聞部門的運作，但參與性質仍屬於討論、交流，而非主導。

2012 年中，馮小非在前任主編蔣慧仙離職後，開始以編輯身分加入上下游新聞的報導產製。不同於傳統編輯需擔負守門與下標的角色，馮小非當時主要的工作是編排文章在網站的呈現，以及撰寫上下游新聞臉書粉絲專頁推文內容，而在主流媒體裡由編輯擔負的守門，則改由資深記者汪文豪負責。當年 10 月記者林慧貞加入上下游新聞工作團隊之際，上下游新聞還是由汪文豪主導新聞團隊運作，編輯馮小非不太介入記者的日常工作；如議題該用何種角度切入、該訪問哪些人、報導該如何撰寫等，都是交由記者兩人共同決定，馮小非僅會提供題目線索給記者參考。直到 2013 年食安事件連環爆發，馮小非在社群與讀者互動的過程中意識到上下游新聞需要跟上即時新聞浪潮，此時馮小非才開始增加對新聞部運作的介入，並推動上下游新聞開始跑每日即時。

在上下游新聞開始產製即時新聞的同時，上下游新聞的臉書粉絲追蹤人數成長陷入停滯。2013 年 08 月，上下游新聞聘請《蘋果日報》前副總編輯章倩萍擔任主編，除了負責稿件守門與下標外，章倩萍也從馮小非手中接下上下游新聞的臉書粉絲專頁（黃文慧，2014），上下游新聞期待章倩萍的專業經驗能夠幫助組織突破臉書的成長困境。此時上下游新聞共有汪文豪、林慧貞與何欣潔等 3 名記者，馮小非則是退出新聞部門的經營、回歸產品部門。上下游新聞組織 1 名主編加 3 名記者的編制，儼然已是一個小型的新聞室。

主編章倩萍將自己在《蘋果日報》經營臉書粉絲團的工作經驗帶入上下游新聞，一方面建立制度化的新聞工作模式，例如明定交稿時間、交稿量等；另一方面，章倩萍極為重視新聞是否能在社群時代吸引讀者目光，在撰寫標題與貼文引言時，會使用衝突感的書寫方式（黃文慧，2014），像是強調批判意見或具爭論空間的面向等。此外，為了配合臉書粉絲專頁發文頻率的變動，記者也需調整交稿頻率，固定每天都要產出 1 篇新聞：

也是為了維持臉書的熱度，就是臉書的曝光，演算法一直在變，反正那時候你要固定推新的東西，你才會有觸及率，不然你持續一段時間都沒有推的話，（觸及率）就會一直下降。（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章倩萍加入後不久，上下游新聞一則有關 248 農學市集的報導—〈農民市集進駐百貨成風潮 初衷不再？拓展市場？〉，引來 248 農學市集創辦人楊儒門的大力批評。楊儒門直接在該則報導下方留言向馮小非指責上下游新聞的報導有誤導消費者之虞，且記者在採訪過程中不尊重受訪者、為農學市集帶來困擾等。事發當晚，身為共同創辦人與產品部主管的馮小非在未與新聞部門取得共識的前提下，便率先於楊儒門的留言下方道歉，此舉被主編章倩萍及負責該則報導的記者何欣潔視為不信任新聞部成員的表現。對此，汪文豪提到，新聞室的獨立除了講求不受外力干擾外，內部不同部門成員同樣不宜干預新聞室運作，當時馮小非的職稱是產品部負責人，即便身兼共同創辦人，但其未經新聞部門同意便對外發言的舉動已危害到新聞室的獨立：

但是小非對新聞部的干涉會讓倩萍覺得說產品部怎麼可以干預新聞部，倩萍對這條線是非常堅持……那楊儒門的事情倩萍覺得火大的是說，你還搞不清楚什麼狀況，楊儒門上來留言你就道歉，那你這樣的意思是說我們新聞部還有何欣潔都有錯嗎？（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

上下游新聞從成立到 2013 年引入專任編輯，期間新聞部各職位的角色定位並不明確，例如汪文豪雖是資深記者，有時卻扮演主編或採訪主任的角色，協助其它記者選題、下標、並替其改稿，而馮小非雖是產品部負責人，同時也擔任新聞部的編輯：「其實他（編輯）都還只是停留在上稿，然後可能下個標、推引言，基本上整個新聞部門的主管是文豪。所有稿件的正確性文豪來確定……文豪可能要協助選題，那如果我有看到（線索）我也會提供一些意見（馮小非，2017 年 08

月 09 日)」。待專任編輯章倩萍進到上下游新聞後，馮小非理應退出新聞部門的運作，回歸產品部門，但因當時新任主編讓不熟悉網站系統，因而由馮小非協助編輯稿件頁面與上稿。另一方面，此刻外界仍將馮小非視為上下游新聞的代表，且新聞部成員未能妥善溝通彼此的角色定位，以至於面對 248 農學市集創辦人楊儒門在網站上的直接點名，馮小非基於維護《上下游新聞市集》整體和農民的友善關係的考量，因而直接在留言下方像楊儒門表達歉意（參見圖 4-1-2）。

圖 4-1-2、馮小非於報導下方留言回應 248 農學市集創辦人楊儒門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新聞部成員將馮小非的道歉視為對主編章倩萍與記者何欣潔的不信任，馮小非認為留言內「很抱歉」三字所對應的是報導為楊儒門及 248 農學市集帶來的不滿情緒，但不代表自己為了報導內容道歉：

我說（很抱歉）的意思是……因為他先直接 cue 我，我（在這段話）沒有說我們記者是錯的，然後接下來我有說，這幾天編輯部了解之後有寫了回應刊登在這邊……我覺得我說的『很抱歉』對應的是他的困擾，我

又不是為了內容跟他道歉。(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對馮小非而言，自己的留言是為了回應楊儒門的「點名」，但對於楊儒門在留言中有關報導與記者的批評，她在當下尚未有定見：「我也沒有去退讓任何一個立場啊，我也沒有叫你（記者）改文。(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雖說馮小非不認為自己的留言內容有否定新聞部的意味，只是想即時回應楊儒門並維護與農友長久以來的友善溝通，但對於新聞部主編章倩萍而言，此舉已危害到新聞室的獨立自主，章倩萍因而選擇離職。

2013年11月，章倩萍在任職三個月之後離職，馮小非再度回接主編一職、負責臉書經營。此時馮小非一方面持續推動將每日即時新聞納入上下游的新聞產出類型，另一方面，她也認為上下游新聞處在一個訊息量爆炸的社群世界，新聞內容應該朝多元化發展，除了嚴肅的專題外，同時也該處理一些與民眾日常生活較為相關的軟性新聞，例如都市養雞方法等。馮小非提到，報導議題多元化的發展須由記者和編輯一同推動，編輯負責從日常對讀者與社會氛圍的觀察中，找到民眾可能關心且有意義的題材；記者則是依自身的採寫專業將議題產製成報導，雙方必須保持密切的合作，不能再像過往般各行其事。例如從採訪前的選題、切入角度討論到呈現時該配什麼圖片、要用哪種寫作文體，記者和編輯都得事先規劃與討論：「要有團隊才能夠真正的把這些所有東西整合在一起，就是記者想要的專業度、編輯這邊從讀者行為當中、從社會氛圍當中感受到的東西。(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馮小非對於上下游新聞應該調整過去近似於獨立記者的工作模式、改以團隊合作模式運作的想法，直接反映到她在主編角色的實踐。馮小非以「整合」描述她對團隊運作的想像，在整合的過程中，主編扮演帶領團隊、連結讀者與記者的角色，也就是說，主編在組織的定位近似於傳統媒體的採訪主任，主導著組織的發展與走向：

最早的時候編輯只是上稿，我覺得新聞（就）記者自己發動就可以了，那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我現在覺得編輯的角色……兼具行銷跟議題發動者，還有他是一個非常大的讀者跟記者中間的橋樑。（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馮小非做為具有採訪主任定位的主編，一方面一如以往地負責稿件的編輯與呈現；一方面開始提高對上下游新聞報導產製的介入，像是明訂交稿時間、參與選題、建議記者議題切入角度等，對她而言，這都是在形塑團隊化的運作模式。但對於記者來說，這股由馮小非握有的主導性力量，已影響到自己原有的工作模式，甚至危害到記者的新聞自主空間：「小非身為編輯，她在跟記者溝通時，我覺得那不是溝通，很多時候是她在下指導棋、她覺得一定得這樣做。（受訪者 C 訪談資料）」

記者之所以用「下指導棋」來指涉馮小非對新聞工作的介入，原因在於上下游新聞所處理的議題經常涉及爭議性議題，例如不同農法在農藥使用上的差異、人體能夠代謝的化學殘留量等，面對這些爭議性的議題，記者認為主編馮小非有時會要求自己採用特定立場或觀點進行報導，儘管馮小非採用特定觀點的立意大多是站在媒體監督政府的立場，但此舉仍影響到記者的新聞自主。再者，記者認為一味採行批判的觀點、未能妥善處理各方意見，將讓報導流於謾罵，未能藉由報導促成多方意見的溝通，進而達到建設性的作用，像是法規修正、解決不同立場的衝突等。受訪者 C 曾於另一以另類自居的媒體擔任記者，她提到：「主要還是因為小非的個人主觀意見很深，對，然後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在上下游……記者受到更多的壓迫。（受訪者 C 訪談資料）」受訪者 C 在其他另類媒體的工作經驗中，記者和編輯的關係是對等的，兩者之間可以維持良好的討論；在上下游新聞，由於編輯同時具備採訪主任的性質，對記者而言，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上對下」的指導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馮小非對新聞部門的介入越來越深，但她仍不會干涉資

深記者汪文豪的新聞自主空間，汪文豪仍能自主掌握報導產製工作。然而，不同於尊重汪文豪新聞自主的相處模式，馮小非則是大力介入年輕記者的新聞產製：

「小非可能比較威權式，對我還好她不太會，她對年輕記者會覺得你們這些年輕記者就是需要訓練。(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從馮小非的觀點來看，介入年輕記者的新聞產製，都是為了培養、訓練年輕記者，但對年輕記者來說，馮小非的舉動其實反映出她對年輕記者的不信任，尤其當記者嘗試與馮小非溝通討論出一個較為恰當且彼此都能接受的報導作法時，馮小非經常不採用年輕記者的意見，並反過來「指導」年輕記者該如何做新聞：「小非可能會顧慮年輕記者經歷尚淺、新聞敏感度有待磨練，溝通起來，如果要說服她會比較有難度，但若資深記者加入討論，小非會比較容易採納意見。(受訪者A訪談資料)」

馮小非回接主編一職後，多次就報導要訪問哪些人、如何切入議題等新聞處理方式與年輕記者產生衝突。2016年上旬資深記者暨共同創辦人汪文豪離職後，馮小非徹底職掌《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以主編身份負責網站稿件的編輯、審核記者交回的稿件、下標題、撰寫臉書粉絲專頁推文、主導工作分配等。年輕記者與馮小非的衝突也隨著彼此互動越來越頻繁而與日俱增，爾後郭琇真便因有感於自己在上下游的新聞自主空間受到嚴重危害，因而離職。

Atton(2007)提到當另類／獨立媒體裡的每一位報導者都可以在新聞編採過程中享有相同或近乎相同的決策權力時，可以避免另類／獨立媒體屏除或區別特定觀點與議題，Atton將這種去階層化的關係稱為「傳播過程中的水平連結」。但在以獨立媒體自居的上下游新聞內部，各成員所享有產製決策權力仍具差異。馮小非雖說職稱是主編，但她同時也是《上下游新聞市集》的負責人，因此除了稿件編輯之外，有關人事聘用、成員差勤等人事管理同樣由馮小非負責。儘管馮小非曾在內部會議表明自己並不覺得和記者之間屬於勞雇關係，一直以來都是以編輯身分與新聞部成員互動，但記者實際上認定馮小非就是記者的「雇主」：

我覺得在當時因為我沒有意識到我被當作老闆，我沒有意識到我被當作

主管、資方……我當時覺得我只是站在編輯的角度上面去跟他們碰撞，但是我後來才意識到說，在他們眼中我不只是一個編輯，我是老闆，所以他們可能覺得我是在行使一個老闆的權力或主管的權力，或者是我是倚老賣老、以大欺小，可是對我來說我只是站在編輯的角色上面。（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在一般的媒體組織裡，記者和主編是同事，除新聞工作外，兩者不具直接利害關係。然而在上下游新聞，記者所面對的主編，既是自己的同事也是自己的雇主，除新聞工作外，雙方還會就勞動權益展開討論，記者林慧貞便曾因差勤休假問題與馮小非產生衝突。不難想像，即便是在強調去階層化的另類／獨立媒體，記者與兼具同事與雇主雙重身分的馮小非互動時，仍會因位置的差異而產生階層化的互動方式。尤其對年輕記者而言，面對資歷、社會資本都比自己高出許多的主編馮小非，在與之互動的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勢必較資深記者大。

上下游新聞成立六年來，新聞部門成員多次因各自對新聞工作、角色定位有著不同見解而產生內部衝突，從過往的經驗看來，衝突的結果經常是人才的流失。這些衝突與人才流動的經驗，讓主編馮小非意識到自己之前未能積極透過溝通弭平與記者的認知差異：「我覺得如果是有共識就會比較好，可是我覺得我沒有意識到那是一個沒有共識的情況，所以變成是在強扭，那我就覺得這個就不好了。

（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馮小非也承認過往的溝通方式會折損自己和記者之間的信任關係。現今，馮小非一旦自己和記者產生齟齬，她傾向與記者開誠布公地進行溝通，也會特別注意溝通方式是否恰當，例如溝通時盡量避免使用會讓記者覺得自己已有定見、或是在質疑記者的詞彙：「現在如果發生衝突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直接把這個人約出來，跟他說無論如何我們要好好的談一次，而不是像先前那樣（避而不談）。（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2016年中至2017年初記者汪文豪、林慧貞、潘子祁、郭琇真陸續離職，他們在上下游新聞分別工作了一年半至五年不等，該時上下游新聞換了一批全新的

工作團隊。目前的編制由馮小非擔任主編，以四名專任記者蔡佳珊、孔德廉、賴郁薇與羅健宏擔綱，另與三名特約兼任記者李慧宜、簡嘉穎與鄭傑憶合作。四名專任記者中，除蔡佳珊具一定採訪資歷外，另外三名記者都是剛開始接觸農業、食品與環境路線的新聞，所以當主編馮小非對於年輕記者的工作方式及報導提出意見時，年輕記者若有不同的看法，仍無法在具同樣決策權力的位置上與主編進行溝通。但研究者從訪談中發現，比起直接與主編起正面衝突或完全臣服於主編，目前的年輕記者會用各種較具彈性的協商方式，當面、透過電話或直接在臉書虛擬編輯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和主編討論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做法：

雖然她不見得會全盤接受，但是 she 會聽我講完、知道我的顧慮是甚麼，然後她同時也會跟我說她要的東西是甚麼、她覺得甚麼東西才是重點……但是如果她的方向我不接受的話，我會說但是我覺得甚麼地方（有問題），會在那個（溝通）過程中磨合出我們兩個都可以接受的答案。（受訪者 A 訪談資料）

有時年輕記者會以受訪者或專家的意見提升自身說服力，或是委婉表達自己對於主編建議做法的擔憂，讓主編理解自己身為記者的為難之處，並在如此一來一往的過程中，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某些時候也會先擱置爭議、處理彼此都有共識的部分，若遇到具爭議性或涉及較多專業知識的議題，當年輕記者發現自己的資歷或相關知識尚不足以和主編進行深入的討論時，他們會將討論場域挪至上下游新聞內部成員都在的臉書社團，直接在社團內表達自己的看法，並邀集組織其他成員一同加入討論，一方面藉此填補討論過程中記者和主編之間因為知識落差而造成的討論困境，二方面藉由討論發掘切入議題的各種觀點，避免通篇報導的觀點過於單一：

因為我的經歷可能沒有她（主編）多，那基本上我就是多問，多問農民

的說法、或是產銷班或是盤商的說法、或是其他說法，就是用很多例子告訴她，這樣的看法不一定是代表整體，我覺得用實際的例子來說是最有用的。(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儘管在產製過程中，不同成員所享有的決策權力有所差異，但內部記者在談及與主編馮小非的相處方式時，引述其他在主流媒體工作同學的經驗表示，相較於主流媒體，上下游新聞的記者與主編之間具較大的討論空間，記者對於每日的工作內容享有較高的自主性，也有較多能夠自行規劃該跑哪些新聞的空間：

我覺得這部分確實，跟主流相比我們跟長官溝通的空間算滿多的，就是主流媒體哪個長官可以接受你打電話跟他吵架啊，我覺得這一部分我們的溝通空間還是有，至於說自己的意見會不會採納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你有講的機會。(受訪者 A 訪談資料)

我會覺得小非是願意跟我們做很細的溝通的一個主管，那個細的程度已經到比如說標題用字，問你這樣子好不好，那這樣還有甚麼不能溝通？比如說你取材的角度，這我也覺得完全都可以溝通啊，比如說小非她可能有一個軸線，那我們希望另外一個軸線來平衡，這本來也是理所當然啊。我覺得表達的方式對了，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你不要硬碰硬。(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另一方面，即便偶有衝突，但在採小規模組織運作的上下游新聞裡，因互動頻繁，成員間的關係仍較科層化層度高的大型媒體緊密，經常以協作、討論、共同評估等方式，支持彼此負責的新聞工作。例如上下游新聞沒有實體的辦公室，四名專任記者和主編分處台北、台中二地，且另有三名分別住在高雄、義大利和日本的兼任特約記者。考慮到時空的限制以及記者大多在外採訪，上下游新聞以臉書社團做為「虛擬編輯台」取代實體辦公室、成為上下游新聞組織運作的場域，

藉由社群網路不受時空限制的特性，連結處於不同地點與時區的成員。社團除了可以編輯稿件、討論報導方式、交換資訊與知識外，同時還具有成員工作分配、上班日協調、成員採訪與日常心得分享等功能。

由其成員在臉書虛擬編輯台上的資訊與知識共享，可以促進成員間的相互學習，並減少彼此因時空差異而產生的疏離感、建立團隊的凝聚力：「我們是一個團隊，所以我們大家彼此的學習跟討論（的）共享機制要出來，不要變成說是一對一的（互動）」（受訪者 B 訪談資料）。從實際觀察可知，目前上下游新聞成員經常在虛擬編輯台分享自己從採訪工作、日常觀察及閱讀中獲得的感想與發現，這些知識的分享有助於其他同仁發掘值得報導的新聞議題，並藉著在虛擬編輯台的討論交流，刺激雙方對議題的理解與想法。

透過虛擬編輯台進行資訊與知識的共享，也能促成記者合作產出觀點較為多元的報導。上下游新聞的特約記者中，有的是處理自己擅長的農村與環境議題、有的則是報導居住國家的農業與食品政策，藉此映照台灣現況。除了單獨發表報導外，特約記者有時會和專任記者合作，共同發動深度專題。居住日本的特約記者簡嘉穎便曾與專任記者蔡佳珊合作，發表〈路邊捕獲基改豆—基改種子落地生根調查報導〉，由簡嘉穎翻譯解析日本民間發佈的調查報告、採訪該報告的研究人員，以及日本的基改作物相關法律規範，蔡佳珊則是負責處理台灣的黃豆落地現場、黃豆運送軌跡、本地基改汙染現象與當前的政策規範等。

三、 守門：新聞處理

「守門（gatekeeping）」指的是媒體經過層層篩選、編輯等程序，將數量龐雜的資訊產製成新聞的過程。Bass（1969／轉引自陳順孝，2003年08月27日）將守門區分為「新聞蒐集」與「新聞處理」兩大產製流程，其中記者主要負責新聞蒐集工作，編輯則是負責新聞處理。這裡先處理上下游新聞如何進行改稿、下標等新聞處理工作，下一小節再探究上下游新聞如何進行選題、從何蒐集訊息。

在科層化分工明確的主流媒體裡，通常都有一套制式化的新聞處理程序。以報社為例，稿件交到編輯手上後，需經校對、整理、刪增內容與下標等編輯程序，並通過負責編輯、主編、採訪主任、總編輯的審核，最後才能呈現給讀者。陳順孝（2006年3月21日）提到，編輯在新聞處理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負責根據內外情境、媒體目標、閱聽眾特質，篩選、調整與重組報導內容，並進行標題寫作與版面設計等編輯工作，藉著呈現新聞精華、包裝新聞來吸引讀者閱讀。

相較於主流媒體，上下游新聞內部並不存在規範明確的守門程序，守門程序會隨著成員對職位角色定位的不同認知而有所差異。例如，上下游新聞成立之初僅設有1名主編與1名記者時，此時編輯的定位是「上稿人」，記者汪文豪才是最主要的守門人，需自我檢視報導是否需增修、結構是否完整、觀點是否足夠、並自己下標。提及用何種標準進行守門判斷時。汪文豪表示最基本的就是語句和段落是否通順，再來則是檢視報導是否做到多方面的平衡：「除了當事人還有被質疑的當事人，一定要有平衡。（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汪文豪將平衡視為重要的報導守則，即便另類／獨立媒體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不能因此忽視被批判方的回應，尤其上下游處理的深度專題或調查報導，經常涉及不同立場的科學爭議或政策法規困境。對此，汪文豪認為記者得格外留意報導是否給予所有相關當事人發表自身觀點的空間：「就像法律的訴訟權益，你今天是被告，但是你的訴訟權還是要保障。（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2012年末過後，上下游新聞陸續增聘記者，人員的變動讓上下游內部的守門角色起了變化。如本節第二小節所說，隨著年輕記者的加入，主編馮小非對於新聞產製的介入越來越多，守門的責任也漸漸由汪文豪與馮小非一同承擔。年輕記者加入後，上下游新聞主要的守門人是馮小非，負責審核稿件內容與下標，而資深記者汪文豪除了處理自己的稿件以外，若年輕記者處理較具爭議性、或涉及較多專業知識的報導時，汪文豪也會扮演編輯的角色，審核報導語句邏輯是否通順、所陳述的事實是否正確、是否需要補充其他受訪者或觀點：

如果是一些很專業的文章，就是文豪一定會看過，禽流感啊、一些公衛的議題，他一定會看過，然後比較爭議的文章他會看過，但是也沒有說每一篇，就是爭議性的文章會看，其他篇就不一定，就小非看。(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在上下游新聞，記者需對報導高度負責(黃文慧，2014)。馮小非 2012 年中剛接下編輯職務時，同時兼任產品部負責人，工作忙碌，未必有時間可以仔細檢視記者的稿件，只要內容順暢，她通常不會更動稿件內容：「就是她看得懂，看得順，就覺得 OK 了。(受訪者 D 訪談資料)」到了 2013 年末過後，上下游新聞成員變動屢屢，何欣潔、楊鎮宇、趙敏、潘子祁和郭琇真等年輕記者陸續進出上下游新聞，編輯馮小非以「指導者」的身分與年輕記者互動，頻繁地建議記者有關報導消息來源組成、切入角度或文章結構等新聞處理方式，她在守門程序中的主導性也越來越強。

然而，當記者對編輯馮小非給的意見有所疑慮時，雙方經常就此起衝突。年輕記者認為，馮小非給的意見有時過於主觀，未能跳脫既有認知、無法從記者、受訪者、專家學者等人的角度理解議題：「她當然也是會看說你寫的東西讓人看不看得懂，但是就是完全建立在她個人的認知上。(受訪者 D 訪談資料)」但從馮小非的立場來看，她在守門程序中給予記者的種種建議，無非是想讓資歷尚淺的記者擴及更多與報導相關的切入角度。換句話說，在此階段記者和編輯都覺得對方過於從自身既有的觀點處理新聞，在此前提下，雙方無法拋下成見與對方進行妥善的溝通，最後更導致年輕記者因有感於新聞產製受到箝制，進而離職。

另一方面，上下游新聞主編馮小非認為在新聞資訊量爆炸的時代，編輯的責任除了審核稿件之外，同時還兼具行銷新聞、提升新聞在社群曝光機會的責任。對此，上下游新聞曾於 2013 年聘請前《蘋果日報》副總編輯章倩萍擔任新聞部門的主編，負責稿件編輯與新聞行銷。當上下游新聞跨越既有疆域界線；聘請曾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主編，藉此與域外的工作方式(主流媒體的新聞行銷模式)相

遇時，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原有的工作模式。既有模式與域外模式的相遇，不斷改變上下游新聞對新聞產製的認知與實踐。儘管該主編只在上下游新聞待了短短三個月，但由其引入的新聞行銷模式確實為上下游新聞帶來數量可觀的社群粉絲：「那一個月當中那個成效是非常明顯的，粉絲從一萬多很快的增加到四萬多還五萬多，就很快的成長了。(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由章倩萍引進的新聞行銷模式對上下游新聞的標題及臉書貼文引言書寫方式影響甚大，像是在貼文引言凸顯報導中較具討論空間的面向：「那時候她（章倩萍）就覺得說，不要下（臉書）廣告，她要設法透過推文的力量例如說改變推文的方式、語氣啊等等，我覺得她帶領上下游最大的突破是這個。(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例如2013年10月06日上下游新聞發表一篇有關有機產品供應商里仁開始向有機產品生產者推薦原物料的報導（林慧貞，2013年10月06日），在該則報導中，記者呈現了里仁、支持和反對里仁作法的生產者，以及其他有機產品供應商的說法，主編章倩萍在臉書貼文引言中，選擇特別強調生產者對於里仁的質疑（如圖4-1-1所示）。

圖 4-1-3、上下游新聞臉書粉絲專頁新聞行銷案例



章倩萍離職後，馮小非延續她的做法並視情況加以修正，現今在下標與撰寫臉書貼文引言時，同樣會使用較具吸引力的文字、凸顯報導較具衝突或討論空間的面向，以此吸引讀者。其中，臉書貼文引言是當今新聞媒體在社群上重要的行銷手段，上下游新聞在引言的書寫上，通常會簡單呈現報導的主旨和重要議題，

幫助讀者迅速理解報導所要呈現的議題方向，並藉著在引言中凸顯具賣點的內容留住讀者：

我覺得在那之前（章倩萍進到上下游之前），我們的標題下法或引言的下法，都很像純淨新聞的下法，那的確很無聊……可是你最終就是要面臨，（報導）是很健康營養，但你兒子（讀者）就是不吃，那要怎麼辦？你是放他餓死嗎？還是你要改變你自己？稍微把它做美味一點、吸引他。

（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儘管在標題及推文「加料」能夠提升讀者點開新聞、將新聞「吃下去」的機會，但當今社群上的讀者未必會點入新聞連結閱讀報導全文，有時單看完標題與臉書貼文引言便決定他對議題事件的理解與立場。社群讀者的閱讀習慣，讓記者擔心主編所採用的下標與貼文引言撰寫方式，會使得讀者誤解報導原意：「其實大家有時候沒有去思考，就開始再轉再轉，然後就開始留言在罵，但是裡面內文其實並沒有這樣（讀者只看引文，沒看報導）」。（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例如，2016年05月13日記者林慧貞報導農委會新任副主委陳吉仲提及農委會即將試辦「所得直接給付措施」的新政策，希望將來能以稻農所得直接給付措施取代現有的保價收購措施，不過對於是否真的要取消保價收購、何時要取消等問題則仍在討論階段。

當時主編馮小非原先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重大變化！42年保價收購告終試辦直接給付〉，記者認為這個標題在語意上會讓讀者誤會保價收購政策即將走入歷史：「就是其實是還不確定的，但是她就是下標下的好像（已經）很確定的，我就覺得那個標題很不妥。」（林慧貞，2017年06月08日）報導發表當晚，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更直接在上下游新聞網頁留言說明農委會的立場，並請讀者詳細瞭解相關制度與政策（詳見圖4-1-4）。

圖 4-1-4、陳吉仲於〈重大變化！檢討 42 年保價收購 試辦直接給付〉報導留言

陳吉仲
2016 年 05 月 13 日 at 22:58:45 · Reply

謝謝上下游的專訪，針對許多關心此事朋友的疑問，吉仲在此再深入說明：

一、保價收購制度沒有要取消，是和對地的綠色環境給付措施雙軌並行，由稻農自行選擇。稻農可以選擇繳交公糧給政府，也可以選擇直給給付。因為保價收購制度和直接給付的雙軌制，會讓稻穀的產地價格仍在輔導收購價格的水準，亦即有價格的支撐作用，如每公斤有23元，因此種植水稻的農民收入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二、請大家將稻穀保價收購制度及休耕制度的政策做一完全瞭解，一邊要求農民種植水稻繳交保價公糧，目前每年支出約120億元，另一邊叫農民不要種水稻而休耕，每年要支出約70億元，如此政策的矛盾，反而讓農民無所適從。將近200億元有效率運用在保護農地及提高農民的收入，才會有所謂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政策形成。

三、此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措施不只符合國際規範，更重要的是突顯農地農用所產生的社會外部效益，故是補償而非補貼，請注意，補償是因為這些環境生態文化及糧食安全等功能之效益由社會大眾享有，故給農民是補償，這反而改變過去長年農業被定位為弱勢的補貼有所不同。更長遠的發展是農地農用就該有相關的補償措施。農地農用、農地保護住了，農業就可以永續經營。

自己父母親快八十歲了，他們每年還在種水稻，自己一直認為未來任何農業政策的改變，一定是會以農民的考量為優先，舉例而言，在2011年前的稻穀收購皆是乾穀，許多農民根本沒有烘乾設備，導致保價收購制度無法完全照顧到稻農，因此在2011年時建議農委會的稻穀收購改為溼穀，這個建議前我問了自己老爸和其他農民，也因為這個建議稻農每公頃收入增加至少萬元以上。自己農家出身，從小務農，520有機會進入農委會，是為農民爭取福利和權益的開始，自己之前在理念仍一樣堅持且更會具體落實，只能請大家再更具體瞭解上述的政策。謝謝。

陳吉仲

對此，馮小非回應，當初會使用「告終」二字是因為記者的報導用字讓她產生這種解讀方式（參見圖 4-1-5）：「慧貞打電話來的時候我也很明確跟他說，你文中寫的斬釘截鐵就是要取消，只是說是逐步，怎麼能夠怪我說我亂下標題？（馮小非，2017 年 08 月 09 日）」

圖 4-1-5、報導修改版本比較

「重大變化！檢討42年保價收購 試辦直接給付」的版本比較

← 返回編輯器 比較兩個文章版本

上一個 ▶ 下一個

文章版本來自 上下游記者林慧貞
1 年之前 (13 五月 @ 12:51) 回復此版本

標題

重大變化！42年保價收購告終 試辦直接給付 重大變化！42年保價收購告終 試辦直接給付

內容

為了因應自由貿易，實施了42年的保價收購制度將有大變革，準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接受上下游專訪時透露，今年將試辦「所得直接給付措施」，直接補償農民一定金額，而農民要想辦法自己賣米，不能再重複繳交公糧，初步採雙軌制，讓農民自由選擇，希望逐步替代保價收購，**不過**。

取消保價收購，改以直接給付農民價差的想法，早在2001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前就已有許多討論，而直接給付措施，更是歐美、日、韓等國，減緩自由貿易對農業衝擊的主要手段，到底什麼是直接給付措施？保價收購和自由貿易的關係為何？其他國家如何面對農產因貿易自由化產生的衝擊？上下游整理、訪問相關學者研究，釐清這個在國際上爭論已久的政策。

為了因應自由貿易，實施了42年的保價收購制度將有大變革，準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接受上下游專訪時透露，今年將試辦「所得直接給付措施」，直接補償農民一定金額，而農民要想辦法自己賣米，不能再重複繳交公糧，初步採雙軌制，讓農民自由選擇，希望逐步替代保價收購，**不過**是否要取消還沒有時間點。

取消保價收購，改以直接給付農民價差的想法，早在2001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前就已有許多討論，而直接給付措施，更是歐美、日、韓等國，減緩自由貿易對農業衝擊的主要手段，到底什麼是直接給付措施？保價收購和自由貿易的關係為何？其他國家如何面對農產因貿易自由化產生的衝擊？上下游整理、訪問相關學者研究，釐清這個在國際上爭論已久的政策。

記者經常就標題和臉書貼文引言內容與主編展開爭辯。記者認為儘管具衝突感的標題及貼文引言能夠有效吸引讀者，但上下游新聞所討論的議題經常涉及不同立場的專業知識、議題牽扯面向極為複雜，過於突顯議題的衝突性，將有可能挑起讀者社群的敏感神經、加劇不同立場支持者的對立：「所以她有時候推文其實是會去……有點是在挑大家的氛圍……就是你在貼文的時候故意去彰顯這些東西，去挑（社群氛圍）」。（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類似的事件則讓馮小非意識到，由於編輯不在報導現場、無法得知事件完整脈絡，有時可能會誤會記者的表意，而記者在撰寫報導時也有可能使用較為模糊的字詞、造成編輯的誤解。為了避免類似的狀況頻繁發生，她嘗試在上下游新聞推動記者與主編共同看標的新聞處理方式，減少雙方因表意解讀落差而產生衝突的機會：「因為類似事件，讓我後來覺得，如果是重要事件，都把標題再給大家看一下，也給記者有個修正的機會。」（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2016年中旬，上下游新聞組成全新的新聞工作團隊，除原有成員馮小非外，另聘蔡佳珊、孔德廉、賴郁薇等專任記者，該時上下游新聞團隊成員共有3名專任記者、3名兼任記者，加上主編馮小非。馮小非為了減少過去在守門程序遭遇的衝突，開始在內部推動共同審稿與下標的守門模式。雖說主要的守門者仍是主編，但共同審稿與下標作為另一種型態的守門模式，有助於降低主編在守門過程中的主導性，一方面促進主編與記者間的溝通、降低雙方因溝通不良或表意解讀落差而產生衝突的機會；一方面以群體力量制衡主編對於新聞產製的掌控。

由主編主導的守門程序是，記者將稿件內容、照片、建議的標題貼在臉書虛擬編輯台交由主編審閱，主編審稿的重點在於報導的觀點是否齊全、是否採訪到應該採訪的人、是否易於讀者閱讀、是否需要釐清或補充與報導主題相關的知識：「小非可能看大方向，她是看整個結構、觀點齊不齊全。」（受訪者B訪談資料）」至於主編如何考量觀點齊全，主要會從主編對議題的瞭解出發評估與議題有關的當事人有哪些、議題的爭議點為何，若主編對該議題的認識不夠，則會在虛擬編

輯台尋求上下游新聞其他成員的協助。

若主編覺得稿件有上述缺漏，會直接在稿件下方與記者對話。記者收到主編的修改建議後，若無意見則依照主編的建議新增或修正；若記者有異於主編的想法，則會和主編溝通、取得彼此都能認可的增修共識。

另一方面，共同審稿模式則是由成員相互審核報導用字、用詞錯誤、文章的方向、觀點，以及陳述有無需要修正或補充之處，成員也會提供與報導議題有關的專業知識或觀點給寫稿的記者。成員若對稿件有疑問或意見，會直接在稿件下方與寫稿的記者進行溝通。這種做法有助於寫稿記者看見報導的盲點，成員間的相互審查也可以幫助寫稿記者跳脫作者的視角，瞭解讀者對於報導的疑惑、或是報導有哪些地方陳述模糊或可能造成誤解，減少記者在報導刊出後單獨面對讀者審視的壓力：

我們彼此看稿比較常是丟出很多問題，我覺得大家在裡面討論其實是提出自己不瞭解或看不懂的地方……我會針對他們的提問想辦法把我的報導寫得更清楚。(受訪者 A 訪談資料)

目前上下游新聞同時採用兩種守門模式，若是一般性報導如政策宣示、人物及產地故事等，主要的守門人還是主編；若是處理仍在討論中的政策法規、或是涉及較多專業知識、觀點與立場紛亂的議題，則會啟動共同審稿守門模式。共同審稿守門模式可以算是另類／獨立媒體組織內部互動與決策民主化的具體實踐，以共同發表意見取代傳統主編獨大的守門方式，解決離職成員所提主編強勢主導議題觀點的問題，幫助上下游新聞以較多元的視角審核報導，也可以避免不在新聞現場的主編以錯誤的脈絡編輯報導：

做新聞不是要偏袒哪一個部份的觀點，那是不是多元呈現的部份可能在稿子上沒有辦法表達的時候，有人可以點出來，就是我有我的經驗，跟

其他同事的經驗，可能交疊起來會比較完整一點。(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上下游新聞的記者與主編在共同審稿過程中的討論，其實就是記者和主編進行協商的過程，試圖藉著公開的溝通，交織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新聞處理方式，兼顧記者根據現場採訪得到的資訊，以及主編在編輯角色上的判斷：

記者在現場有一個現場的判斷，因為他聽農民說或聽誰說，那編輯有她在編輯角色的觀點，小非她既是創辦人又是編輯，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照著她的觀點去做？我覺得做新聞的時候的確這個東西是一定要突破的，不是一定是被她牽著走。我覺得兩方是基於現實交雜出一個妥協的空間……所以這個溝通的過程我覺得滿重要的（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當被詢及現實中會如何和主編溝通時，受訪者 E 表示妥善表達自身想法、使對方理解自己的難處等溝通技巧，是和主編應對時記者應該具備的重要能力。受訪者 E 會直接在虛擬編輯台向主編說明標題可能衍生的問題、讀者會如何解讀、並提出修改意見，若在討論過程中發現自己和主編的看法落差很大時，受訪者 E 考慮到文字溝通有時會造成誤解，為了避免雙方歧異擴大，會直接撥電話向主編詳細解釋自己的看法。

從前段引述也可以發現，年資及位置差異有可能成為編輯和記者之間進行平等溝通的阻礙，由於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主編不僅代表著不同的組織分工位置，同時也存在著僱傭關係，加上主編在相關領域已耕耘多年，記者難免會因為位置及年資而思考是否應該順應主編的要求。另一方面，因專業知識、採訪經驗的差異，不同年資的記者在參與共同審稿時所握有的社會資本也會有落差：「也不是說經驗少就不好，可能多一點經驗在看稿的時候會更好。(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兩位現職的年輕記者都曾在受訪時表示，較為資深的記者蔡佳珊因長年經營農業路線，在看稿時較能依過往累積的經驗和知識檢視報導不足之處。但上述因

組織位置及資歷差異而促成的知識流動並不總是單方向流動，隨著記者跑線經歷及專業知識的累積，年輕記者也會反過來主導議題的新聞處理方向。

另一方面，在標題的處理上，上下游新聞記者在交稿時會附上自己建議的報導標題，主編針對某些報導會直接使用記者下的標題；某些報導則會由主編重新下標。主編在重新下標時，會視報導的議題性質徵詢記者意見，記者若覺得標題無法反映報導所欲呈現的討論脈絡、過於聳動、或有誤導讀者之虞，會直接反應、告訴主編，並修改主編下的標題。例如，記者蔡佳珊於 2017 年 05 月 15 日發表〈禁用巴拉刈爭議：農村自殺人力損失 vs 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孰輕孰重？〉報導，主編原先下的標題是「巴拉刈對人體毒性高 衝動飲一口吐掉仍會致命」，後因記者認為報導要呈現的是農民服用巴拉刈自殺所造成的農村人力損失，會大於禁用巴拉刈後而提高的生產成本，因而建議主編調整標題內容。

標題和引言無法完整呈現議題脈絡，但從讀者在網路上的留言可以發現，當今的讀者經常只看標題和引言便決定自己對於該議題的理解：「很多人只看標題或只看引言，然後他就已經覺得他看過了。（受訪者 B 訪談資料）」因此，記者仍然希望標題及引言內容能夠先呈現議題脈絡，再追求吸引讀者的效果。上下游新聞的共同下標模式，便是為了避免主編所下的標題和臉書貼文引言過於「刺激」以至於讓報導失焦，使讀者過於簡化事件的資訊、誤解議題脈絡，讓記者幫主編「踩煞車」。

當前上下游新聞主編馮小非針對某些爭議性或涉及較多專業知識的報導，在完成下標及臉書貼文引言的撰寫後，會詢問記者內容是否恰當，讓去過採訪現場、對議題有較深理解的記者，協助主編審核標題及推文的內容，以協作方式降低因過於強調衝突感致使讀者誤解的機會，盡可能地兼顧新聞行銷與新聞守門。可以說這種制度是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主編在各自的角色立場上，相互協商妥協的結果：「因為寫的人真的是最瞭解的人，所以小非會來問我們的意見，我覺得滿好的，因為小非自己也知道她下標有時候會比較辛辣一點。（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例如 2017 年 05 月，記者蔡佳珊發表〈台灣除草劑銷售量創歷史新高！年銷 26 億元，單位面積用量全球名列前茅〉系列專題，該專題討論台灣的除草劑使用現象，報導內含許多數據或科學知識，包括台灣除草劑使用量的統計資料、除草劑使用後的作用機制等。馮小非在發布報導與臉書貼文之前，便主動於上下游新聞虛擬編輯台詢問記者蔡佳珊與其他成員標題及貼文引言內容是否妥當，記者蔡佳珊跟馮小非說自己要再跟受訪者確認用「全球名列前茅」指涉台灣除草劑單位面積用量是否妥當，馮小非等到蔡佳珊取得受訪者回覆、確認數據無誤後才對外發布報導。

主編和記者因職位的不同，對於審稿、下標、寫貼文引言等新聞處理方式會有各自的見解，有時編輯的新聞處理方式甚至會與記者的想法有所抵觸，受訪者 E 就曾提到編輯和記者因職務不同：「本來就是存在一個……比較抵觸的位置」。從編輯的立場來看，在呈現事實之外，自己還得擔負藉由編輯內文、下標、撰寫臉書粉絲專頁貼文來吸引讀者的責任。主編將標題、貼文引言視為決定讀者是否會點開報導的關鍵，因此在撰寫標題與引言會格外注意文字內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對此記者表示可以理解編輯希望藉此吸引讀者的做法：「做新聞的一個考量是……你要讓更多人看到嘛。(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然而，記者更在意讀者能否藉由報導認識現實、接觸多方觀點，因此即便具衝突感的標題或引言內容可以提升點閱率，但因為考量到這麼做有可能誤導讀者，已離職的記者如郭琇真、林慧貞，仍不贊同編輯採用這種撰寫方式，編輯和記者因而經常就此產生衝突。這些衝突可以反映長久以來媒體在點閱率與專業自許之間的兩難，在專業的考量下，記者以是否能夠完整呈現議題脈絡與現實做為標準檢視標題和引言內容。然而在社群時代，中規中矩的標題未必能吸引讀者的目光，編輯在提升報導曝光度的考量下，會採用衝突性的文字或語句激發讀者對報導的好奇心、增加讀者點開報導閱讀的機會。雙方的出發點皆有其道理，但究竟該如何在點閱率與標題適當性之間取得平衡，是記者和編輯需共同面對的課題。上下

游新聞歷經多次內部衝突，逐漸發展出共同審稿與下標的新聞處理模式，此舉是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編輯嘗試利用組織規模小、溝通管道較主流商業媒體順暢的特質，藉由頻繁地溝通討論協商出兼顧點閱率與新聞專業考量的一種嘗試。

四、 守門：新聞蒐集

前一小節討論上下游新聞如何進行改稿、下標、撰寫臉書粉絲專頁貼文引言等新聞處理工作；本節則是要討論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編輯如何選擇報導題目、從何處獲取新聞線索、如何組織報導消息來源等新聞蒐集工作。

(一) 選題

上下游新聞的創立理念是希望藉由報導拉進農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因此，草創初期的報導多從農村在地觀點出發再現農業的勞動與現實，藉由報導為農民發聲、提升消費者對農業的認知。此時除了由上下游新聞主動發起〈麥仔伯站起來！苗栗稻農搞「麥台」〉、〈種芽菜，鄭涵睿的創業之路〉等深入發掘農民經驗、農業轉型或產地故事外，同時也開放農業相關領域的公民寫手至上下游新聞網站發表自己的農事經驗或故事，像是〈從農之路：我的尋根之旅〉、〈我心中的家鄉—農家二代的農事初體驗〉這類由農民自我陳述從農經過與體驗的公民報導。自製報導與外部稿件雙管齊下，藉由網路平台版面空間不受限制的特性，積極再現被主流媒體忽略、大眾陌生的農業與友善環境議題。

上下游新聞剛成立時的選題取向，深受共同創辦人就業以來接觸農村的經驗所影響。《上下游新聞市集》共同創辦人馮小非長年待在中部農村從事新聞工作，1999年921地震過後，馮小非創辦《中寮鄉親報》關注南投中寮的災後重建工作，並在中寮地區居民的協助下，於2001年成立龍眼林社區學園，嘗試透過與農民的合作，為中寮地區的產業發展開闢新路。儘管後來馮小非因和組織成員彼此對產業轉型有不同看法而離開，但馮小非在中寮的經驗仍開啟其往後深入發展友善農業的契機。馮小非在中寮遇見了農民廖學堂，兩人於2003年一同創立《溪

底遙農業學園》，以有機農法種植柳丁，自行開闢網路通路販售柳丁與相關農產品、開設部落格刊登柳丁生長紀錄、龍眼乾或柳丁醋等加工產品的製造過程，並透過部落格直接與消費者進行溝通、瞭解消費者的需求與想法、提供售後服務等（郭志榮、陳志昌，2006年12月04日）。成立溪底遙之初，馮小非同時主編由主婦聯盟合作社發行的會員刊物《綠主張》，2004年轉而承接新聞局專案主編《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記錄農漁村、原住民部落與偏遠鄉村的生活方式。

馮小非多年在農村的經驗，讓她意識到儘管農產品是大眾每天都會接觸到的食物，但因為較少接觸農業資訊，使得社會大眾對於農業相當陌生。對此，2011年馮小非與蔣慧仙、汪文豪、蕭名宏、莊慧宜、楊偉林共同創辦《上下游新聞市集》，期望透過報導提升社會大眾對於農民、農村以至於整個產業的理解，拉進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並提供小農販售農產品的網路通路，解決小農產品販售通路不足的問題：

我那些年一直待在農村，還有之前做媒體的經驗都讓我覺得說，農業這件事情明明就有那麼多不管是好玩的、公共的或什麼的，它明明就有那麼多東西，怎麼會大家沒有機會看到？我覺得我當初的出發點很單純就是這個，我總覺得你要先看到你才有機會去親近它，然後你才會知道說，其實你跟它之間是有很強的關連的。（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同時，在農村多年的田野經驗也讓馮小非發現，除了被社會大眾忽視外，農業也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與現象需要關注。在農民、農村外顯的面貌下，藏有許多結構性或體系上的問題需要被重視：

當你真的花這麼大的力氣在看農村的時候，你會發現說，它可能不是只有表面的現象要被大家知道，它恐怕有很多東西要挖，而當你真的挖下去的時候，你也會發現，你可能無法一直只說好的東西，你連不好的東

西都開始挖了。(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例如當上下游新聞以友善環境的觀點報導有機農作時，同時也會遭遇有機農作農藥殘留值可能超出標準的問題，在呈現有機農作的農民勞動及產地故事之外，上下游新聞更得處理有機農作的弊端與挑戰，像是產業長久以來的慣習或是法規政策的影響等等。因此，除了再現農村，以專業自許的上下游新聞在發揮媒體公共性的考量下，同時也積極發掘潛藏在現象下的產業問題與挑戰，希望藉此促成農業、食物與友善環境相關議題的討論：

我跑農業或食安的新聞這麼久，你會發現……很多東西（問題）都在重複循環，就是你跑久了也會覺得……不是說無力啦，會覺得說又這樣，那到底結構性的問題是甚麼？那我們（媒體）應該是想辦法把結構性的問題因素找出來。(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受到馮小非的影響，農業及友善環境議題是上下游新聞成立初期的報導重心。到了2012年中，成立一年的上下游新聞成員漸漸從報導經驗中意識到，除了處理農業端的報導，從農業到食物的過程同樣也有很多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需要被關注的議題。因此，上下游新聞開始擴充報導路線，從原有的農業路線向外擴充至食安路線與公衛路線，報導像是禽流感或化工添加物等議題。從「上游」出發，報導友善農法、農村故事、產業問題與趨勢、環境等農業議題，一路關注農產品如何到「下游」消費者的餐桌上：

我們剛開始是侷限在農業相關的議題，可是後來你會發現到一些事件，就是農業到食物那個範圍，其實你不可能只守在農業這邊，因為很多的農業跟食安的議題是有關的，那食安的議題其實是跟食藥署有關，那就是慢慢的往食物這一塊（發展）。(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在報導題材的選擇上，上下游新聞在評估一則新聞是否有報導價值時，主張不以商業利益做為評估新聞價值的考量，力求以議題和農民、消費者的相關程度做為衡量新聞價值的標準。上下游新聞現任記者蔡佳珊便提到，她在選擇專題題目時，主要考量題目能否反映農民在產地遭遇的現實情況，像是當季耕作困境、病蟲害等等：「比如說那個產業現在遇到了一個困難、或是今年可能某個作物甚麼甚麼蟲好嚴重然後那一區都完蛋，類似這樣子。」(蔡佳珊, 2017年05月07日) 馮小非也提到自己將題目是否能夠回應讀者日常生活所需視為重要的新聞價值考量：「其實大家不只想要知道出問題的事情，其實也很想要知道怎麼把事情做對、做好，而那個東西需要資訊。」(馮小非, 2017年05月07日) 透過報導協助讀者解決日常生活中種種疑惑，是馮小非設想媒體應該具備的基本功能，像是上下游新聞曾報導〈好吃白飯怎麼煮？專家教你六步驟〉，以專家的知識與經驗告訴平日有在下廚的讀者該如何煮出好吃的白飯。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其他媒體的記者會因為生命及從業經驗的不同，而建構出不同的新聞價值衡量標準，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同樣會因為資歷或生活經驗的差異，進而對同一個議題做出不同的新聞價值判斷。馮小非便提到，年輕記者由於日常生活中缺乏到市場購物的經驗，而使得他們無法感知從時令農產品產出量透露的新聞議題：

像今年明明蛤蚧就是一個大問題，蛤蚧就是今年量很少啊，可是我們記者因為沒有人上街去買菜，例如說像佳珊她會去買菜她就有感覺，但年輕記者沒有去買菜，所以他們在找題目的時候，就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馮小非, 2017年05月07日)

另一方面，不同職位的工作者對於選題時的新聞價值衡量也會有所差異。像是記者隨著採訪經驗累積以及對議題的理解越來越深，會開始反思上下游新聞做為一個專業的農業媒體，既有的路線是否真的可以回應農業、食物及友善環境的

所有面向。前任資深記者暨共同創辦人汪文豪便提到，隨著報導的累積，他發現農村議題除了產業層面的討論外，同時也涉及社福層面的問題，然而媒體鮮少關注這個層面：

因為我們上下游是一個農業媒體，我希望它的面向能再廣一點，比如說農村的、或是說社福議題、或老人長照，我覺得那個在農村其實遇到的議題更嚴重，我們是不是可以去經營這個路線？因為我覺得社福社工這個領域，其實很缺一個媒體去關注。（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對此，編輯馮小非則有不同的看法。馮小非從編輯立場出發來看，上下游新聞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離讀者越來越遠」，而不是路線面向不夠廣泛。2012年過後新闢的食安與公衛路線由於涉及較多專業知識，報導也會較艱澀難懂，儘管報導結構完整、論述邏輯清楚，但一般讀者仍難以親近：

記者可能就覺得說他想要越寫越深，可是當他越寫越深的時候，這個東西方向沒有處理好，你就會離讀者越來越遙遠……所謂專業媒體的那個形象，我覺得在奠定的過程當中，記者沒有真的能夠找到跟讀者的連結。（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從上下游新聞網站的報導統計數字也可以發現，需較多科學知識、統計數據解釋的專業議題與一般議題相比，在社群上的擴散程度較低。以前面提到的〈好吃白飯怎麼煮？專家教你六步驟〉為例，該則報導有4900餘次的分享數，延伸報導〈吃飯是一種專業 品飯員為台灣米把關〉也有2300餘次分享，而同時期有關禽流感議題的報導，單則分享數都不超過1000次。

對於路線與報導方式的見解差異，後來成為汪文豪、林慧貞、郭琇真離開上下游新聞的原因之一。從數據來看，涉及較多專業知識的報導確實較無法吸引讀者：「禽流感點閱率都很不高，然後又很細。（受訪者D訪談資料）」但記者認為

因為報導艱澀難懂就輕忽這些議題，未免因噎廢食，上下游新聞成立的動機便是為了關注這些主流媒體所忽視的議題，儘管會面臨報導牽涉太多專業知識、讀者看不懂的問題，但上下游新聞應該由記者和編輯一同努力，嘗試在可讀性與專業知識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揚棄這些議題：

當然如果寫得很不吸引人是我們的問題，但有些科學的東西的確就是很難吸引人，可是想辦法取得平衡，然後讓這些議題被關注，我覺得其實這是之所以需要上下游的原因，不然只要有主流媒體就夠了啊。(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揚棄經濟利益導向的新聞價值，改採公民觀點做為評斷新聞價值的準則 (Downing, 2001)。上下游新聞同樣不以報導是否為組織帶來經濟利益來衡量新聞價值，然而這不代表組織就可以完全不在乎報導點閱率，對於編輯而言，上下游新聞報導的點閱率代表著這個媒體能夠發揮多大的影響力。不同於主流媒體將點閱率連結到經濟利益，上下游新聞將點閱率視為評估組織社會影響力的標準，若題材過於艱澀難讀，會使得報導難以為讀者所用，組織的影響力也就會受到影響，主編馮小非因而希望上下游新聞能夠更常從讀者觀點出發找尋與讀者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議題與報導切度角度：「我不是覺得這個東西(難的議題)不重要，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很重要，但是因為是重要的東西你們(記者)越要寫到別人覺得重要，你不能夠用只有你聽得懂的說法來說。(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然而，從記者的立場出發來看，上下游新聞之所以成立是因為馮小非等共同創辦人意識到農業議題被主流媒體忽視，以至於一般社會大眾未能重視這個默默為人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產業，所以才希望藉由報導拉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已離職的記者林慧貞認為，瘦肉精等專業程度較高的議題，儘管比較小眾，但這些議題仍是農業不可忽視的面向，也因為這些議題很「硬」、主流媒體不願

意花時間經營，上下游新聞才需要承擔報導這些議題的責任，由編輯和記者一同努力試圖在「貼進讀者生活」與「議題專業知識」之間取得平衡。

（二） 蒐集新聞線索

上下游新聞的選題不脫農業、食物、公共衛生、食安等四個面向，題目線索的來源有臉書社群、政府部會、成員人脈、生活觀察等。上下游新聞是一個原生於社群時代的網路媒體，長久以來和農業社群的互動相當密切，除了記者在新聞現場的觀察與養線外，臉書社群上與農業相關的粉絲專頁、社團、農友個人動態時報同樣是重要的線索來源，社群的即時特性也能幫助記者隨時跟上時令作物的產銷現況。

再者，現今社會大眾慣於使用社群做為交換產業資訊的媒介，農業也不例外，經常可見農民藉著臉書串連有著相似耕作經驗的農友，交流各自的耕作經驗，農民也會藉著追蹤政府部會與各農業研究機構的粉絲專頁，獲取產業或技術的最新資訊。透過臉書社群上的追蹤觀察，上下游新聞可以廣泛地瞭解時下熱門的農業議題。另一方面，當人力不足以支持記者定點長期蹲點，臉書社群儼然成為上下游新聞與農民培養關係的橋樑

我們當然也都從很多農民的臉書在看他們最近在幹嘛、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比如說香蕉栽種聯盟我也去給它按讚，然後火龍果栽種聯盟也按讚，就是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栽種聯盟，有時候有幾個比較大宗的，反正就是盡量都去接觸。（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此外，現實世界的互動也提供許多新聞線索，一方面可能來自政府部會最新的政策與法規變化、官員言語中透露出的線索、或是時下重要的農業議題；一方面則來自記者在採訪經驗與日常生活中的觀察，記者可從在產地與農民的互動中得到新聞線索或議題討論的新面向，而記者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農產品與農友，

同樣也是上下游新聞重要的新聞線索來源：

(新聞線索來源)除了臉書還有其他，譬如書籍、雜誌、認識的農友……
其實只要一直維持眼觀四面的習慣，隨時看到什麼就會聯想到某個題目
可以做，譬如我平時會自己跟農友訂農產品，所以隨著季節會跟不同農
友保持聯繫，這也是一個消息來源。(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除了由記者主動從上列幾個線索來源發掘新聞議題外，主編與成員相互建議
同樣也是上下游新聞記者獲得新聞線索的途徑之一。上下游新聞的成員經常透過
臉書虛擬編輯台分享值得關注的資訊，若該訊息與特定議題有關，成員會使用
@tag 標註負責該路線或該議題的記者，記者可自行決定是否依循成員的建議繼
續追蹤。

以 2017 年 04 月到 07 月的實際觀察，在社團張貼資訊頻率最高的成員是主
編馮小非，這與馮小非對主編角色定位的理解有關。馮小非認為編輯是記者和讀
者、社群之間的橋樑，由於記者在平均每日八小時的工作時間內，難在採訪報
導工作之外挪出時間關注社群變化，因此編輯得擔負起長期觀察農業社群、熟知
讀者閱讀需求的責任，負責從社群大千世界中挑選出有報導價值的議題並主動發
起報導。經常可見馮小非在臉書虛擬編輯台分享農民或學者的臉書貼文、其他網
路平台的報導、活動資訊等，並以@tag 標註與該議題相關的記者，請記者閱讀
或與成員討論過後，評估該議題是否有發展成新聞的可能：

我會拋題目出去，然後我會解釋，因為有時候我拋題目出去的時候，記
者可能不是很理解為什麼要拋這個題目出來，那我會解釋說它有哪些重
要性、或是它可能有哪一些點值得報導。(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值得注意的是，主編馮小非將消息提供給記者後，記者並不一定要依循主編
給的消息完成報導，還是得等記者瞭解消息內容、評估報導可能性，並經由雙方

討論後，才能決定消息有沒有發展成報導的可能。主編交派記者題目的新聞工作方式常見於主流媒體，上下游新聞與主流媒體不同的地方在於，交派後，記者和主編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她指派的可能是一個線頭嘛，那你之後怎麼樣去挖去操作，那是你自己的事啊，我覺得她可以提出一些她覺得值得討論的東西，那我責任就是去查證到底值不值得討論……如果我問了之後其實沒有甚麼，我就會直接跟她講我覺得這個不需要寫。(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以每日即時新聞為例，不同於《蘋果日報》等主流媒體記者需於採訪結束時、甚至是採訪進行中立刻發稿，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大致以早上一則、下午一則的發稿頻率處理每日即時新聞，主要的新聞線索來自政府單位及 NGO 團體發佈的採訪通知，有時主編也會額外提供自己接收到的活動訊息。無論新聞線索來源為何，記者在處理該則報導前都會先確認該則報導是否有延伸的可能：「哪個議題比較重要、有再發展下去的討論空間，我才會去做。(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另一方面，現職與已離職的年輕記者們皆不約而同提到，記者與主編協商交派議題的能力會隨著經驗的累積而有所改變。對於剛接觸農業議題的記者而言，搜尋報導線索帶給他們很大的壓力，記者因為經驗與專業知識的不足而依賴主編及資深記者提供題目：「就我們在沒有那麼多農業的相關知識或是人脈的建立下，其實我們要去找去挖掘議題然後寫出來，不是參加記者會，是我自己找議題寫出來，其實是很困難的。(受訪者 C 訪談資料)」隨著人脈與經驗累積，年輕記者漸漸培養出自己的線索網絡，在評估主編所給的訊息是否值得繼續追下去時，較能跳脫主編的觀點從各種不同面向評估。受訪者 E 便提到記者有責任從不同觀點評估報導價值：「除了她自己的角度之外，我覺得我們(記者)的責任是你要找更多另外的角度來檢視同一個議題。(受訪者 E 訪談資料)」

另一方面，上下游新聞的報導經常從友善環境的角度出發檢視農業與食物，

當年輕記者對農業路線的經營越來越上手時，也會開始跳脫既有的視角，擴充原有的路線與線索來源：

一開始在上下游甚麼都不懂，所以都會從友善有機的農業方向下去寫，然後也是用小非以前的那種觀念、那種線，就是線索其實會很侷限，到後來越看越多之後，我就會越想要去瞭解就是那 99% 的慣行農業在幹嘛，因為我覺得這才是農業的真實狀況。(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三) 消息來源組成

具有基進性的另類／獨立媒體經常站在一個利於觀察且隨時可以對社會變遷採取行動的位置，直接再現批判方的觀點 (Downing, 2001)。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學主張新聞報導不可能不受個人或組織價值觀影響，因此新聞報導所呈現的「事實」只是記者從特定視角出發觀看到的局部事實，並不可能反映真實世界的全貌，而另類／獨立媒體的重要性，便是藉著盡可能呈現「事實」的多元面貌，突破主流媒體對於事實再現的壟斷 (Atton, C. & Hamilton, J.F., 2008)。

上下游新聞在有關抗爭或爭議性議題的報導中，抗爭者或批判方等消息來源占有的版面比例確實較報導同一則新聞的主流媒體高。上下游新聞對於公民團體、農民的側重，可以反映上下游新聞以再現農業或農村為目標的初衷，讓農民或相關公民團體現身於上下游新聞的報導，直接陳述自己的立場與心聲、或是以自身經驗說明政策及農業技術在實作場域的運用，藉此幫助他們實踐自身的傳播權力，使農民與公民團體有機會參與大規模公共政策討論與自我再現 (Bailey, O.G., Cammaert, B. & Carpentier, 2008)。

此外，主流商業媒體偏向使用政府官員、企業家、學者等菁英 (elite) 做為報導主要消息來源，另類／獨立媒體為了對抗這種具有階級意涵的工作慣習，會藉著在報導中大量使用庶民、運動者做為主要消息來源，讓他們直接在報導中現身、並減少菁英消息來源出線的機會 (Atton, C. & Wickenden, E., 2005 ; Downing,

2001)。然而，並非所有的另類／獨立媒體都會按照這種操作邏輯選取消息來源，另類／獨立媒體會受到組織運營累積而成的常規、日常實踐所影響，因而改變自身運用消息來源的方式。

上下游新聞剛成立時的報導多從農村在地觀點出發，再現農業的勞動與現實，無論是記者採訪或公民自己投稿，都是希望農民或公民團體有機會直接陳述自己的立場與心聲。但隨著上下游新聞開始意識到農村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與現象，加上報導擴充食物、食安、公共衛生等路線，上下游新聞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漸漸從一個再現產業現況與生產者心聲的媒體，轉變成發掘、關注、討論政策議題的媒體，如此角色定位的轉變，影響著上下游新聞對消息來源的運用。

上下游新聞所報導的議題多與產業政策、藥物與蟲害機制、技術改良等較為專業的知識有關，在報導中除了呈現農民的說法之外，也經常採用專家學者做為主要消息來源。儘管在另類媒體新聞學中，專家、研究人員被視為社會菁英(elite)、具有階級意涵(Atton & Wickenden, 2006)，但由於議題的特殊性，上下游新聞經常得依賴專家學者從自身的專業出發，解釋、說明報導提及的專業知識或政策：

農業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學門，結合了人文跟自然，所以比如說今天有一個蟲肆虐好了，我們必須要去問清楚這蟲到底是怎麼個危害法，然後有甚麼防治的方法等等的，這個我們都不可能憑空知道，一定要去問相關的研究人員。(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農業報導經常涉及不同立場的科學判斷，例如基改作物對於人類與環境的影響等。儘管面對與友善環境相關議題時，上下游新聞的報導消息來源組成隱約會受到組織既有的立場影響，但面對報導議題的爭議，上下游新聞的做法還是會盡可能讓持不同意見的各方學者都能夠有表達自身見解的空間：

盡量把兩方意見都呈現出來啊，譬如說我們訪問(研究烏魚養殖運用雌

激素的)學者，譬如說張清風他現在就反對使用，可是當初跟他一起做研究的孫寶年，她還是支持使用的。所以我們就把孫寶年也是獨立一篇，張清風也獨立一篇這樣子，就是兩個不同的意見(各一篇)。(蔡佳珊，2017年05月07日)

另一方面，對上下游新聞而言，政府官員暨是受監督的對象，也是報導常用的消息來源：「我們一方面監督他們，某一方面我們還是要依賴他們給消息嘛，一天到晚都要打電話煩他們。(受訪者B訪談資料)」除了接收政府部會的採訪通知外，記者經常需要官員針對政策法規修訂、產地困境等問題提出官方回應或說明未來規劃。記者也提到，輪到自己主跑每日即時新聞時，政府部會的官員會是日常最常互動的消息來源：「他們應該是我互動最多最密集的一群人。(受訪者A訪談資料)」在另類媒體新聞學中，政府官員同樣被歸類為具階級意涵的菁英消息來源，主流媒體經常採用他們的說法來界定議題、忽略草根消息來源，使得既有社會規範得以再製。另類媒體新聞學因而主張報導應納入草根聲音，藉此平衡主流媒體慣於菁英消息來源的傾向、批判政府缺失(Atton & Wickenden, 2006)。上下游新聞同樣會藉由報導批判政府的缺失，然而對上下游新聞而言，監督政府是媒體應有的功能，不會因為媒體的主流或獨立之分而有所改變。

儘管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有助於上下游新聞解釋報導所提及的專業知識，但他們的身影並不會出現在所有的報導，上下游運用消息來源的方式會因為議題特質而有所不同。對於不具爭議性的報導，如小農故事、地方生態與營造等，報導多只呈現報導對象的聲音；在報導公民團體發起的抗爭活動時，則是同時採用正反並陳的方式，但若無法即時找到被抗爭對象的回應，有時也會單單呈現公民團體的說法；針對某些涉及較多專業知識的爭議性議題，上下游新聞則是會盡可能呈現各方說法。但這種作法並不是過往新聞專業規範所強調的平衡報導，所以不會刻意追求讓正反雙方都有一樣的陳述比

例，而是依循議題本身脈絡，讓多元觀點能夠同時出現在報導：「不見得是新聞平衡，而是說，現在這個網域裡面，其實我們應該是盡可能去 touch 到一些相關人的說法。(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

像是 2017 年 05 月發表的除草劑系列專題中，記者蔡佳珊使用的消息來源便包括負責管理農業的農委會防檢局、農藥進口與銷售端、農藥防治官員、農民、專家學者、公民團體等多方說法。前任資深記者汪文豪也以〈米粉/米穀粉真相調查〉系列專題為例說明上下游新聞在運用消息來源並不會刻意批判特定一方，該系列專題除了訪問對此議題持批判立場的消基會外，也呈現了米粉生產者如龍口食品等如何回應外界批評。儘管這個專題是要批判米粉產業隱瞞原料的陋習，但在報導時除了呈現批判方的見解外，上下游新聞同樣也會給予被批判方表明意見與想法的空間：「學法律會知道被告的訴訟保障權，雖然大家覺得他怎樣，可是他還是要有說話的機會。(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

在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上，受訪者們皆提及儘管上下游新聞是一個重視農民及弱勢聲音的另類／獨立媒體，平常和 NGO 團體或農民的關係密切，但上下游新聞做為一個以專業自許的媒體，報導時仍必須和受訪者保持一定的距離：「你說獨立媒體跟 (NGO) 互動的比較密切，我覺得很無可厚非，但是今天就在新聞的處理上，我覺得還是該有一些分寸。(汪文豪，2017 年 05 月 12 日)」汪文豪提及的分寸，指的是記者應盡可能地避免因為個人或組織與受訪者的交情，而影響報導內容。

另一方面，上下游新聞 2011 年成立之際，像上下游新聞這類新創小型網路媒體在台灣媒體圈實屬少數，上下游新聞的記者訪談時可能會因為媒體認知度不高而遭受訪者拒絕。對此，資深記者汪文豪提到上下游新聞提升認知度的方式是藉著深度的分析性報導凸顯自己和主流媒體的不同，讓上下游新聞的報導從主流媒體輕薄短小的報導取向中脫穎而出、吸引大眾目光，藉

此換取上下游新聞與消息來源互動的籌碼。無論是現職記者或是已離職的記者皆提到，上下游新聞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報導取向，除了可以幫助上下游取得讀者的信任外，農業、食品產業相關人士也會因上下游新聞在議題處理上的專業能力，而願意和記者建立關係、記者也比較能夠訪談到一些不常受訪的專家學者：「很多受訪者都說你們怎麼那麼認真、你們怎麼把這個東西講得那麼清楚……就是他感覺上你認真，他也跟你一樣認真啊！（受訪者 B 訪談資料）」若記者做足準備、盡可能地瞭解議題脈絡與知識，受訪者會感受到記者的報導誠意，在回應記者時也會認真以對；對於知名度不如主流媒體的上下游新聞而言，經時間累積的專業口碑是幫助自己和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的方式。

第二節、在疆域內外遊走：上下游新聞與外部力量的相遇

一、與讀者的互動

Micheal Albert (1997) 提到，另類媒體的新聞實踐特別重視媒體和閱聽眾的關係；胡泳 (2009) 也認為嘗試降低讀者的媒體近用門檻，是獨立／另類媒體的重要特質。這裡說的「近用」指的是讀者不再只是單向接收來自媒體的資訊；在接收新聞的同時，讀者也會將自身的觀點傳遞給媒體，甚至從讀者變訊息產製者，參與或影響新聞產製。那麼究竟上下游新聞是如何看自己和讀者的關係？又是如何與之互動？我們可以從上下游新聞於發佈的徵人啟事看出一些端倪(詳見圖 4-2-1)。

上下游新聞的徵人啟事中除了提到希望記者能夠具備好奇心、發問能力、累積專業等特質以外，特別提到有別於以單向傳播看待媒體和閱聽人的關係，上下游新聞強調新聞產製應該是「多端點的互動」，因此期待有意加入上下游新聞的記者能夠重視讀者的閱讀感受：「你現在說的這個故事跟讀者的關聯是什麼？為

什麼他一定要讀啊？難道現在還是在一個記者說什麼，讀者就要買單的年代嗎？（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也就是說，在產製過程中，讀者不再只是被動接受媒體餵養報導，讀者的體驗也會反過來影響媒體的新聞產製。影響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由上下游新聞內部自行感知到讀者的閱讀趨勢，進而改變原有的產製模式，如前述，主編馮小非有感於讀者需要立即知道食安事件的最新消息，因而將即時新聞納入上下游處理的新聞類型；另一種則是讀者透過留言或電子郵件直接將自己對報導的想法與見解傳遞給上下游新聞，讀者的反應有時會驅使上下游調整原有的新聞產製方式。

圖 4-2-1、上下游新聞徵人啟事



《上下游新聞》徵求一名專職新聞記者！

大家好，上下游是一個關注友善土地的農業、食物、環境的社會企業，我們有兩個獨立運作的部門，一個是新聞部門，透過每日即時與深入報導，挖掘農食界重要新聞議題。

另一為「市集」部門，這是銷售友善農產的電商平台，除了以行動具體支持友善環境的小農產與加工之外，市集銷售所得，用來支持獨立運作的新聞部門，透過商業運作，讓非營利的獨立新聞有穩定基礎。市集、新聞兩部門獨立互不干預。

除了電商收入外，上下游新聞也有部分收入來自外部支持，包含建築環境教育基金會及其他小額購買「共同辦報人」的支持方案。

上下游新聞部門雖然編制不大，但我們建立了一組小而美的專業分工，目前有一名總編輯、國內專職記者三名、南部特約記者一名；國外有一名駐日記者、一名駐義大利特約記者，掌握國外動態，與台灣經驗對照。另有數名特約作者提供外部稿件。新聞平台同時也接受社會各界在此書寫發表。

現在，上下游要再徵求一名新聞記者，我們對於新聞記者的期待是：

- (1) 充滿發問的好奇心
- (2) 為了累積發問的基礎，願意不斷的求知，掌握問題脈絡
- (3) 求證的路途沒有盡頭，在累積記者的專業同時，隨時以未知的新鮮眼睛，探索廣闊的世界。
- (4) 看重讀者的感受，讓新聞從寫作到閱讀，是多端點的互動，而不是單向的放送。

歡迎對農業食物的議題有興趣的記者，能將履歷、作品與對於新聞的想法寫下來，寄到上下游新聞。我們的休假等制度比照國家規定，薪水面議，您也可以將希望的待遇直接寫在信件中，有興趣的朋友，請在5月20日之前寄信給我們。

上下游新聞部 email：editor@newsmarket.com.tw

研究者觀察發現，上下游新聞極為重視讀者對報導的看法與意見，像是將自己視為連結讀者與記者橋樑的主編馮小非，便經常藉著讀者在上下游新聞網站或臉書粉絲專頁的留言瞭解讀者對報導的反應。這些反應包括內容上的批評與疑問、議題層面的知識分享與討論、單純的情緒抒發等。除了上下游新聞自己對於媒體和讀者關係的界定外，上下游新聞做為一個網路媒體的媒介特性同樣影響上下游新聞如何和讀者互動。相較於紙本媒體缺乏讓記者和閱聽眾交流意見的空間，網路媒體的閱聽眾較容易將自己對報導的意見反應給記者，讀者可以直接在新聞下方留言、或直接在社群上聯絡記者：

（即時知道讀者反應）好像是很正常的事，尤其你們這個世代，可是對我們來說，我過去一直都在紙本的媒體工作，所以我們其實很少看到一些即時的回應，也不會有甚麼讀者寫讀者來函來給你，很少，所以以前常常報導出來會有一種石沉大海的感覺，就是你不曉得誰在看，你也不知道人家看了以後有甚麼感覺。（蔡佳珊，2017年05月07日）

曾在《遠見雜誌》及《經典雜誌》任職的記者蔡佳珊，便以自己的經驗說明讀者在網路上即時的回饋如何影響記者。紙本媒體出刊後，記者無法立即得知讀者的反應，通常得經由事後不定期的意見調查才有辦法得知讀者對報導的看法，而網路的即時性質，讓讀者可以在閱讀完報導後，立即在網路空間書寫個人意見或分享資訊，記者也能在第一時間閱讀讀者欲傳達的意見內容。這種即時的回饋，讓記者可以確實感知到閱聽眾的存在，讀者的回饋也能幫助記者改善往後的新聞處理方式：

我覺得那個即時看到讀者的反應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心中預想的讀者，跟真實讀者的想法，是可能會有一些落差的，因為我們長期在做這個領域的時候，做久了你對很多事情會見怪不怪，或者是你會覺得：「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你會忘記了那個最原始的、你還甚麼都不懂的那個時候的樣子，所以讀者隨時的回應都是在提醒你說：「一般人是怎麼看待這些事情的」，那這就有助於我們去修正我們的報導的方式。(蔡佳珊，2017年05月07日)

上下游新聞在徵人啟事中提到的「多端點互動」，具體實踐方式便是透過留言回饋得知記者和讀者在想法上的落差，並藉由修正報導方式與方向減緩這些落差。馮小非在訪談中提到，上下游新聞的讀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食農產品的消費者、另一類則是農產或食品相關從業人員。由於記者可能會因經驗及知識的累積，而無法從讀者的視角檢視報導，以至於報導產出無法回應讀者的資訊需求，消費者即時的反應便可以提醒記者「一般人」對農業議題的認知。記者蔡佳珊以報導〈實測基改玉米發芽成長 本土飼料玉米驗出基改成分〉為案例說明讀者的回饋如何幫助記者看到讀者如何解讀報導。在該則報導中，蔡佳珊藉由實際種植路邊撿回的基改玉米種子，檢視坊間對於基改種子不會發芽的謠傳是否為真，由於過往對於基改作物的瞭解，蔡佳珊在結果出來之前便知道基改種子會發芽，因此在撰寫報導時，她並不覺得這個報導面向有任何特別之處，直到報導出來後，蔡佳珊才從讀者在報導的留言中發現，原來讀者對於基改玉米種子會發芽感到相當訝異。讀者的訝異促使蔡佳珊意識到，記者的先備知識與經驗會使得記者將某些讓讀者有「恍然大悟」之感的資訊視為「理所當然」。

另一方面，農產及食品從業人員的回饋，則可以幫助上下游新聞的記者進入從業人員的工作場域、擴充自己的專業知識，以及更加貼近農民及產地的生活樣貌。例如2017年01月04日，一篇標題為〈業界公開秘密 雌激素養烏魚 漁業署無視違法食安風險〉的報導引發讀者的熱烈討論，討論內容以漁產研究人員及烏魚養殖漁民對該則報導的批評居多。儘管報導的原意是希望檢討台灣漁業法規有關雌激素使用的漏洞，但由於標題直接連結雌激素與食安風險，因而被外界批評該則報導是在打擊漁民生計。

記者蔡佳珊瀏覽完讀者批評的原因後，回過頭檢視報導內容是否真如批評所說的錯誤百出。蔡佳珊多次檢視報導內容，確認報導所言皆有憑有據，對於該則報導為何引起如此大的風波，蔡佳珊認為報導的書寫方式不夠細膩或許是可能的原因：「總之我自己看我的內容，我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也許我們的問題是在於講的不夠詳細、或者是說溝通的方法不夠細膩。」（蔡佳珊，2017年05月07日）」像是該則報導在處理不同立場受訪者的比例、標題的書寫方式、魚產養殖研究人員說法等內容時，仍可有更為細膩的處理方式。面對接踵而來的批評，上下游新聞除了發表聲明（詳見表 4-2-1）說明產製該則報導的過程、回應外界認為該則報導是在打擊漁民生計的批評外，更正視上下游新聞在處理該則新聞時仍有未盡之處，後續直接以「烏魚關鍵時刻來臨！你希望台灣如何養烏魚？」系列專題，詳細處理與烏魚養殖投放雌激素議題有關的各種說法，呈現生產者、公部門、學者、研究單位以及公民團體等不同立場的相關人士對於該議題的看法。

在決定後續專題報導要如何安排受訪者時，除了記者對於該議題的理解有所影響外，讀者對於第一篇報導的批評與建議，也影響著上下游新聞決定要訪問哪些人。例如，多則留言提到台灣研究雌激素用於烏魚養殖的研究先驅是海洋大學現職校長張清風，記者便將張清風視為第二波報導的重要消息來源。另一方面，第一則報導也被批評忽視生產者的心聲，因此在處理系列專題裡的生產者消息來源比例時，記者格外小心：

我們第一次報導的時候只有訪問兩個漁民，所以第二次的時候，我們就想說那就再多問一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家都那麼需要這個東西？而且這些人我不是隨便找，而是在北中南各自找出有代表性的養殖業者，譬如北部某個產銷班的班長，他們當初曾經參與過海大的老師所做的雌激素試驗，有一些合作，我覺得他們已經算是有代表性了。（蔡佳珊，2017年05月07日）

表 4-2-1、〈初心不變《上下游》對烏魚報導的說明〉²

這週《上下游》刊登雌激素養烏魚的兩則新聞，引發各界討論，有評論認為，上下游是農業媒體為什麼扯農民的後腿？我們是不是變了？雌激素就算是違法，用在魚體也會代謝，為何造成恐慌？另外，為何選在烏魚子熱銷的季節刊登新聞？是否惡意打擊烏魚產業？另外，也有評論者提出，有廠商提出檢驗報告，並無人工雌激素殘留，《上下游》的報導是否失據？

上下游成立至今一直努力的事情，是讓友善環境的農漁業更加發達，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相瞭解，農民過得更好，消費者更安心，環境能夠永續，這是我們創辦的初心，至今沒有改變。以下是我們的說明，敬請各界參考。

(1) 我們是如何進行調查？

今年我們發現，以「加入雌激素的變性飼料」養殖烏魚，是業界無人不知的秘密，但是，法規卻明確規範不得使用雌激素，不但讓漁民長期陷於違法處境，對消費者也沒有保障。

我們先與防檢局官員、藥物毒物試驗所專家確認，雌激素添加在飼料當中確實不合法。也到烏魚養殖產地拜訪漁民，確認漁民在生長關鍵期會投餵變性飼料，並且也都知道這非法律允許，但因已是業界普遍技術，所訪漁民並無隱瞞。即使農委會官網上的「烏魚館」也直接載明，烏魚養殖投以六個月的雌激素飼料，讓烏魚 95% 成為雌魚。

繼而我們遍訪海洋大學、水產試驗所、嘉義大學、台大漁科所等學者專家，包括曾參與技術研發的沈老師，專家們也都明確表示，雌激素不得用於飼料，學界正嘗試研發更好的技術，也建議應更仔細去監測雌激素在魚體內代謝的情形，或許可以建立一個安全評估模式，讓民眾無需再有疑慮。

同時專家們也表示，目前變性飼料的配方究竟為何，由於飼料廠不曾公開成分，屬業者機密，難以得知，建議政府應該要加強源頭管理。這些未知，就是風險所在。

(2) 烏魚體內是否殘留人為添加的雌激素？

我們在兩篇報導都清楚引用了專家說法：變性飼料如果只是烏魚生長關鍵期施用幾個月，使用後一到兩年才採收，成熟時應該已經代謝完畢，殘留的可能性不高，民眾無需恐慌。文中並無任何指稱烏魚殘留過量雌激素，試圖造謠或中傷產業之字句。

但藥物使用無論在人體或動物，都應遵守嚴謹的規範，包括施用過程和後續監測，雌激素自不例外。藥能治病，也能致病，雌激素對人體健康的利與弊，在醫學上充滿爭議。雌激素會經由排放水進而影響自然生態，更是重大的環境議題。

² 〈初心不變《上下游》對烏魚報導的說明〉刊登時間為 2017 年 01 月 07 日，分享數達 2100 餘次，臉書粉絲專頁按讚數為 520 餘次。該則聲明發布後，仍有讀者留言批評上下游新聞處理不當，但也有讀者留言鼓勵上下游新聞、或給予報導修改建議。

(3) 我們的報導強調的重點始終在於陳述事實：

飼料使用雌激素目前不合法規，飼料成分不透明，必須加強源頭管理。我們也曾詢問漁業署：是否可能建立一套嚴謹的管理辦法和評估標準，讓雌激素在飼料使用上合法化？得到的答案是：既然民眾有疑慮，目前並不考慮。漁業署的說法從一開始的模糊到明確表態，也都呈現在兩篇報導中。

(4) 我們背後有任何利益團體，唆使中傷烏魚產業嗎？

上下游所做的一切，只希望讓台灣的農漁產業更好，上下游對天明誓，絕對不會為了任何私心私利扭曲報導，但是我們理解，這波報導對烏魚產業造成暫時的衝擊，但是若繼續漠視問題，產業將持續卡在這裡無法前進，因此我們選擇做出報導，也接受一切的批評與憤怒指責，希望這次風暴能引發的是更多正面的討論，迎向的是更好的烏魚產業。

上下游初心不變，時間會證明一切。

主編馮小非也提到，做為編輯，她很看重讀者的評論或意見，即便這些批評有時只是情緒性的謾罵，但上下游新聞做為一個以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橋樑自許的媒體，如果真要實踐連結兩端的承諾，還是得看重讀者對上下游新聞的各種看法，才能確保在橋樑上流通的資訊能夠被兩端的人接受：

你都不管他們的同時可能就意味著你就一直是用很傲慢的方式對待採訪、用很傲慢的方式來選題、用很傲慢的方式來說：「我才是專業的人，你們都不是」，他（讀者）可能沒那麼專業沒有錯，但他跟我們都一樣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他可能就是真真實實在那裏種田或者是買東西的人，他的確就是你的讀者，你真的覺得可以這麼傲慢嗎？不行耶。（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上下游新聞將上述理念具體落實在日常對待讀者留言的方式，上下游新聞收到讀者的回饋後，會主動回覆讀者，但並非每一則都會回覆，上下游新聞選擇不處理單純的情緒性發言，只回應那些提供意見或資訊分享的留言（如圖 4-2-2 所示）。回應的方式包括提供證據證明報導的正確性、回答讀者的疑惑、或直接與

讀者針對議題進行討論等。

圖 4-2-2、上下游新聞與讀者的互動案例



圖 4-2-2 的互動案例，是上下游新聞編輯與讀者在〈文蛤危機！氣候異常 底土污染，雲林文蛤死亡率四成 台南也成災〉該則新聞臉書貼文下方的討論。該則貼文於 2017 年 06 月 16 日發布，共有 630 餘人按讚、125 次分享。此次的討論由讀者的提問起頭、上下游新聞編輯接續回答，討論的最後是讀者提供自己所知資訊，建議往後可能的報導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針對報導的批評之外，某些時候讀者也會質疑《上下游新聞市集》的經營模式是否會動搖上下游新聞一直以來宣稱的新聞獨立自主。《上下游新聞市集》共有產品與新聞兩個部門，產品部門開發有善農業相關產品、提供小農販售產品的通路，以消費支持小農產品與加工，並將營利所得投入新聞部門；新聞部門則是主張以財源獨立的經營模式追求新聞自主與報導專業，財源大抵來自共同創辦人出資、產品部販售收入、外部非營利團體贊助、募資平台、共同創辦人每月定期捐款等管道（黃文慧，2014），其中產品部販售收入為最大宗。

《上下游新聞市集》的經營模式開台灣媒體的先河，首次有媒體在新聞獨立前提下，以販售產品的方式取得報導產製所需成本。

然而，黃文慧（2014）提到當媒體經營者以創新方式為新聞組織的財務問題取得解決之道時，同時也會將矛盾帶入組織。從上下游新聞的經驗來看，儘管《上下游新聞市集》不斷強調新聞與產品兩個部門各自獨立運作，新聞產製決不會受產品部門的營利考量所影響，仍不免引起外界質疑上下游是否會藉著新聞幫助產品部門的銷售。

例如 2015 年 08 月，《康健雜誌》報導指出被視為養生好糖的黑糖經抽驗均被驗出致癌物質丙烯醯胺超標（康健雜誌，2015 年 08 月 28 日）。上下游新聞於隔日發表〈幫助認識丙烯醯胺？還是製造對黑糖恐慌？《康健》報導見樹不見林〉長篇報導（郭琇真，2015 年 08 月 29 日），直指《康健雜誌》的報導有失偏頗，忽視國人因飲食習慣所以黑糖攝取量有限。該則報導一刊出，便引發部分讀者與學者質疑《上下游新聞市集》是否因為產品部門有銷售黑糖，所以才會發佈這則報導為黑糖平反：

黑糖事件的時候，記者回來反應，有學者就直接問記者說：「你們是因為自己已有在賣黑糖，所以才會對黑糖新聞這樣反應嗎？」（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康健雜誌》發表報導當日，上下游產品部門便在收到數名消費者來信要求退掉在《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購買的黑糖，產品部成員也主動討論應對報導指控的處理方式。當日馮小非以產品部主管身分在上下游產品部門與產品生產者、消費者互動的臉書社團「上下游基地」上發表自己如何看待《康健雜誌》對黑糖有致癌之虞的指控。

黑糖事件發生的時候，是我把整個編輯職位都交給文豪的時候，然後我以為我不是新聞部的人……我在那裡（上下游基地臉書社團）是以產品部的身分去跟大家講說上下游做為農民的支持團體，我們產品部沒有辦

法置身事外，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一定要站出來表態。(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當時新聞部門由時任主編汪文豪全權處理，馮小非完全退出新聞部門的新聞產製，僅負責產品部門。儘管馮小非認為自己是以產品部主管的角色發表意見，並直接表明在產品部門臉書社團發文內容僅呈現上下游產品部門的想法，不代表上下游新聞部門對於該事件的見解，馮小非也確實未介入〈幫助認識丙烯醯胺？還是製造對黑糖恐慌？《康健》報導見樹不見林〉這則報導的採寫工作，報導從擬定題目、安排文章結構與受訪者、到報導書寫，都由當時的新聞部主管汪文豪及記者郭琇真主導，但外界還是將馮小非的公開發文視為上下游新聞部門的立場。馮小非做為《上下游新聞市集》的共同創辦人，過去也曾以編輯身份參與新聞部門運作，不斷變動的個人角色定位，使得外界直接將馮小非與上下游新聞劃上等號：

新聞部會希望說報導可以呈現一些不同的說法觀點，然後再來推，可是因為小非已經先在臉書寫了她的意見，某種程度大家不會去區分那個上下游新聞還是上下游產品，所以她的東西就已經在開始在轉，大家說那就是上下游的報導，那陸陸續續就是這一圈的人在質疑說，那上下游牽涉到市集新聞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要有所區別？(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角色的模糊使得外界將馮小非以產品部主管身分在產品部門臉書社團的發言，視為上下游新聞部門對於黑糖事件的回應報導，引來外界質疑《上下游新聞市集》企圖透過「報導」為產品部門銷售的黑糖平反：

那個事情讓我意識到說，今天雖然我覺得我已經去了產品部，可是外界也許會覺得我是創辦人，所以在那之後我就沒有在基地那個群組去發言，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這樣做，會讓他們（外界）混淆的話，我就不適合在基地群組發言了……黑糖那個事情我當時敢那樣做（在群組發言）的原因，是因為我真的覺得我不再是新聞群組的人。（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上下游新聞如何處理讀者對於新聞獨立性的質疑，其實反映著組織主事者如何看待自身不斷宣稱的新聞獨立性，尤其上下游新聞的讀者，如產業生產者或專家學者等，經常是報導重要的消息來源，若未能妥善處理讀者的質疑將有可能影響到上下游新聞長久累積的媒體公信力，使讀者對上下游新聞改觀。

儘管馮小非認為兩個部門各自獨立運作便是實踐新聞獨立的方式，但同一個品牌下的兩個部門儘管互不干涉，仍會互相牽引，像是外界會將對新聞的看法延伸到產品部門，當新聞質量取得讀者的信任時，也會提升產品銷售成果。汪文豪提到自己可以理解馮小非做為產品部門主管必定會承受營運壓力，但在黑糖事件中外界對於《上下游新聞市集》處理方式的反應，卻彰顯了產品與新聞部門共存的經營方式對於新聞獨立性的影響：「站在小非的立場，因為營業有她的壓力在啦，我們也不會要去苛責她說怎樣怎樣，只是說最基本的那條線還是要守住啦。（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黑糖風波促使兩個部門的主事者汪文豪與馮小非開始反思該如何調整上下游的經營模式以維護上下游新聞的獨立運作、減少外界對於產品與新聞不分的質疑。對時任新聞部主管的汪文豪來說，新聞獨立最基本的防線便是新聞部門的產製絕不能受產品銷售影響，這條防線也是上下游所有成員的共識。然而，以社會企業形式結合產品與新聞部門的經營方式，是否真能維護新聞獨立性，外界仍持保留態度。馮小非當時認為，要徹底解決外界對於上下游游走於灰色地帶的質疑，最好的方式便是兩個部門徹底地在結構上獨立：

黑糖那個事件的時候，如果有基金會的形式拆開來，可能會讓記者出去

做新聞的時候，比較不會覺得有被質疑或甚麼的，所以那時候比較積極的在做這件事情，就是我跟惠宜說，那我們可能要去找錢，然後讓文豪來掌這個基金會，以基金會的方式把新聞跟市集這樣拆開。(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當時，馮小非認為可以徹底分開《上下游新聞市集》的兩個部門，讓新聞部門獨立成立一個基金會、交由汪文豪職掌，自己則是固守產品部門，繼續經營小農產品的電商通路，營利所得則以捐款的方式投入新聞產製。以基金會模式經營媒體，一方面可以使兩個部門名符其實地各自獨立，一方面也可以擴充新聞部門的資金來源，並交由董事會監督新聞部門的運作，藉此減少外界對於上下游新聞獨立性的質疑。儘管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後來隨著組織人事流動而擱置，但成立基金會的想法仍可以做為上下游新聞極為在乎讀者看法的實例，這種在乎會促使上下游新聞不斷回過頭檢視自身經營方式。

二、 雙面刃：臉書社群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Twitter、臉書等社群平台所具備的互動性、高度參與性，改變了內容市場的產製與流通方式，在社群上每個人都可以是內容生產者，使用者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都有可能藉由複雜交織的社交網絡傳遞給他人。羅世宏(2014)提到社群平台不僅挑戰傳統媒體壟斷內容市場的權威、更改變了新聞流通、產製與消費方式。

對於社群時代如何影響傳統媒體，林照真(2014)從聚合觀點檢視《紐約時報》、《衛報》、CNN、BBC與半島電視台的社群使用現象，發現這些媒體除了運用社群將讀者導入媒體原有網站、藉由議題設定促成社群上多元觀點的討論外，同時也藉由各種查證機制的協助，善用社群使用者提供的消息或資訊，填補記者所遺漏的社會面向，並提升社群民眾參與新聞產製的機會，也就是說，社群的出現與普及改變了傳統媒體的新聞產製方式。羅世宏(2014:174)以BBC的新聞

查證中心為例說明新聞媒體如查證社群提供的消息，BBC 新聞查證中心聘用 20 名專任人員負責查證湧入 BBC 的社群消息、設法從中篩選值得報導的新聞素材或線索、利用社群接觸可靠消息來源，以及觀測社群輿情討論。

在主流媒體之外的另類／獨立媒體同樣會因社群興起而調整原有的新聞實踐方式。葉蔭聰（2014）便提到，臉書的普及改變了《香港獨立媒體》的媒體角色定位，原先《香港獨立媒體》將自己定位為「社會行動者媒體」，積極扮演動員社會行動的角色。但隨著行動者可以自行運用社群的即時性與強大的人際網絡進行動員，使得《香港獨立媒體》在社會行動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迫使《香港獨立媒體》調整自己的角色定位與新聞產製方式。考慮到過往另類／獨立媒體扮演的動員角色漸由社群取代，《香港獨立媒體》轉而強化媒體報導公共議題的功能，從社會行動者媒體轉向「新聞媒體」，並採用似於一般媒體的組織結構、內容產製方式，像是組織穩定的記者團隊、設立稿件編輯審核流程等。

在台灣，絕大部份另類／獨立媒體皆運用臉書社群露出報導、將使用者導入媒體網站，以上下游新聞網站為例，目前（2017 年）約有 61% 的流量來自臉書平台。另一方面，如同主流媒體經常使用社群使用者提供的線索，臉書同樣成為另類／獨立媒體極為重要的資訊與消息來源，但另類／獨立媒體的社群線索使用方式，會因為報導路線類型的差異而展現有別於主流媒體的使用樣態。陳順孝（2014：230）提到，主流媒體議題取向宛如大拼盤，在固定版面同時報導結合政治、經濟、體育和社會等路線；另類／獨立媒體則是專注在特定路線、報導特定領域的議題，例如《四方報》以移工為中心，關注各地移工在台生活與權益。在社群的使用上，另類／獨立媒體會聚焦於與媒體路線相關的社群使用者，關注路線相關領域內的民眾、學者、團體、機構。

本研究關注的上下游新聞同樣體現上述媒體與社群的密切關係，其新聞產製深受臉書影響。首先，上下游新聞經常從臉書挖掘新聞線索，記者與主編皆大量追蹤食農領域相關的個人帳號、社團或粉絲專頁，從中發掘有新聞價值的素材或

線索。社群與時俱進的特質，也有助於上下游新聞擺脫時空的限制，即時知曉農民在產地面臨的困境，以及時下重要或熱門的農業和食物議題：

就是所有跟食物農業相關的社團啊粉絲頁啊，這些東西，通常甚麼季節到了，可能甚麼東西就出來了，出來的時候有沒有伴隨發生了甚麼事件，這些都是要隨時關注。(受訪者 B 訪談資料)

再者，社群也是上下游新聞貼近讀者的渠道，讀者可以藉著上下游新聞臉書粉絲專頁參與農業及食物議題的討論，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編輯也可以透過讀者在粉絲專頁的留言或討論，得到與議題相關的其他資訊，並從中觀測民眾對議題的反應或疑惑，以觀察結果為參考依據調整報導方向及方式。臉書的普及減少讀者和記者的溝通阻礙，提高雙方在社群上互動的機會，儘管過去讀者也可以透過網站將意見反應給讀者，但在社群時代讀者帶給記者的回饋更為直接且全面。藉由社群網絡的擴散，記者也可以即時知道特定社群對議題的反應，而社群力量的集結更擴大讀者的聲量，使得讀者對報導的影響更為深遠。例如曾在紙媒工作的記者蔡佳珊便提到，社群集結不同領域的讀者，這使得報導將被更為仔細地檢視，因此記者在處理新聞時需更加謹慎小心：

以前在雜誌好了，雜誌的文章可能就是把一個議題講出來有這麼一回事就好，可是現在的話你要像偵探一樣去窮究很多的細節……其實我覺得是好的啦，讓我們更戰戰兢兢，我覺得是好的。(蔡佳珊，2017年05月07日)

然而，社群一方面提供記者豐富的線索與資訊、幫助記者與消息來源及讀者互動，另一方面卻有可能因社群的「同溫層」效應，而限縮報導的觀點與取徑。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如《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苦勞網》，主要的功能都是提供弱勢或志同道合的團體一個發聲、進行意見交

流的管道，企圖透過公共且開放的媒體實踐促進社會變革（管中祥，2015）。上下游新聞的成立便是因為意識到農業及食物生產者發聲不易，以及社會缺乏流通與討論相關資訊的平台，因而決定創辦以友善環境農業、食物為核心關懷的《上下游新聞市集》。想當然爾，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主編在社群上頻繁互動的對象，也會是身處農業、食物社群網絡裡的相關人士，網絡內的互動可以幫助上下游新聞取得來自圈內人的觀點或線索，卻也會使上下游新聞受到「同溫層效應」的影響，使報導僅能反映同溫層內的立場及觀點。

同溫層的出現與臉書的演算法（algorithm）息息相關，演算法會根據使用者的按讚、分享、留言與搜尋紀錄，決定哪些貼文可以出現在使用者動態時報，並據此篩選掉使用者可能不感興趣或不認同的貼文。換句話說，演算法決定了每個社群使用者在社群上看到的世界長甚麼樣，在演算法作用的過程中，會過濾掉一些與使用者喜好或立場相違背的內容、減少使用者接觸非同溫層聲音的機會，使得使用者在社群上只能看到和自己立場、觀點、價值觀相近的內容（端傳媒社媒組，2016年03月26日）。

訪談時，上下游新聞的記者和主編都曾提到同溫層效應對新聞產製的影響。如前所述，上下游記者和主編在社群上的互動對象以農業、食物議題相關人士為主，受到演算法影響，這些互動對象極有可能漸漸限縮為立場、觀點與新聞工作者一致的相關人士，在網絡內流通的資訊或意見也會趨於相似、符合所在社群的立場或觀點。舉例來說，有的同溫層可能都以友善環境做為理解食農議題的視野；有的同溫層則會受到記者本身報導風格影響，多從專業知識出發檢視食農議題。

主編馮小非便提到，隨著採訪、報導經驗的累積，記者和食農領域專家互動的機會越來越多、報導也會越寫越深入，儘管記者會因此提升報導專業性，但一不小心便會忽視報導可讀性，使得報導即便在記者或專家的社群網絡內叫好，卻因為社群外的讀者難以閱讀，而失去在社群外發揮影響力的機會：

每一個記者都以他身邊的朋友做為判斷對象，這件事情是讓我覺得在社

群化的過程當中，很糟的負面效應，記者都用自己的同溫層去判斷這則新聞的價值。(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馮小非認為，即便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不受商業壓力壓迫、享有較多新聞自主空間，照理來講選題應該比較自由，但受到社群同溫層的影響，記者經常以同溫層內的想法做為判斷新聞好壞的標準、忽視同溫層外讀者的感受。若工作者無法跨出同溫層親近不同樣貌的讀者，將會逐漸自我框限報導選題與呈現方式，使得報導未能如實反應讀者生活所需。

另一方面，已離職的記者則認為主編馮小非在選題時太常採用周邊社群的觀點，儘管其採用的觀點多可反映上下游關注友善環境食農產業的創辦理念，但在議題的溝通討論上若僅強調特定觀點，會使得各種不同觀點陷入各說各話的溝通窘境，未能促成不同觀點的相互理解，更無法化解彼此的歧異：

小非覺得編輯是讀者跟記者間的橋樑，我覺得某種程度他會把讀者當成消費者，那個讀者有時候不見得是大眾，而是純粹他／她覺得這個角度很重要的那一群讀者，然後小非覺得要滿足那一群讀者的欲望的話，會需要我們採這樣的角度去寫……我覺得就是他的同溫層圈耶，他的同溫層圈認為的事情，所謂農業會分兩派，農企跟小農，他就會比較站在小農的角度。(受訪者C訪談資料)

對記者來說，主編受到的侷限是報導的視野與觀點過於單一；對主編來說，記者受到的侷限則是無法與社群外的讀者取得連結。兩者所提的侷限都可以彰顯社群網絡看似開放，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反而會變得比以前更加「封閉」。新聞媒體若無法正視同溫層的影響，任由網絡的立場觀點左右報導，將無助於媒體擴大影響力、藉由報導促成溝通、凝聚共識。上下游新聞不分記者和編輯都意識到了同溫層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無論是主編認為記者受同溫層影響而採用無法接近

讀者的報導方式、或是記者提到主編採用符合自身立場的報導觀點無助於溝通，其實都凸顯了社群同溫層效應如何侷限媒體的新聞產製方式。當同溫層效應遇上專注在特定路線領域的另類／獨立媒體，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或許會比主流媒體大，這也是另類／獨立媒體在運用社群取得圈內人觀點、再現圈內人故事時，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第三節、異質與非一：上下游新聞的分裂與再生

一、獨於何者？上下游新聞的媒體定位

「名詞為何而生？如何使用？」與歷史背景及社會條件息息相關，名詞不會憑空而生，在名詞被創造的過程中，勢必涉及各種社會力量的複雜交織（張讚國，2013：xvii）。本研究關注的「另類媒體」或「獨立媒體」都是用來指涉那些在主流媒體集中化、菁英化、階級化、與政經力量牽扯不清、忽視弱勢聲音的情境下，以另類樣貌從事新聞實踐的媒體（Atton, 2002；Downing, 2001）。在台灣，情形類似，解嚴以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媒體工作者有感於弱勢、次文化議題缺乏發聲管道，因而在主流媒體外創辦另類／獨立媒體，像是擔任《台灣立報社》發行人的成露茜，便分別於 1995 年及 2006 年創辦以青年藝術、音樂、電影、地下社會運動發展等次文化為核心關懷的《破報》，以及為外籍移工提供資訊與發聲管道的《四方報》（成露茜，2009）；另一方面，關注勞工議題的《苦勞網》也於 2007 年創辦。爾後隨著主流媒體商業化程度提升，置入性行銷等商業邏輯凌駕新聞專業邏輯的現象日趨嚴重，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新聞工作者企圖以另類／獨立的新聞實踐模式擺脫商業力量的箝制，找尋實踐新聞專業的他途。

這些生於台灣情境的媒體，會特別在媒體前面加上「另類」或「獨立」二詞，有著刻意藉此凸顯自身新聞實踐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意味。「另類」彰顯的是相對於主流媒體的自我定位；「獨立」則是凸顯這些媒體獨立於政商力量之外的結構

特質。無論是獨立的媒體、或是另類的媒體，在抽象名詞的背後都指涉一套具體的行動，而這個行動便是另類／獨立媒體實際的新聞實踐樣貌。

本研究關注的上下游新聞在成立之初便強調自己是一個「獨立的新聞媒體」，不收廣告、不做業配新聞、不接政府專案，以此避免新聞自主受到政商力量的影響。在財源獨立的前提下，試圖以獨立客觀的報導達到「瞭解食物的真相，監督政府制訂好的政策」的目標：

我們期待，上下游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新聞媒體，為大家提供各種農業與食物的訊息。在新聞部份，我們的資深記者汪文豪，將進行獨立的報導與深度調查。（上下游編輯部，2011年09月04日）

上下游新聞成立之初的自我命名，是在主流媒體與政經力量牽扯不清、忽視或遺漏農業議題的媒體環境下所產生的，藉由「獨立」二字說明新創的上下游新聞如何定位自己、如何有別於其他媒體，而在這個名詞背後的行動，高舉媒體獨立自主的旗幟、報導未能在主流媒體現身的食農議題、實踐未能在主流媒體內體現的新聞自主：

當初會去上下游是因為，我在主流媒體覺得有一些工作的倦怠，就覺得主流媒體限制很多啦，自己想做甚麼主題（不太能做）……因為我跑農業新聞那時候大概跑了十年左右，那我覺得農業很重要，但是在一般的主流媒體裡面，他一直是被邊緣化或者是說刻板化。（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無論是哪種媒體的記者，在產製報導的過程中都會預設報導可能發揮的功用與影響力，例如通訊社記者對報導功能的預設可能是將事件基本資訊傳達給讀者。上下游新聞剛成立時，期待報導能發揮的功能是讓食農報導能夠不受版面、選題等新聞常規的限制，直接呈現給讀者，藉此促成社會大眾對食農議題的理解與認

知，其背後所欲挑戰的是主流媒體在產製食農報導時，邊緣化且刻板化的處理方式。同時，上下游新聞也一再強調自己發揮上述功能的方式是藉由不同於主流商業媒體的新聞實踐模式，像是本章第一節提到的尊重記者選題自主等。

然而，隨著食安事件一樁接著一樁發生、民眾對於這類報導的關注增加，主流媒體開始投入較多資源報導食農議題，這個原本屬於小眾、非主流的領域逐漸從邊緣往中心邁進。另一方面，社群也讓缺乏發聲及討論管道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夠取得直接的發聲管道，無需經由媒體便可直接對外再現自己。外在媒體情境的轉變，使得上下游新聞的報導不再「邊緣」，而隨著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夠自行藉由社群再現自己，上下游新聞將自己定位為庶民發聲管道的說法也開始受到挑戰。這不禁讓上下游新聞的工作者們開始思考，上下游的新聞實踐是否真的需要使用「獨立」做為形容詞。

此外，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新創媒體被稱為另類／獨立媒體，不同媒體的新聞實踐方式皆有差異，各媒體實踐模式的巨大落差，讓起先以獨立媒體工作者自居的上下游新聞記者與編輯對於「究竟什麼才叫「另類」？什麼才叫「獨立」？自己算是另類或獨立的媒體？」這些問題感到疑惑：

過了這幾年就發現說，挖，獨立這個字真的好難定義喔，非常難定義，尤其是現在越來越多媒體，然後我就常跟朋友在討論，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是獨立媒體，然後我就想說獨立是什麼意思？（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隨著越來越多新創網路媒體進入媒體市場，另類／獨立媒體實踐面貌日趨複雜。有的媒體宣稱自己財源獨立、有的則是表明自己關注小眾議題，但獨立財源有可能來自政府單位計劃、小眾議題也有可能受到政治意識形態控制。各新創媒體實踐面貌的差異，開始挑戰媒體工作者原先對「另類／獨立」的認知：「你是一個小眾媒體、你就叫獨立媒體？或是你的資金是單一來源，就是獨立媒體？」（受

訪者 D 訪談資料)」

當「另類／獨立」的意涵隨著外在媒體環境的轉變而有所變動時，上下游新聞勢必得重新思考究竟自己的媒體定位是否需要調整？稱自己為獨立媒體是否真能反映實際的新聞工作樣貌以及上下游新聞對於自身媒體角色的期待？對此，兩位共同創辦人馮小非和汪文豪都提到，上下游新聞剛成立時對自己的角色期許是透過專業的報導讓大眾看見以往被主流媒體忽視或邊緣化的食農議題，上下游新聞成立前兩年也靠著多篇討論政府政策或法規缺失的報導像是〈米粉/米穀粉真相調查〉、〈洗衣精濫用殺蟲劑調查系列〉，建立品牌專業形象，以獨立的姿態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

另一方面，在剛創辦、剛加入上下游新聞的時候，工作者即意識到上下游的新聞實踐模式與一般主流媒體不同，藉著財源獨立、內部新聞自主，報導被主流媒體忽視或遺漏的食農議題，但對於這個不同該如何命名？成員們皆有不同的看法。最早的幾位成員馮小非、汪文豪以及林慧貞之所以將上下游新聞稱為獨立媒體，理由是上下游新聞成立的前兩年，台灣獨立媒體圈相對單純，不同獨立媒體的實踐方式也大抵具有幾個共通特質，像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著重非主流議題等：

那時候會覺得比較像是……獨立媒體應該就是像這種，記者可以自己跑去跑、然後比較不會受到組織的安排，就是科層制度會比較沒有那麼明顯，你不需要主管派給你什麼題目你就得去寫，就比較自由，然後比較關注社會議題，那個時候其實就只是這樣覺得，也沒有想到太多。(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受訪者 C 在找尋工作時特別鎖定獨立運作的媒體，期望在這類媒體報導環境方面的非主流議題，因而加入當時被受訪者 C 認定符合獨立／另類媒體特質的上下游新聞：

我覺得當時就獨立媒體圈來說，上下游已經很有名氣了，甚至主流媒體他會開始去引述上下游的文章，而且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累積了一定的厚度、以獨立媒體的運作方式、還有在農業方面的專題報導，對我來說應該會收穫很大，所以我就進來……我覺得所謂獨立媒體相較之下，因為我們比較不受商業邏輯的考量，所以在報題上、或是我們在寫的角度上面，就比較不用去考慮到（商業）面向，我們是有一個空間可以好好去討論的，不論是報題，或是不論是取材上面、切的角度。（受訪者 C 訪談資料）

兩位受訪者的回答都展示了當時他們判斷何謂「獨立／另類媒體」的標準，是記者是否能在該媒體享有較大的新聞自主空間，包括不受科層壓迫、自由選題，以及記者可以掌握報導切入角度等。對此共同創辦人馮小非也表明，成立之初上下游新聞鑒於主流媒體對於記者新聞自主的壓迫，在進行新聞產製時會強調記者在這過程中的獨立自主，對她而言，這是上下游新聞當時以「獨立媒體」為自己命名的重要原因：

我們剛開始做上下游的時候，我不知道是社會的氣氛還是媒體界的氣氛，反正基本上你會覺得說，記者在選題也好、或者是處理（新聞）的過程當中，沒有受到一般的媒體或報社的尊重，所以你看我們那時候在談的時候，也都會談所謂的獨立記者，都是鎖在記者單一的角色跟職位上。

（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但隨著內外情境的變動，上述四位成員都開始質疑將上下游新聞命名為獨立媒體的作法。當時的外部情境是有越來越多被稱為或自稱為獨立媒體的新創媒體進入媒體市場，媒體間實踐型態的差異，使得「另類／獨立」原先所定義的媒體特質開始受到挑戰。另一方面，內部新聞實踐生成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衝突，也

開始讓成員反思將自己稱為另類／獨立媒體是否恰當、是否有其必要。像是受訪者 C 便提到，上下游新聞內部仍存在上對下的管理關係，新聞產製的決策權多由主編掌控，對比過去在其他另類媒體的經驗，她不覺得上下游新聞有做到另類媒體新聞實踐強調的內部關係水平化：「我覺得新聞自主空間是被壓縮的。(受訪者 C 訪談資料)」

受訪者 D 則從外部情境的變化中體會到，另類或獨立都是相對的概念，會因為不同的比較對象而產生不同的指涉，像是報紙對於主要收看電視的閱聽人來說可能是另類的；上下游新聞隨著媒體影響力擴大，對食農領域的生產者來說反倒成了主流的資訊來源。因此，有鑒於另類／獨立會隨著討論情境的轉變產生流動，受訪者 D 最終選擇放棄將上下游新聞稱為獨立媒體，改以媒體發布管道的載具類別來為上下游新聞命名：

我後來都直接就是以載具來分耶，因為這樣比較中性一點，載具就比較沒有爭議……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很難去定義另類，因為那變得很浮動，就是另類就是相對於主流，但是現在的主流，報紙算主流嗎？什麼是主流？主流的發行量也一直在下降。那電視台還是很多人會收看，可是它的資訊來源算是主流的吗？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用比較的方式去稱媒體，後來就是直接用載具。(受訪者 D 訪談資料)

此外，共同創辦人兼資深記者汪文豪則是隨著自己對媒體的期待有所變動，因而改變稱呼上下游新聞的方式。汪文豪提到，起先強調「獨立」是為了凸顯上下游新聞在財源上的獨立能夠幫助記者不受商業影響地做新聞，但就如同汪文豪在訪談過程中不斷強調上下游新聞必須藉由有別於於其他媒體的報導方式建立品牌形象，對他而言，上下游新聞之所以特別，在於這個媒體在食農領域發揮的新聞專業。因此，與其被稱為獨立媒體，汪文豪更希望讀者能夠認定上下游新聞是一個專業的媒體：

我後來其實不太想講我們是獨立媒體，因為我會希望上下游在這個食農領域是一個專業性的媒體，就是說我們可以做很多其實是一般看不到的、或者是說大家不會去關注，但我知道他明明是很重要的（議題），因為上下游沒有像一般商業媒體因為點閱率的壓力才去做（新聞），就是他不用太 care 商業市場邏輯這種東西。然後我們又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就是說現在的新聞都非常片段，我覺得我們可以有足夠時間去把剛剛講的，那個結構性的問題因素是甚麼？或者是說，其實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觀點面向，他們不是對立的，每個人都有背後的困境或什麼？我們去把這些突顯出來。（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在媒體前面加上「獨立」或「另類」的目的在於彰顯這些媒體不同於主流媒體的財源、組織結構、報導取向等新聞實踐方式，藉由特殊的命名幫助這類媒體取得媒體利基。然而，如同本小節開頭所提，指涉一個概念或現象的特殊名詞，必定會與具體的行動產生連結，當人們使用「獨立」或「另類」稱呼一個媒體時，背後便已預設這類媒體必定有些可稱得上獨立或另類的新聞產製行動。但隨著媒體因應內外情境變動而改變新聞實踐方式，「獨立」或「另類」的指涉一不小心便會成為外界刻板化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的框架。一如研究者在問題意識所提，新聞工作者根本不在乎外界如何為自己命名，主張唯有在每日實踐中才能真正體現自己是誰，汪文豪同樣認為不需要特別以獨立媒體稱呼上下游新聞，上下游新聞的特別在於每日實踐中體現的食農專業，而非有別於主流媒體的命名。

除了重新省思何謂獨立、何謂另類、上下游新聞是否需要自稱獨立／另類之外，社群的興起也促使上下游新聞回過頭反思自己的媒體角色定位。近幾年隨著社群的普及，食農領域裡流通的資訊量越來越多、內容也越來越多元。除了主流媒體關注外，政府部門、農業研究單位、農民等相關人士，也都自行在社群上建立傳播管道分享生產技術或從業心得，食農領域已不再「邊緣」。此時，兩位共同創辦人對於上下游新聞做為一個以專業自許的新聞媒體，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的

想法也產生了轉變：

剛開始我們是覺得在主流媒體裡面，我知道這條線很重要但是不被重視的時候，那我們自己去突破。後來到社群整個起來，現在都百家爭鳴，那我們反而要去思考、去想說怎麼促進對話。就是說後來跑一些新聞會發現，那個立場不是零和的、不是零跟一的選擇，一個政策丟下去，可能會牽涉到很多不同的相關當事人，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有讓他們在瞭解（彼此想法）的狀況下去對話，我覺得這個是滿重要的……就是說這個東西（對媒體的角色定位）我覺得一直是在隨著外在環境、新聞環境的變化去做轉變。（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我們做一個媒體，不管我們今天是不是獨立媒體、是不是商業媒體，我覺得都不再是重要的分界，重要的分界在於你有沒有辦法產生真的對你的讀者來說有用的、有意義的訊息，如果這個連結感（報導—讀者）是沒有的話，你有沒有存在有甚麼關係……（在社群時代裡）新聞的意義就是要在眾多事情當中，指出真正重要而有品味的事情，然後把那個東西講清楚，在講清楚的過程中，不斷引發大家去討論跟思考，而這些討論跟思考是對事情有正向幫助的。（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從上述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在社群興起、人人可以是傳播者的情境下，汪文豪和馮小非對於專業新聞媒體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的看法其實很類似，兩人都覺得媒體應該要在百家爭鳴的資訊中，藉由報導整合與現象相關的資訊、幫助讀者取得討論與思考現象需要的資訊。但同樣的理念最後卻發展出不同的實踐路數，汪文豪認為理想的做法是從專業知識出發，盡可能呈現與現象相關的所有關係人，將潛藏在現象之下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呈現給讀者；馮小非則是更加強調媒體應該從讀者觀點思考哪些資訊對讀者來說是重要的、哪些議題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

兩種實踐方式所欲達成的目的不同，已離開上下游新聞的汪文豪表示，自己之所以強調報導應呈現多元觀點，是有感於網路時代輕薄短小的新聞處理方式無法深入剖析各種力量交織形塑而成的結構，而這個結構正是造成產業困境的根本性因素，媒體應該要試圖藉由梳理複雜的結構網絡，促成各方對於彼此的理解、幫助產業進行溝通甚至解決困境。汪文豪提到，即便自己目前身處官辦財團法人，他仍認為媒體應該盡可能呈現多元觀點，而非將特定理念、做法定於一尊；馮小非重視讀者體驗的做法，則是有感於在各種力量以專業之名爭奪發言空間的過程中，生產者或消費者等庶民的聲音會被淹沒，所以期待媒體能夠從庶民的立場出發，找到對庶民來說重要且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然後為庶民對於議題的意見或需求增加聲量：

在網路你是有很多的空間，那其實記者更有空間跟時間去做一些（各方觀點的討論），我們最後是希望說促進公共政策的對話跟討論，我覺得這是我做媒體的初衷，不管你今天是在做獨媒、或者是一般媒體、或是人家說我現在是官媒，（我都懷抱這種初衷）。（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我會覺得是上下游如果還要繼續存在的話，它應該在這種各式各樣的大千世界裡面仔細的去聆聽（讀者在乎的事），然後聆聽之後我們應該要去做一個初步的查證，查證之後去判斷這些東西裡哪些東西具有公共性、或哪些東西具有再被擴散的效應，然後我們再把它拿出來（做成報導），我覺得上下游應該要扮演的是這個角色。（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這裡可以發現，社群的衝擊突顯了上下游新聞成員對媒體角色的認知差異。在上下游新聞遭遇社群的撞擊點上，上下游新聞對媒體角色的定位分裂成兩派不同的認知，依附角色定位而存的新聞實踐模式也有所不同。即便雙方同樣覺得媒

體應該扮演橋樑的角色，但對橋樑應該連結哪些聲音卻有著不同的見解。馮小非認為，隨著社群資訊量越來越繁雜，媒體應該憑藉過往和讀者互動的經驗，從資訊大海中挑選出對讀者生活影響重大的議題，成為連結農地與讀者的橋樑，像是以讀者日常生活經常食用的作物做為切口，觸發讀者對生產者和產地產生好奇心，接著進一步將生產者遭遇的現實呈現給讀者；已離職的汪文豪、林慧貞、郭琇真則認為，媒體應該在百家爭鳴的社群時代連結不同的觀點、呈現食農產業複雜的結構面向，藉此促成溝通及社會變革：

如果沒有這些人（農民）的身體的磨損的話，我覺得世界上很多東西就不存在了，那一般的人到底可不可以去珍惜這個磨損？首先他要有機會看見，他如果沒有看見，他連珍惜的機會都沒有。（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有時候的對立不是那麼的對立，他（農民）可能只是做事方法不一樣，所以導致他這樣做，那如果可以挖到那樣的角度，某種程度這樣的報導出來他會比較可以促進社會溝通，就是讀者看到了，不管他背後的立場是農民還是誰，他就比較理解官方的思維，然後官方也可以知道農民的看法。（受訪者C訪談資料）

上述兩種對於媒體角色定位的認知差異，究竟會對實際新聞工作產生哪些影響？本研究試圖從上下游新聞內部在討論〈高麗菜價雪崩 農民怒農委會放任進口「高官才是真正的菜蟲」〉這則報導的取向時所產生的衝突說明。2016年12月上下游新聞報導高麗菜菜價議題時，汪文豪、林慧貞皆已離開上下游新聞，該則新聞由郭琇真及新進記者賴郁薇負責處理。議題發生的背景是2016年09月高麗菜受到颱風影響產量大減，到了11月中高麗菜價飆升，政府為了穩定菜價因而進口1600餘噸的高麗菜，但在10月底政府便事先預警颱風後復耕的高麗菜將於

12月中盛產、彼時菜價可能暴跌，爾後菜價一路從11月中的高點每公斤50元，一路下降到12月底的低點每公斤5元。這個高麗菜菜價波動幅度極大的現象被稱為「菜土菜金」。

郭琇真在處理這個議題時，有感於菜土菜金的現象每年都會發生，因而希望報導能夠完整呈現農民、政府、產銷業者、進口業者、通路等不同立場的說法，從結構層面檢討菜土菜金為何每年都會重來一次。然而，記者認為儘管自己在平衡報導的前提下，除了呈現農民對政府的批判外，同時訪問了政府部門、經銷商、貿易商等相關人士，報導也如實呈現他們的說法，但主編馮小非後續調整報導段落及引述內容的編輯方式，會讓讀者直接將問題歸因於政府單位，未能深入檢視該議題的複雜結構，郭琇真認為這種做法違背新聞專業對於平衡報導的基本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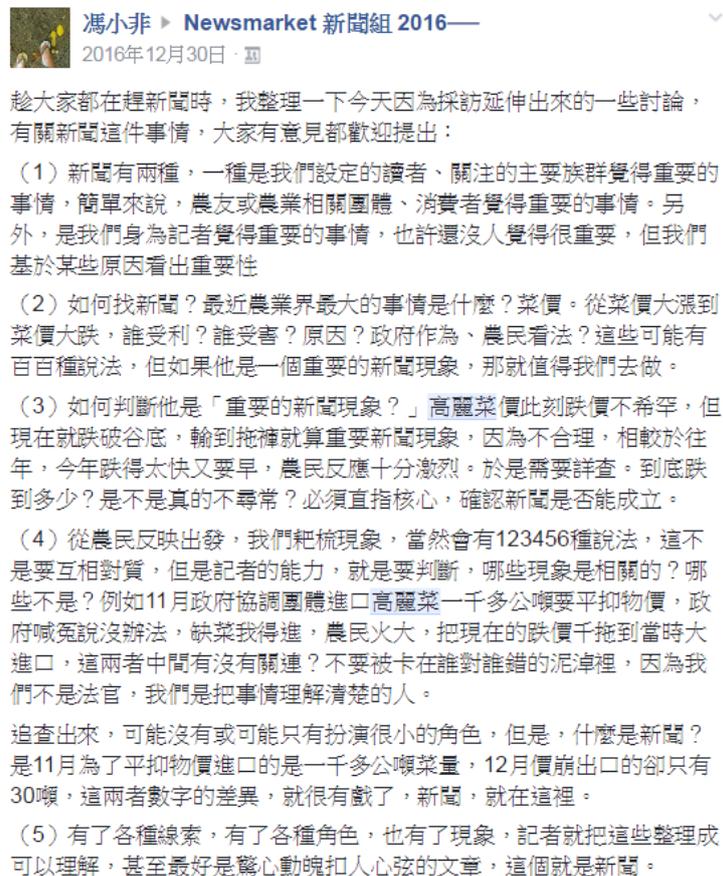
最後的角度變成小非把農民的說法當成主線，然後就是試圖引導讀者說，這件事農民的批判才是對的。即便我們在文章的某一行去兜說全聯說甚麼甚麼，其實那個平衡還是沒辦法達成，就是沒有辦法產生一些可以相抵抗衡的力道。(郭琇真，2017年05月12日)

對此，馮小非則是認為記者在處理該則報導時缺乏新聞點，當時她發現2016年菜土菜金現象的價差比往年嚴重，因而認為除結構性因素外，勢必還有一些特殊外力介入導致這樣的結果，馮小非嘗試從農民的抱怨切入該議題，檢討政府與進口業者的缺失如何造成2016年末的價差較往年嚴重：

我覺得沒有新聞點，新聞點不夠，所以我想把新聞點拉上來，可能琇真就會覺得說我是在強迫她，那個對我來說根本就不是甚麼立場、也不是(偏袒)小農、也不是覺得要去對抗國家，我覺得我根本沒想到那裡，我只是覺得那個新聞對我來說就是不好看，所以我想要在不好看的東西當中，抓一個新聞點上來。(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經過溝通過後，郭琇真有感於自己無法說服主編馮小非，因此還是依照馮小非建議的切入角度與段落安排處理這則新聞，從農民的角度出發批判政府在貿易商管控上的缺失。當晚，馮小非於上下游新聞的臉書虛擬編輯台發表了一篇貼文，詳細說明她之所以採取這種切入角度的理由（詳見圖 4-3-1）。在貼文裡，馮小非提到「從農民反應出發」，也就是說她選擇以農民對政府的批判做為議題的發問起點，提問「誰受利？誰受害？」，並將「2016 年菜價暴跌時間點過早」視為議題衝突關鍵，試圖藉由各方的回答梳理造成現象的可能成因，最後她將 2016 年菜價提早跌到谷底歸因於政府的失能。這種做法可以反映儘管馮小非同樣將促成溝通與改變視為報導終極目標，但不同於離職記者認為這個目標得藉由平衡呈現多方意見才能達成，馮小非認為藉由具故事線的報導讓大眾看到農民、感知農民遭遇的困難，是進行溝通前的先備條件。

圖 4-3-1、擷取自上下游新聞臉書虛擬編輯台



馮小非 ▸ Newsmarket 新聞組 2016—
2016年12月30日 · 圖

趁大家都在趕新聞時，我整理一下今天因為採訪延伸出來的一些討論，有關新聞這件事情，大家有意見都歡迎提出：

- (1) 新聞有兩種，一種是我們設定的讀者、關注的主要族群覺得重要的事情，簡單來說，農友或農業相關團體、消費者覺得重要的事情。另外，是我們身為記者覺得重要的事情，也許還沒人覺得很重要，但我們基於某些原因看出重要性
- (2) 如何找新聞？最近農業界最大的事情是什麼？菜價。從菜價大漲到菜價大跌，誰受利？誰受害？原因？政府作為、農民看法？這些可能有百百種說法，但如果他是一個重要的新聞現象，那就值得我們去做。
- (3) 如何判斷他是「重要的新聞現象？」高麗菜價此刻跌價不希罕，但現在就跌破谷底，輸到拖褲就算重要新聞現象，因為不合理，相較於往年，今年跌得太快又要早，農民反應十分激烈。於是需要詳查。到底跌到多少？是不是真的不尋常？必須直指核心，確認新聞是否能成立。
- (4) 從農民反映出發，我們把梳現象，當然會有123456種說法，這不是要互相對質，但是記者的能力，就是要判斷，哪些現象是相關的？哪些不是？例如11月政府協調團體進口高麗菜一千多公噸要平抑物價，政府喊冤說沒辦法，缺菜我得進，農民火大，把現在的跌價千拖到當時大進口，這兩者中間有沒有關連？不要被卡在誰對誰錯的泥淖裡，因為我們不是法官，我們是把事情理解清楚的人。
追查出來，可能沒有或可能只有扮演很小的角色，但是，什麼是新聞？是11月為了平抑物價進口的是一千多公噸菜量，12月價崩出口的卻只有30噸，這兩者數字的差異，就很有戲了，新聞，就在這裡。
- (5) 有了各種線索，有了各種角色，也有了現象，記者就把這些整理成可以理解，甚至最好是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文章，這個就是新聞。

二、 立足何地？運作制度之於上下游新聞

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 提到，另類／獨立媒體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讓另類媒體得以跳脫傳統新聞學既存的地基 (common ground)，開展不同於以往的新聞實踐模式、複雜化媒介實踐樣態。例如有別於主流媒體科層化的組織結構，另類／獨立媒體內部多採水平化運作，讓每一名工作者在產製過程都能盡可能享有平等的決策權力，每個職位負責的工作內容也非絕對。此外，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具較多彈性調整空間的特質，也讓另類／獨立媒體得以經常進行報導格式上、文類上，以及內容上的創新。

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強調的流動性、去制度化與彈性，具體展現在另類／獨立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產製的掌握程度。採個人作業的獨立記者在新聞產製流程中幾乎享有絕對的決策權；在另類／獨立媒體組織內的記者也多採用一種近似於「組織內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在水平化的結構中，幾近獨立地從事新聞工作。如此強調新聞自主的工作方式起先是為了翻轉主流媒體對於記者新聞自主的壓迫，但隨著另類／獨立媒體或記者累積專業與經驗、精進報導方式、擴充議題面向的同時，勢必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包括人力、資金、時間等，一旦資源規模增加，明確的管理與經營制度也就顯得越重要。也就是說，在另類／獨立媒體深化媒體專業程度的同時，也需要一套管理各種資源的制度協助另類／獨立媒體穩定發展。如何在保持彈性以應對內外變化並顧及新聞自主的前提下，找出一套穩定的組織管理制度，是另類／獨立媒體長遠發展的過程中勢必會面臨的問題。

從研究對象上下游新聞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另類／獨立媒體去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會隨著組織的變革與擴張，顯現缺陷並成為組織內部衝突的根本原因。上下游新聞成立之初考量到記者長年受政商壓力影響而無法自主發揮新聞專業，採取一種近似於獨立記者的工作模式，希望藉此提升記者的新聞自主空間。然而，如同本章第二節所提，上下游新聞隨著讀者閱讀習慣改變、社群興起、組織成員變動等內外情境變化而調整組織工作模式，在這過程中會因為成員角色定位與新

聞產製流程未具明確規範而觸發內部衝突。對此，無論是馮小非、或是已離職的汪文豪、林慧貞及郭琇真都認為，缺乏制度規範組織運作以及明確的新聞產製流程，是上下游新聞發展過程中產生衝突、甚至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我一直覺得制度很重要，因為今天一個組織如果沒有建立一套制度去運作的話、如果今天是建構在一個人……今天如果有一天小非她倒下來了，那我們上下游是不是就垮了？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如果一個組織是信一個人、完全一個人的狀況下，我覺得是很危險。（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對於已離職的記者而言，上下游新聞的新聞實踐缺乏依成員共識而建立的運作制度，儘管如本章第二節所提，上下游新聞在成立的前兩年即有基本的新聞室運作模式，像是由編輯負責下標、撰寫引文、記者需定期報題與交稿、由資深記者負責審稿等，但原則上還是在尊重記者新聞自主的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記者受到制度的束縛。然而，隨著年輕記者的加入、編輯增加對新聞產製的介入增加等內部變動，去制度化的運作反倒使得上下游新聞的編輯和記者在面臨不同角色各自該負責哪些工作、產製方式上的歧異該如何解決、成員間的關係該如何認定、是主管還是同事等問題時，顯得無所適從。

共同創辦人暨資深記者汪文豪也提到，媒體在強調自身的獨立性或另類性時，同時也需要制度協助組織長遠發展，但上下游新聞卻是把組織的發展繫於個人，從經營、新聞決策到資金運用，很多時候都是由經營者馮小非主掌。也就是說，今日上下游新聞能夠順暢運作，是因為馮小非在其中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未來極有可能因為馮小非個人職涯的流動，而使得缺乏制度支持的上下游新聞隨之崩解。從組織永續經營的觀點來看，以制度為核心的組織運作模式還是有其必要。

另一方面，經營者馮小非同樣認為即便上下游新聞規模很小、成立至今專任成員最多不超過6人，但組織仍需要一套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不同於記者從

組織永續經營與長遠發展的觀點來看待制度化新聞實踐，馮小非則是從組織如何面對內外情境的挑戰出發，主張制度化的角色定位、新聞產製流程，才能幫助團隊整合不同專長的成員以因應內容產製形態的轉變，而缺乏制度的結果，便是成員各行其事、分散團隊的力量：

我真的覺得上下游的這個經驗雖然講出來是很尷尬，但是我覺得如果對於其他去做小的媒體的人，其實可能也是很寶貴的經驗，不論你再小，你可能一開始就得建立一個制度。（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在馮小非看來，上下游新聞成立之初鑒於主流媒體對記者的壓迫，因而採行進似於獨立記者的工作模式，尊重記者在報導產製過程中的獨立自主：「我們早期的時候覺得獨立媒體等同於獨立記者，因為我們認為記者就是因為在主流媒體無法得到獨立的空間，所以我們應該支持記者來到獨立媒體。（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未能從一開始便建立制度化的團隊運作模式，導致2013年過後，上下游新聞在面臨各種內外情境變動之際，包含社群興起、多媒體媒材演進、讀者習慣改變等，內部無法協商出一套彼此都能接受的工作方式，進而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內部衝突：「後來才發現就是，原來你一開始制度就要建立好，來的人才不會混淆。（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過往的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強調去制度化的特質，儘管可以幫助媒體保持彈性以應對內外情境的種種變化，但從組織層面來看，去制度化的結果反倒有可能使得內部關係過於鬆散，造成組織資源整合困難。另一方面，對於工作者個人而言，在職涯發展追求專業深化的過程中，極需要組織穩定經營模式與制度化產製流程支持，才能幫助記者心無旁騖地處理報導。郭琇真便提到，2017年02月上下游新聞曾發表的《失控的低溫物流，揭開四大宅配亂象》系列專題，由於該專題揭露統一、嘉里大榮等大型運輸業者違反法規之處，郭琇真擔心可能會招來一些法律問題，因而多次要求主編馮小非需提前找好法律資源。郭琇真認為當

時主編未能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以至於直到報導刊出馮小非才開始連絡法律顧問，對於撰寫報導的記者來說，此舉是讓記者單獨面對調查報導後續可能引來法律問題及企業威脅，上下游新聞未能以組織的力量協助記者面對：

我可能未來要面臨這樣的法律訴訟，應該是這組織要提供我一些資源，讓我可以去應對，可是我發現在這樣的狀態下，他並沒有把這層思考放在裡面，這個狀態我覺得甚至比主流媒體還不好，因為主流媒體是都會有這樣的資源支持的。(郭琇真，2017年05月12日)

對此馮小非則回應，上下游新聞團隊在處理該則報導時，已經做好所有查證工作、確保報導內容無誤，她不認為記者或上下游新聞會有被告的可能：

上下游不可能做一個讓你(記者)被告的東西，沒有做錯為什麼要怕……我不是說不用為他們準備，但是絕對不要做到自己會被告，這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做到的事情，如果今天我覺得有一分一毫我們可能會被告倒的話，這東西我不會上，我覺得有瑕疵的東西我不會上。(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從馮小非和郭琇真的回答可以發現，由於組織管理者和記者各自對於報導可能面臨的風險評估有著差異極大的見解，加上內部未有處理類似事件的標準流程，導致雙方都對於彼此對於該事件的處理方式有所不滿。

以新聞專業自許的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儘管展現許多外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實踐，但其本質仍是希望在主流媒體之外找到一個有助於實踐新聞專業的空間。也就是說，對於以專業自許的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工作者而言，選擇另類／獨立新聞實踐模式的前提是，這種模式有助於新聞工作者實踐自身對於新聞專業的理念，若這套新聞實踐模式無法幫助記者和編輯深化專業，那麼工作者的出走或改變便成了必然。有的工作者會回到主流體制尋求穩定制度的協助；有的則是捨棄

去制度化的實踐模式，嘗試繼續在另類／獨立媒體場域另闢蹊徑、建立集中資源與人力的制度化運作模式。

儘管許多獨立記者的案例證實，記者仍可獨立走完新聞從發想、規劃、採訪、寫作、編輯到出版的產製流程，但當工作者想要深化報導專業、整合資源以應對外部變化時，制度化的團隊可以較有效率的協助工作者達成上述目標，而另類／獨立媒體以往強調自主且不受拘束的工作方式，反倒成了讓工作者無所適從的束縛。隨著組織成長，如人力擴充、增加報導路線、提升投入報導產製的資源數量等，另類／獨立媒體還是需要制度化的產製模式協助管理、分配資源。

尤其對年輕記者而言，媒體組織能不能提供記者成長的空間，是年輕記者的首要考量，而成熟的經營模式、結構體制以及新聞室產製流程對於記者的專業累積影響甚大。以往記者在另類／獨立媒體內部就像是「組織內的自由工作者」，這種模式確實讓記者能夠享有較程度的新聞自主，但在年輕記者培養職業專業的過程中，經常需要第二人來幫助自己跳脫採訪或寫作的盲點，像是專業編輯的協助便能幫助記者突破寫作困境，此時團隊化的運作也就有其必要。主編馮小非也有意識到年輕記者需要編輯的協助以累積專業，因此她會較常介入年輕記者產製報導的過程，她認為自己可以藉由過去在食農領域累積的經驗和知識，協助生活經驗與報導經驗都還不足的年輕記者突破自己的報導盲點，並以編輯的角色出發協助記者思考讀者會如何看待稿件。然而，在缺乏明確制度規範的前提下，介入程度的拿捏會影響記者認知這樣的方式到底是「指導」還是「指示」，如同本章第二節所提，爾後年輕記者認為主編對於新聞產製的介入過深，讓他們覺得新聞自主受到壓迫，因而決定離職。

對此，在上下游新聞工作長達四年的林慧貞認為，上下游新聞過往去制度化的新聞工作模式確實可以幫助年輕記者快速成長，但隨著記者累積經驗，組織若未能提供年輕記者新的刺激或流動，例如嘗試不同的報導觀點、透過密集改稿修正寫作模式等，年輕記者的成長便會陷入瓶頸：

對新記者來講他還是成長得很快，因為的確上下游還是相對於主流媒體有一些空間，可是這種成長可能到一兩年會停滯，因為這個媒體就已經定型，如果你沒有一些新的刺激、或是一些新的營運方式，他就是一直都會這樣流動（離職）。（林慧貞，2017年06月08日）

當組織內部只有1名主編，同時得照顧2~3名記者，還得處理稿件編輯，主編未必能仔細檢視記者的稿件、詳細指出記者的稿件缺失。林慧貞便是有感於自己在上下游新聞的成長陷入停頓，且組織未能協助她突破瓶頸，因而決定離開上下游新聞：

小非她也沒有時間顧我，我要寫的東西，寫出來到底有沒有人看得懂，或是寫出來很爛也沒有人跟我講，完全只能靠我自己想辦法跟人家討論。（林慧貞，2017年06月08日）

此外，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同時也包括人力管理與勞動權益，成露茜（2009：375-376）提到，組織資源不足、工作者薪資有限的經營困境，是許多另類媒體生命短暫、工作者不斷進進出出的主因。儘管陳順孝（2014）提到，近幾年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或獨立記者多採用「組合式工作模式」開闢不同財源，整體的薪資收入未必會比主流媒體差，但對有意從事另類／獨立媒體工作的工作者來說，在收入之外，差勤、休假制度等權益同樣對工作者勞動處境影響重大。

上下游新聞成立的前幾年，內部並沒有明文規定勞動權益與福利，記者和編輯有感於成立初期內部資金、人力都不足，因而未多加要求差勤補休制度，對於記者何時該放假、何時該補休都沒有建立共識性的規範，但隨著工作者在組織待的時間越長，缺乏制度性的差勤方式開始讓記者心生不滿。

從組織管理者馮小非的角度來看，記者的差勤只要記者和管理者達成口頭達成共識即可，然而對記者來說，這種方式反而讓管理者握有決定是否記者是否可

以放假的決定權。位置權力上的差異，讓記者覺得自身勞動權益受到壓迫：「但你就始終不懂它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就一切變成是她說了算。(受訪者 D 訪談資料)」汪文豪也提到，獨立／另類媒體在實踐理想的同時，還是得顧及記者的勞動權益，如此組織才能留得住人才：

我覺得(沒有明確差勤制度)不是一個組織應該合理運作的方式，就是法規這個東西不是就是一個最低的標準嗎？雖然我們是獨立媒體或我們有很多理想，但不代表說這些(不用遵守)。(汪文豪，2017年05月12日)

2016年中，上下游新聞換了一個全新的工作團隊，新成員裡有兩位記者都曾在具明確制度的媒體任職，當他們加入上下游新聞時也一併把制度化的差勤與薪資福利制度帶進上下游新聞，例如有一名記者便直接把過去和前東家簽的合約內容交給馮小非參考。馮小非認為，爾後建立的制度化差勤補休制度有助於減少記者和管理者發生衝突的機會，也讓她意識到上下游新聞確實需要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取代以往人治的方式：

沒有制度它就會衍生出這些問題，它就會太像是單獨的人治……以前的我會覺得大家講好就好，可是後來就是佳珊進來之後提醒這些東西，我會覺得原來這樣比較好……就把它講清楚就對了，那我就說那你們自己要去登錄，他們就有一個 excel 表，他們自己會去登，然後再把它累積成假期。(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

從上下游新聞的經驗可以發現，去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可以幫助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取得較多新聞自主的空間，如此不受制度的彈性化經營也確實能幫助另類／獨立媒體因應內外情境的變化做出即時反應。然而，當組織的專業發展需要更多資源的投入時，去制度化的經營反倒讓另類／獨立媒體無法妥善整合各

種資源。此外，儘管組織規模小、內部關係也較為水平，但上下游新聞種種衝突經驗揭示，明確的角色定位才能避免內部成員因角色定位不明而對彼此的職務範疇產生錯誤的認知。

另一方面，從記者個人層面出發來看，當媒體的資金、營運模式不穩定的時候，記者會隨著組織的變動起起伏伏，成熟的經營模式、結構體制、產製流程才能夠讓記者心無旁騖的產製報導，換句話說，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還是有助於記者的專業累積。但成露茜（2009）提醒，另類／獨立媒體形塑制度化工作模式的同時，有可能忽略或遺漏另類媒體新聞實踐的新觀點。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必須思考，如何在採用制度化的新聞實踐模式以深化專業、維護工作者勞動權益、妥善整合組織資源的同時，仍保有一定彈性以面對內外情境的變革。

第四節、塊莖樣的上下游新聞

本研究試圖從受訪者言語中提供的軌跡，探詢上下游新聞成立至今，新聞實踐面貌的不斷生成。不只要描繪上下游新聞的新聞實踐面貌，更要呈現新聞實踐面貌如何在內外情境的交互作用下，時而交雜蔓生、時而分離斷裂。如同本文第三章所提，將另類／獨立媒體視為塊莖的研究者，在探詢塊莖生成的複雜連結時，需藉由工作者做為導航員帶領研究者遊歷地圖上的各種連結。同樣的新聞實踐特質，經由不同的連結方式會構成不同的地圖，每一種的地圖繪製都有其獨特之處，以塊莖視野觀看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可以幫助研究者以開放的視角凸顯每一幅塊莖地圖繪製的多變性，以及地圖繪製者在以變為常的生成過程中所展現的彈性。

本章第一至第三節藉由受訪者的敘述呈現上下游新聞遭遇內外情境變化時，如何調整原有的新聞實踐方式。例如第一節提到，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蘋果日報》以即時新聞搶攻市場，以及食安議題特性使然，讓上下游新聞將每日即時新聞納入媒體欲處理的新聞類型範疇，組織內部也隨著外部情境變動而調整原有

的互動方式，像是主編對於新聞的介入程度提高等；第二節提到社群的普及改變了上下游新聞的新聞產製方式、在累積報導經驗的過程中，和讀者的關係也有所變動；第三節則說明上下游新聞面臨外部媒體情境和內部互動衝突，開始反思自身媒體定位、還有以「獨立」、「另類」形容自己是否恰當。

上述田野資料所呈現的變動，在在映照上下游新聞「以變為常」的新聞實踐生成。塊莖思維的生成觀點彰顯塊莖體「在中間」的狀態，這個狀態是未完成且具有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吳姿嫻，2014），並不會朝著既定的方向前進。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也是一樣，我們無法預測另類／獨立媒體會生成甚麼樣子，無論何時何地，另類／獨立媒體都處在一種未完成的狀態，因為過去內外情境的變化而生成當今的實踐樣貌，同時又因為此時此刻的種種境遇而改變未來的實踐樣貌。

以塊莖的連結觀點（Connection）觀看上下游新聞實踐生成過程中的種種變動，讓研究者得以格外留心上下游新聞建立、斷開連結的過程受到哪些力量驅使。上下游新聞因種種實踐方式的差異而衍生出內部衝突，並隨著舊成員的離開、新成員的加入，生成一個實踐模式和以往不同的上下游新聞，而離開的成員也以不同於上下游新聞的經營模式創辦新的媒體。如同塊莖思維強調塊莖體會在生成過程中不斷分裂與重生且每一次的連結都是獨特且異質的，在上下游新聞的分裂點上，同樣產生了異質（Heterogeneity）的連結樣式，並就此生成兩個不同於過往新聞實踐模式的媒體。

除了關注上下游新聞如何在分裂點上重新建立連結外，將域外新聞工作模式引入塊莖體內同樣也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為了增加在臉書社群的曝光機會，上下游新聞引入主流媒體採行的新聞行銷模式，調整原有的下標及臉書貼文引言撰寫方式。上下游新聞與社群建立連結，連結的力量同時迫使上下游新聞打破原有的疆域界線，和域外的主流媒體產製模式建立連結。

另一方面，上下游新聞做為一個塊莖，內部原先關係是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但隨著加入塊莖體的連結越來越多，開始有一股集中性的力量試圖聚攏各

種連結、疆域化塊莖體，當塊莖體的疆域發展到一定程度且遭遇內外力量的衝擊時，塊莖體的集中性力量便會被打破，塊莖體也會隨之分裂，此時塊莖體內的連結方式也會有所改變。上下游新聞內部互動從一開始以記者個人為中心、互不干涉，爾後隨著組織規模過大、成員人數增加，主編愈發介入記者的新聞產製過程，組織逐漸演變成以主編為中心的產製模式。後來幾次的衝突發現中心化的產製模式，經常引發上下游新聞實踐過程中的內部衝突，組織因而再次調整內部新聞產製模式，以主編制及共同守門制雙管齊下，平衡主編獨大所造成的權力差異。

再者，媒體不分主流或另類，組織內部都會建立如同塊莖體疆域內點和點之間的必然連結，只是相較於科層化程度較高的主流媒體，另類／獨立媒體因組織規模小、成員互動頻繁，使得成員間的連結較為緊密。上下游新聞成員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所展現的資訊共享、協作式守門、較開放的討論方式，都可以被視為成員作為塊莖的相互連結。因為連結，塊莖體得以取得生存、擴張所需養分，也讓塊莖能夠取得抵抗隱約主導塊莖體發展的力量。

此外，塊莖的每一個連結都是特殊且異質的，另類媒體新聞學研究提出許多另類媒體新聞實踐的共同特質，像是去階層化的組織結構、非營利導向的經營、讀者涉入報導產製、偏向使用庶民消息來源。但當我們將另類／獨立媒體視為塊莖時可以發現，每個另類／獨立媒體都會因為對於角色定位、媒體所欲發揮的影響力等認知差異，而連結出不同的新聞實踐特質。像是上下游新聞成立之際便是在追求媒體獨立運作、不受政商力量干涉的前提下，將自籌財源連結到獨立的新聞室運作；在組織運作層面，則是從一開始的水平化運作、到後來的類科層化結構、再到現在的「科層＋共識」運作模式。上下游新聞也隨著實踐經驗與投入資源的增加，將制度化的組織經營與產製模式連結到上下游新聞實踐。從上述生成經過可以發現，上下游新聞實踐生成過程中所建立的連結，並非只是在另類媒體新聞學所提出的定義內選擇連結的對象，連結的形式會隨著組織所面對的情境差異而有所改變，正好可以回應 Deleuze 和 Guattari 所說的，塊莖的每一個連結都

是異質的（Deleuze & Guattari, 1980／姜宇輝譯，2010）。

不同另類／獨立媒體之間建立連結的方式也會有所差異，例如《報導者》同樣是追求獨立的新聞室運作，但不同於上下游新聞將這個理念連結到社會企業形式，《報導者》則是採用非營利基金會做為組織的經營模式，內部也從一開始便有明確的科層與運作模式，但這種科層又異於主流媒體會藉由新聞室社會化控制影響記者，《報導者》將自己的科層化運作連結到另類／獨立媒體的水平化運作，即便內部具有一定的科層角色，但各角色的溝通會盡量在平等的前提下進行。

上述種種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生成過程中的異質連結、分裂與重生，都在彰顯了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在中間」的特質，生成過程中的種種連結都是獨特的、由諸多連結建立的塊莖也是異質且多元的，總是處於「在中間」、未完成的狀態，不會隨著既定的發展套路，只要另類／獨立媒體自覺需要改變、或內外情境迫使另類／獨立媒體改變，塊莖體隨時都有可能被修正，就如同 Deleuze 和 Guattari（Deleuze & Guattari, 1980／姜宇輝譯，2010）所提，塊莖是獨特的、不可預測、未完成的，在「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並存的狀態下不斷生成。

塊莖體經由逃逸路線突破既有疆域的限制、與域外物產生連結，然後再次建立疆域，不斷在如此「疆域化—解域化—再疆域化」之間流轉生成。然而，塊莖既有疆域需發展到一定強度並建立疆域的界線，塊莖體才會跨越界線、經由逃逸路線連結域外物。從本研究案例上下游新聞的生成也可以發現，每一個新聞實踐面向的生成，都得等該面向發展到一定穩定狀態後，才會凝聚突破既有疆界的能量。例如，當上下游新聞以深度報導與日常主文建立媒體專業化形象、提升媒體知名度的同時，組織編輯便開始思考此兩種穩定發展的新聞類型是否真能回應外部情境變化，爾後上下游新聞將每日即時新聞納入上下游新聞處理的新聞類型時，也是奠基在過往記者經由深度專題與日常主文建立的人脈基礎上，取得處理每日即時新聞所需的人脈網絡。

另一方面，Deleuze 和 Guattari 在《千高原：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一書中，以蜜蜂及蘭花構成的覓食－授粉型態，說明塊莖體如何與域外物建立連結（Deleuze & Guattari, 1980／姜宇輝譯，2010）。蘭花提供蜜蜂生存所需花蜜，蜜蜂則是在汲取花蜜時，順帶將蘭花花粉沾黏在身上，經由至其他蘭花汲取花蜜的路線，替蘭花進行授粉，兩者之所以建立這種連結方式，受到蘭花與蜜蜂各自的生存及繁衍需求所驅動。同樣的，研究者認為上下游新聞的連結、分裂與蔓生，同樣得受特定力量驅使才有可能發生。研究者認為，上下游新聞之所以在 2016 年汪文豪、林慧貞及郭琇真離職過後，分裂成《上下游新聞》與《農傳媒》兩個不同的媒體，原因便在於兩位共同創辦人與域外物進行連結時，分別受到不同力量的驅使，而產生不同的連結樣態。

從田野資料可以發現，汪文豪受到自身對媒體應該以專業報導呈現多元觀點的角色定位驅使，當組織遭遇社群普及、媒體內容市場變化、社會食安事件日愈增加等外部情境的挑戰時，汪文豪認為上下游新聞應該加強和專業化報導與多方觀點的連結，以此建立媒體區隔；馮小非則是認為，面對上述種種外部情境的挑戰，上下游新聞應該以「回應讀者日常生活所需」做為改變驅力，盡可能地藉由專業讓媒體與域外的讀者產生連結，並以此連結促成食農領域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相互理解。

當上下游新聞處在解域化的破口，兩位共同創辦人因自身對於媒體角色認知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塊莖連結樣態。馮小非留在上下游新聞，另組新的工作團隊，除了藉由共同守門、制度化的勞動差勤規範等運作模式重新建立組織疆域外，同時也致力於促成讀者對媒體的連結感；汪文豪則是離開上下游新聞，藉著官辦財團法人豐年社的支持取得報導所需資源、成立《農傳媒》，將新聞實踐連結到深度報導與呈現多方觀點，藉由這些連結深化媒體促成社會溝通的功能。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結果

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發展總是隨著政經背景變動而有所消長、展現不同的運作模式及實踐特質，像是戒嚴時期黨外雜誌、地下電台等異議性媒體的實踐，便以傳遞政治異議理念、推動民主轉型為主要目的，爾後隨著政治解嚴、政黨輪替，這些異議性另類媒體因民主化等階段性目標已達成而逐漸消融。近幾年，主流媒體受商業化、集團化影響，在新聞專業表現上漸露疲態，屢屢可見商業邏輯凌駕於新聞專業邏輯的弊端，主流媒體在新聞專業表現上的頹勢，為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提供發展的空間。管中祥（2015）便提到有越來越多的另類／獨立媒體打破既有「非正式」、「非專業」的框架，以正式的組織結構深化新聞專業表現。另一方面，數位傳播科技的發展也為另類／獨立媒體創造發展的契機，隨著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的普及，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傳播管道，也使得以往大眾對於「什麼是新聞？」的認知有所動搖，人們不再只是單單接收來自主流媒體的訊息，同時也會運用數位科技建立其他接收新聞資訊的管道，另類／獨立媒體便是其中一個選項，而數位科技傳播成本較為低廉的特質，更是降低了另類／獨立媒體進入媒體市場的門檻。

Downing（2001）提到另類／獨立媒體必然會受到新聞工作者個人經驗、從業經歷與所處情境所影響而改變實踐樣貌，若僅用既有的理論定義來檢視各地另類／獨立媒體，將會錯失潛藏在「獨立」與「另類」之名下，獨特且多樣的新聞實踐面貌。過往台灣有關另類、獨立媒體的實證研究，多就媒體的組織結構、經營模式、內容產製特質、內容所發揮的基進性效果等特質進行探究（管中祥，2015；陳順孝，2014；張傳佳，2013；管中祥，2009），從田野資料找出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共通特質，藉由描繪群像建立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基本輪廓。然而，

目前仍缺乏研究探勘另類／獨立媒體在實際工作場域中所展現的異質性，且也未有研究關照另類／獨立媒體不斷變動的實踐樣貌。

有鑑於西方研究有關另類／獨立媒體定義框架，無法如實映照植基於本地脈絡、個別實踐樣貌殊異的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如何「做新聞」，且過往台灣的研究者多關照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的群像，未能深入發掘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在新聞實踐過程中所展現的異質與變動，本研究因而決定藉著深入另類／獨立媒體的工作場域，發掘媒體在因緣際會下所生成的獨特新聞實踐面貌。比起試圖找出以變為常的另類／獨立媒體如何「存有 (being)」，本研究認為採行動態視角觀看另類／獨立媒體如何「生成 (becoming)」更能反映其以變為常的本質，因此研究者採用「與變共處」的塊莖思維做為研究取徑。使用塊莖思維來看待另類媒體，有助於研究者凸顯另類／獨立媒體流動與不斷變動的特性，這些「變」有可能是另類／獨立媒體自身的演化、與域外物的連結；也有可能是另類／獨立媒體組織的分裂與重生。

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皆有各自獨特的生成地圖與新聞實踐面貌，因時間限制，本研究無法窮盡所有的另類／獨立媒體，研究者考慮到成立時間、組織結構等因素，選擇以《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做為研究案例，藉由深度訪談七名先後任職於上下游新聞的工作者，以及觀察其臉書虛擬編輯台運作，探勘上下游新聞的新聞實踐面貌與生成。以下總結研究發現：

(一) 組織編制與角色定位的變動缺乏成員共識，造成內部衝突日增

成立已屆六年的上下游新聞，其間成員變動頻繁，從 2011 年創立之初的兩名專職成員、到 2017 年的五名專職成員，組織規模即便加上特約記者，最多也不超過 10 人。由於組織規模小、科層較主流媒體鬆散，上下游新聞內部角色起先並沒有明確的分工，就如同其他小規模的媒體，成員經常得身兼數職。2013 年過後，隨著臉書的興起、讀者閱讀習慣改變等媒體環境變動，加上上下游新聞所關注的食農議題隨著社會食安事件層出不窮、逐漸成為社會熱門關注議題，讓上

下游新聞開始調整組織編制。上下游新聞主編馮小非有感於組織為了因應外部讀者對於多媒材報導的需求而增加投入報導的資源時，內部需要一股力量整合人力、多媒體後製等資源，才能讓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因而嘗試由主編主導團隊運作，期望以團隊化的工作形態因應外在世界的變動。

例如，在社群時代，閱聽人多在臉書上自行組織接收資訊的管道，臉書因而成為新聞媒體極為重要的露出平台，尤其新創的另類／獨立媒體缺乏資源、無法投擲大量廣告以吸引閱聽人目光，臉書的開放性因而成了另類／獨立媒體爭取點閱率的助力。上下游新聞便曾聘用具主流媒體臉書粉絲專頁操作經驗的專職主編，協助上下游爭取臉書曝光度與觸及率。另一方面，在社群時代的自媒體趨勢裡，人人都可以自行建立對外傳播的管道，讀者對於什麼是媒體、什麼是新聞的認知因而有所轉變，馮小非提到：「每一天都有人一直在拋出各式各樣跟新聞有關的而且含金量可能很高的訊息，他都還不用經過新聞寫作，他(po)出來就直接是一條新聞了。(馮小非，2017年05月07日)」自媒體的出現讓新聞媒體不再是閱聽眾獲取新聞資訊的唯一管道，對此，馮小非認為上下游新聞在選題上得更為注重議題和讀者之間的連結，也需調整原先近似於獨立記者個人的產製模式，以團隊資源整合發展出能夠吸引讀者的敘事方式，藉由如此從讀者角度出發的選題與呈現形式取得讀者青睞：「記者就是要寫出很精彩的東西，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很有理念的記者，我就可以不用寫精彩的東西.....你做為一個媒體老是寫不好看的東西，這樣對嗎？(馮小非，2017年08月09日)」

從馮小非的立場來看，平等且鬆散的內部相處模式，固然有利於記者享有較大的新聞自主空間，然而對於不斷面對外界挑戰、生存空間時時受到社群等外部情境壓迫的另類／獨立媒體而言，需要一股整合性的力量帶領團隊積極回應讀者所需與內外變動。產製模式的調整，同時也牽動著記者和主編互動關係的轉變，成立之初上下游新聞記者和主編經歷類似、雙方互動較為平等，爾後隨著組織規

模擴充、年輕記者加入，主編和記者的互動因資歷差異以及組織工作模式變動而有著上對下的指導意味。

再者，主編馮小非既是共同創辦人、經營者、產品部主管，多數時間還同時擔任新聞部主編，角色的多重讓馮小非在上下游新聞內部的角色定位會隨著當下情境而有所變動。由於內部未能明確規範各角色定位、成員彼此對於各角色的職權範圍也缺乏共識，2013 年過後主編以「整合」之名對記者新聞產製的種種介入，有時會被記者認定是對新聞自主的壓迫；另一方面，記者和主編也未能就標題寫作、新聞類型等產製模式的調整取得共識。成員之間溝通不良、角色定位與互動方式不明確的結果，引發多起內部衝突，最後也使得成員離開上下游新聞。

共識在上下游新聞內部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記者加入上下游新聞之際，對於上下游新聞會存有某些有別於主流媒體產製形態的想像：「我的設想是我在上下游裡面，獨立媒體或許有更多能夠討論的空間。(受訪者 A 訪談資料)」成員期待上下游新聞的內部互動能夠在彼此都有共識的前提下進行新聞決策。

2016 年，汪文豪等舊成員先後離職、上下游新聞工作團隊大換血之際，主編馮小非有鑑於過去種種內部衝突經驗，重新調整自己和記者的互動方式，並和新成員一同推動共同守門模式，讓強調成員協作的共同守門制與主編單獨守門制並行，藉此一方面尊重記者基於採訪經驗及先備知識的判斷、一方面回應編輯基於自己對讀者的觀察所提出的修改建議。共同守門模式也可說是上下游新聞認為整合各式資源有其必要的前提下，成員與主編進行協商的一種方式。

共同守門模式之所以得以運作，仰賴上下游新聞長久以來使用臉書虛擬編輯台做為內部溝通管道的互動方式，此虛擬編輯台取代實體編輯台發揮工作分配、交稿、改稿、回報題目線索等新聞室功能。共同審稿模式便是藉著虛擬編輯台邀集所有成員參與特定稿件的審核，主編和記者也會直接在此討論標題或臉書貼文引言的下法是否妥當。

（二） 讀者體驗為王 vs. 內容為王

上下游新聞的主編馮小非極為重視讀者對於上下游新聞報導的反應，對她而言，報導能否有助於上下游新聞的讀者回應日常生活所需，是報導重要的價值衡量標準。如同前章第一節第一小節所提，上下游新聞原先的報導類型以日常主文與深度專題為主，2013 年隨著食安事件頻繁發生，馮小非認為讀者對食安事件最新發展進度的需求日增；對農民等生產者而言即時得知政策法規最新修訂進度或產業新技術，也對生產者日常工作影響重大。此外，外部媒體環境受《蘋果日報》在數位轉型過程中大力發展即時新聞的影響，讀者閱讀習慣有所轉變，馮小非認為若上下游新聞不能因應情境調整新聞類型，將會導致自己被邊緣化。因此儘管成員對於是否要跑每日即時有所微詞，但馮小非仍以回應讀者生活需求與閱讀習慣為由，大力推動將每日即時新聞納入上下游產製的新聞類型。

對馮小非而言，在資訊泛濫社群時代，媒體不能再將讀者視為被動的接收者、只能單向接收來自媒體的資訊，必須正視讀者的觀點與需求，視情況調整媒體自身新聞產製方式。舉例來說，選擇從事另類／獨立媒體工作的記者大多是有感於主流媒體邊緣化或刻板化特定議題，因而希望在尊重新聞自主的另類／獨立媒體裡，追求報導的深度與多面向。此舉確實有助於提升報導深度，然而記者若未能調整自己和讀者的互動關係，一味以資訊傳遞者或教育者的角色產製報導、忽視報導是否易於讀者「食用」，將有可能因報導過於艱澀難懂、讀者不易閱讀，而失去發揮報導影響力的機會：「你要改變自己，稍微把它（報導）做美味一點、吸引他（讀者）」。（馮小非，2017 年 05 月 07 日）」

為了吸引讀者目光，馮小非在處理新聞標題和臉書貼文引言時，會採用較具衝突性的寫作方式，對汪文豪、林慧貞、郭琇真等已離職的記者來說，此舉確實有助於吸引讀者，但若操作不當，一不小心便會加劇不同立場支持者的對立、無助於溝通。上述主編和記者之間對於標題處理的見解差異，可以反映媒體在點閱率與專業自許之間的兩難，媒體該如何一方面顧及專業自許對於標題需言簡意賅

呈現議題脈絡的要求、一方面又能藉由標題抓住讀者目光，是媒體必須面對的課題。

另一方面，所有成員皆認同上下游新聞在選題時需不以商業利益做為衡量新聞價值的標準，對於另類媒體而言，報導能夠發揮的影響力才是另類媒體欲透過報導達成的目的。然而，對於如何促成影響力、促成何種影響力，上下游新聞內部的意見分歧。

因應社群時代資訊量氾濫，資深記者既共同創辦人汪文豪認為，上下游新聞應該憑藉較主流媒體深入且面向多元的報導，建立與其他媒體不同的媒體品牌形象，發揮媒體做為溝通橋梁的影響力、連結不同立場的觀點，幫助百家爭鳴的食農產業相關人士進行溝通，促成政策法規修訂或技術開發；馮小非則認為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上下游新聞應該憑藉過去和讀者互動的經驗，從各式各樣的訊息中挖掘出與讀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訊息，藉由專業的報導將訊息產製成有用的資訊，幫助讀者因應日常生活所需。

汪文豪想法是從「內容為王」的角度檢視上下游新聞做為以專業自許的媒體，報導是否顧及食農領域不同面向的聲音、是否完整呈現議題脈絡與專業知識，主張藉由深度的報導呈現議題的多元面向與知識，建立品牌獨特的形象、提升讀者對上下游新聞的認知，而認知度的提升更有助於上下游新聞取得和消息來源互動的籌碼。馮小非則是從「讀者體驗」出發，反思上下游新聞在深化專業的過程中，報導是否真能回應讀者所需，這裡所指的不是讀者想看什麼就給讀者什麼，而是工作者在產製報導時，是否能夠換位思考對讀者而言哪些議題對日常生活影響重大、哪種報導形式便於讀者閱讀。

馮小非認為記者追求報導深度的過程中，經常自我框限報導選題與呈現形式，未能回應同溫層外的讀者需求。汪文豪等離職記者則是認為，馮小非所謂回應讀者需求的選題，經常採用特定觀點做為衡量標準，此舉無法促成不同觀點的相互理解與溝通，無助於解決議題紛爭。兩者的認知差異導引出不同的新聞實踐方式，

最後也導致雙方因差異過大而分裂。

（三） 社群媒體為重要消息來源與媒體露出管道

上下游新聞是一個原生於社群時代的媒體，成立之初便仰賴臉書平台做為報導露出管道，臉書也是上下游新聞獲得新聞線索與消息來源的重要管道。在社群時代人人都可以是傳播者，許多食農領域相關人士紛紛藉由個人動態時報或社團傳遞消息、分享從業經驗。上下游新聞不分記者或編輯，皆大量追蹤有關食農產業的粉絲專頁、個人動態時報或社團，此舉不僅有助於人力不足無法長期駐守產地的上下游新聞即時得知各農作產地最新現況，更能幫助上下游新聞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

然而，使用社群協助新聞產製的同時，卻有可能受臉書演算法影響使得新聞工作者陷入「同溫層」的束縛，如同前章第二節第二小節所提，不論主編馮小非或是已離職的記者皆提及同溫層對新聞產製的負面影響，主編馮小非認為記者受到同業交友圈與主要消息來源的影響，會在追求報導深化的過程中，忽視同溫層外的讀者能否消化報導；已離職的記者則認為馮小非長年與持特定觀點的食農組織或生產者互動，因而經常採用特定觀點切入報導，此舉將不利於報導的多元觀點呈現。

從上下游新聞的經驗可以發現，社群的出現確實改變新聞產製模式、增加媒體獲取新聞線索與消息來源的管道，但社群的群聚特質也考驗著新聞工作者如何突破既有疆域界線、如何避免自己受同溫層觀點束縛。

（四） 組織經營的挑戰

上下游新聞實踐的生成因應內外情境變動，隨時都會跨越既有疆域界線，生成新形態的新聞實踐樣貌，不論是引入域外工作模式、或是調整原有的新聞實踐模式，都在彰顯另類／獨立媒體以變為常的本質。

從上下游新聞的新聞實踐經驗也可以發現，另類／獨立媒體以獨立財源、水

平化組織結構等方式維護新聞自主，期望藉此實踐新聞工作者無法在主流媒體達成的專業自許，然而隨著外部情境變動劇烈，以及組織規模調整，成員間的互動變得複雜，除了新聞產製過程中的互動外，有關勞務、薪資等經營層面的討論也會增加。原先尊重組織個體自由的工作模式，會因未能明確規範各角色的權力義務而導致內部衝突。

過去的另類媒體研究提到，另類媒體因本身社會運動導向使然，經常隨著運動的結束而消失 (Downing, 2001)。有別於此，台灣有許多另類／獨立媒體以新聞專業為導向，將對社會發揮正向且深刻的影響視為組織發展目標，此時媒體能否穩定經營便成了經營者不得不思考的課題。對此，上下游新聞兩位共同創辦人汪文豪與馮小非皆以自身經驗表示，儘管組織規模小、講究工作者個人自主，但明確的制度規範仍有其必要。馮小非以目前上下游新聞工作團隊的運作為例說明，制度化的團隊工作方式像是明確的角色定位、差勤記錄、交稿／改稿方式等，能夠幫助組織穩定運作、減少衝突機會，

另一方面，對於滿懷熱血加入另類／獨立媒體的年輕記者而言，另類媒體給予記者關懷非主流議題的空間、也讓記者享有較多的新聞自主，此種工作方式有助於記者迅速累積報導路線的專業知識、建立人脈。然而，由於另類／獨立媒體科層分工較主流媒體鬆散，組織經常缺乏明確的守門模式，對於資深記者而言，因個人已累積相當程度的新聞產製經驗，此種方式讓資深記者有較多發揮的空間；但對於有意深化新聞產製經驗與路線專業知識的年輕記者來說，儘管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自主空間有助於自己快速成長，但一旦記者遭遇職涯專業發展瓶頸時，另類／獨立媒體因缺乏明確的守門制度，無法即時幫助記者突破寫作困境或報導盲點。再者，由於另類／獨立媒體資源較為缺乏，年輕記者在報導之虞，經常得擔心個人生計、報導資源投入不足等問題。從記者個人職涯發展觀點來看，另類／獨立媒體需要發展穩定的經營管理模式以及制度化的內容產製方式，才能幫助工作者專注於報導工作，並藉由組織力量協助自己突破職涯發展瓶頸。

第二節、研究反思與建議

一、 研究歷程反思與理論侷限

研究者對於另類／獨立媒體的發問，來自過去在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的工作經驗，以及研究者就讀研所以來對於該領域研究及台灣實踐案例的觀察。研究者從工作經驗與日常觀察中發現，過往「獨立或另類於主流之外」的定義方式，無法回應台灣另類／獨立媒體複雜且多樣的實踐樣態，且既有定義也未能如實反映植基於本地脈絡的另類／獨立媒體的實際工作樣貌。另一方面，研究者從與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接觸的經驗中發現，對工作者而言，大眾或研究者如何定義他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如何在每日的實踐中體現自己「異於主流」。

基於既有定義不足以反應另類／獨立媒體的實際樣貌，過往研究也未能從工作者的自述中，發展出一套植基於另類／獨立媒體日常新聞工作的定義，所以研究者一開始選擇採用紮根理論，希望從工作者的行動與自述中，抽譯出核心概念，發展足以回應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的理論（定義）。

紮根理論強調研究者須持續藉著理論性抽樣，擴大研究資料的歧異性，幫助研究者驗證、釐清編碼過程中浮現的理論範疇，豐富範疇的概念特質（藍佩嘉，2012；林本炫，2005）。研究者須透過不同的田野資料，持續驗證與釐清範疇，直到研究者覺得田野資料已無法再衍生新的理論解釋或範疇面向，達到「理論飽和」。當研究者在規劃本論文預定的研究對象時，發現研究者並無法達到紮根理論所要求的理論飽和，研究者發現，台灣另類／獨立媒體不僅實踐樣態殊異，個別另類／獨立媒體也不會總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新聞產製規則，隨時都有可能因為內外情境的變動而調整原有的新聞實踐方式，研究者若只是嘗試以紮根理論捕捉當下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的共向，這份研究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落入「不夠用」、「過時」的窘境。

因此，研究者認為這份研究得採用其他能夠映照台灣另類／獨立媒體變動、

異質特性的研究取徑，除了深描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面貌外，還得關注另類／獨立媒體生「變」的生成過程。爾後研究者決定採用塊莖思維（rhizome）觀看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生成，以動態的生成視角關注另類／獨立媒體如何變形、聚合、分裂、逾越既有疆域、與域外物連結（Bailey, Cammaert & Carpentier, 2008）。如同本研究第一章所提，以塊莖思維觀看以「變」為常的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可以幫助研究者採用動態且彈性的視角關注媒體生成過程中的各種變動，像是產製方式的改變、網絡的流動、媒體的分裂、連結與重生等。

當肯認「變」是一種常態，改以塊莖視角檢視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的生成，研究者便不會宣稱本研究研究發現已經穩固且具普遍性，更不能再將另類／獨立媒體視為可被化約為一個整體，必須強調每個另類／獨立媒體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成過程。因此，本研究無法提出詮釋本地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群像的理論定義，反之，研究者是透過田野探勘呈現單一研究對象《上下游新聞市集》新聞部門如何因應內外情境的變動而生成、建／重構自身的新聞實踐面貌。

然而，當研究者完成第四章研究發現的書寫時發現，以塊莖視角探勘以變為常的台灣另類／獨立媒體仍有其侷限。從田野資料可以發現，上下游新聞成員在逾越既有疆域的破口上，分裂成兩個實踐方式迥異的媒體，一個是仍在主流媒體之外，但建立制度化新聞實踐模式的《上下游新聞》；另一個則是由離職成員創辦、接受政府體制資金挹注的《農傳媒》。無論是制度化的工作模式、或者是體制化的組織結構，都與塊莖的流動特質相左。另一方面，當塊莖遭域內外情境變動時，有時也會改變自己強調彈性與基進的新聞實踐模式，例如《香港獨立媒體》遭遇社群衝擊之際，便捨棄過往在地下進行社會動員的角色定位，從社會行動者媒體轉向為組織化的「新聞媒體」，突顯自身報導公共議題的角色定位；上下游新聞也在臉書在台普及之際，從主流媒體引入新聞行銷手法，以此經營社群、吸引讀者目光。究竟研究者該如何解釋使用塊莖視角檢視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所遭遇的侷限？

塊莖的特質會在疆域化、解域化、與其他事物連結的過程中產生變化，塊莖隨時都有可能斷裂，但會隨即沿著解域化路線與其他事物產生連結，再次建立疆域，不斷地在「疆域化—解域化—再疆域化」之間流轉生成。從研究對象上下游新聞的生成經驗可以發現，另類／獨立媒體隨時都有可能因應情境變動而調整自身新聞實踐方式，當前設立的制度儘管看似穩固，但只要組織遭域內外力量的重大衝擊，原有的新聞實踐制度便會隨時被打破，並視媒體所需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上下游新聞當前的「共同審稿下標」守門模式便是一例。研究者將制度視為另類／獨立媒體在進行解域化之前的「疆域」，是塊莖生成過程中的中間點，儘管當前看似穩定，但隨時都有可能被內外力量打破。

另一方面，本研究旨在以塊莖思維檢視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如何在組織內外的蔓生與牽扯中生成，然而研究發現，另類／獨立媒體因人數不多，媒體內部的流動時時牽引著新聞實踐面貌的走向，其重要性不亞於外部情境對另類／獨立媒體的影響，但既有的塊莖視角較無法解釋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在「商業」、「政府」、「主流」、「另類／獨立」之間的流動。有別與西方另類／獨立媒體工作者多以進行社會動員、倡議特定理念、發揮媒體基進力量為目標，台灣有較多以新聞專業為出發的另類媒體，對他們而言，媒體能否體現自身對於新聞專業的期許，是他們決定要待在哪個媒體的關鍵，而非由媒體組織結構或經營方式決定。研究者認為，儘管塊莖理論可以映照台灣另類／獨立媒體以變為常的新聞實踐特質，但單用塊莖理論並無法解釋工作者在各式媒體之間的流轉，需在塊莖理論之外，關注工作者個人角色定位、社會期許、彼時政治與商業機構的變動，才能呈現塊莖受到何種力量驅使而在地上與地下之間遊走。

二、 研究建議

在進入田野時，研究者從研究問題意識出發，佐以研究者工作經驗、文獻回顧以及日常觀察，羅列訪談問題。然而，如同絕大部份採用深度訪談的質化研究，

儘管研究者已事先羅列訪綱，但仍需要視訪談當下受訪者的回答，摸索各種延伸提問的可能。研究者從田野工作當下以及後續資料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由於研究者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無法即時在訪談當下判斷受訪者所提及的新聞實踐經驗，是否有特別之處？該如何進一步的追問？也因為缺乏工作經驗做為對照，研究者經常把受訪者言說內容所透露的新聞實踐面貌視為理所當然，未能進一步追究其成因。

另一方面，研究者因任職於獨媒協會時便曾長期與本研究大部分受訪者互動，研究者進行訪談時，受訪者皆願意對研究者的提問直言不諱。然而，由於研究者與受訪者關係密切，且希望研究結束後仍可維持關係，因此針對較為敏感且涉及較多隱私的問題，研究者在提問時會轉而採用較為迂迴的提問方式，此舉儘管仍可幫助研究者取得受訪者回覆，但因未能直指核心，有讓受訪者誤會研究者的提問方向、模糊訪談焦點之虞。由於研究與實務經驗不足，研究者未能在訪談過程中妥善運用過去交情的協助取得較為深入的回覆，並避免自己受到交情的影響而採取保守的提問方式。

本研究是一份企圖從圈內人觀點出發、奠基於新聞工作者實際工作樣態之上探索台灣另類／獨立媒體新聞實踐面貌的實證研究，然而，因研究者實務經驗不足，較難深入發掘另類／獨立媒體特殊的新聞實踐樣貌，也較難靈敏地跟隨工作者留下的軌跡，追蹤媒體新聞實踐獨特的生成地圖。因此，研究者期望往後能有具一定新聞工作經驗（不論此工作經驗來自主流媒體或另類／獨立媒體）的研究者進一步探究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面貌，以自身工作經驗作為對照，即時針對訪談獨特、需進一步追問的部分「舉紅旗」，藉此如實且深入的描繪台灣另類／獨立媒體的新聞實踐。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書籍

- 朱淑娟 (2016)。《走一條人少的路：獨立記者寫給共同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你我——空氣、水和土地》。台北：天下文化。
- 成露茜、羅曉南 (2009)。《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正中書局。
- 吳嘉苓 (2012)。〈質性個案研究：紮根理論與延伸個案法〉，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 (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二)：質性研究法》，頁 33-60。台北：東華。
- 林本炫 (2005)。〈紮根理論研究法評介〉，齊力、林本炫 (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 189-218。嘉義：南華大學。
- 林藹雲、葉蔭聰 (2009)。《草根不盡：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2008—2009》。香港：獨立媒體 (香港)。
- 姜華 (2014)。《現代思潮與新聞文化》。香港：中和出版。
- 姜宇輝譯 (2010)。《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卷二)：千高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0]. *Mille plateaux*. Paris, France: Les Editions de Minuit)
- 展江、陳娟譯 (2012)。《比較媒介體制：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Halin, D. & P. Mancini.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陳順孝 (2014)。〈獨立媒體「小」革命—自主、專注、公義的新聞實踐〉，羅世宏、童靜蓉 (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頁 221-236。台北：優質新聞發展

協會。

陳順孝（2015）。《新聞創業相對論》。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陳永國（2014）。《理論的逃逸：解構主義與人文精神》。台北：秀威資訊。

麥永維（2007）。《德勒茲與當代性：西方後結構主義與思潮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文強（2009）。《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台北：秀威資訊。

張文強（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兩種模型的實務考察》。台北：五南。

張讚國（2013）。《匆促的記者：公民新聞、媒體與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馮建三譯（2008）。《傳媒、市場與民主》，台北：遠流。（原書 Baker, E. [2002]. *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黃應貴（2012）。〈質性個案研究：紮根理論與延伸個案法〉，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頁 1-30。台北：東華。

彭芸（2008）。《21世紀新聞學與新聞學研究》。台北：雙葉書廊。

葉蔭聰（2015）。〈序二：媒體就是社會與政治〉，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頁 20-23。台北：紅桌文化。

葉蔭聰（2014）。〈當小媒體遇上社交媒體：「香港獨立媒體網」個案研究〉，羅世宏、童靜蓉（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頁 185-198。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董素蘭、顧淑馨譯（2011）。《新聞學：原理與實務》，台北：學富文化。（原書 Harcup, T. [2009]. *Journalism: principles & practice 2nd e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AGE.）

管中祥（2015）。〈台灣：百花齊放，暗藏危機〉，管中祥（編），《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頁 99-131。台北：紅桌文化。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出版社。
- 藍佩嘉（2012）。〈質性個案研究：紮根理論與延伸個案法〉，蘇國賢（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頁 61-92。台北：東華
- 羅文輝（1993）。《新聞理論與實證》。台北：黎明文化。
- 羅世宏、魏均、馮建三、唐士哲、林麗雲、王菲菲、王賀白譯（2005）。《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台北：巨流。（原書 McChesney, R.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羅世宏（2014）。〈續論：社交媒體與新聞頁〉，羅世宏、童靜蓉（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頁 1-21。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 羅世宏（2014）。〈回歸根本—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查證〉，羅世宏、童靜蓉（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頁 167-182。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期刊論文

- 陳順孝（2014）。〈記者獨立之路：臺灣獨立記者的維生策略與互助機制〉，《傳播研究與實踐》，4（2）：25-54。
- 馮建三譯（1990）。〈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新聞學研究》，42:149-170。（原文 Golding, P., & Murdoch, G.（1979）.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de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pp.198-224）. London, UK: Croom Helm.）
- 葉蔭聰（2009）。〈新政治力量：香港獨立媒體發展〉，《新聞學研究》，99：221-239。
- 管中祥、劉昌德（2001）。〈戰後媒體反對運動〉，《台灣史料研究》，32：22-54。
- 管中祥（2009）。〈光影游擊最前線：台灣另類媒體 2007-2008〉，《新聞學研

究》，99:201-22。

劉昌德(2007)。〈媒體倫理的政治經濟學：國家、資本與新聞專業規範的流變〉，
《中華傳播學刊》，11:111-153。

研究計劃、會議論文

何國華(2014年7月)。〈由上而下—聯合報和蘋果日報的轉型驅力〉。「公共電視
研發部」報告。取自公共電視網頁
<http://web.pts.org.tw/~rnd/p6/2014/08/UdnTV%20and%20Apple.pdf>

林照真(2014年06月)。〈社群網站與新聞生產：從聚合觀點檢視全球性媒體如何經營社群網站〉，「2014中華傳播學會論文」，台北市士林區。

陳大可(2017年06月)。〈非線性剪輯，一種塊莖的思維〉，「2017中華傳播學會論文」，台北市大安區。

博碩士學位論文

吳姿嫻(2014)。《從中間開始：論日常中的媒介使用》。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論文。

林本炫(1988)。《當代台灣民眾宗教信仰變遷的分析》。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郭佩君(2010)。《從組織雇員到獨立記者：三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理形塑與實踐》。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許瑋庭(2013)。《流變與開創：一位音樂創業者的生命敘說》。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張傳佳(2013)。《獨立/主流媒體的環境報導——以國光石化開發案為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黃文慧(2013)。《當另類媒體遇上社會企業：「上下游 News & Market 新聞市集」

中新聞與市集的合作與限制》。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網際網路

上下游新聞編輯部(2011年09月04日)。「〈2011年9月3日 上下游,出發了!〉」,

《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2474/>

上下游新聞編輯部(2017年01月07日)。「〈初心不變《上下游》對烏魚報導的

說明〉」,《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91095/>

朱淑娟(2015年11月18日)。「〈卓越新聞獎 得獎致謝〉」,《環境報導》。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5/11/blog-post_19.html

何欣潔(2013年10月30日)。「〈農民市集進駐百貨成風潮 初衷不再?拓展市

場?〉」,《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41302/>

呂苡榕(2015年10月15日)。「〈體檢台灣媒體系列一「即時新聞」成癮 台灣媒

體慢性自殺(上)〉」,《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taiwan-InstantNews01/)

[taiwan-InstantNews01/](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taiwan-InstantNews01/)

林靖堂(2014年01月27日)。「〈《蘋果》即時戰略為什麼?—專訪蘋果社長陳裕

鑫〉」,《PeoPo 公民新聞》。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231199>

林慧貞(2016年05月13日)。「〈重大變化!檢討42年保價收購 試辦直接給付〉」,

《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84751/>

陳順孝(2003年08月27日)。「〈新聞編輯的再定義〉」,《阿孝札記》。取自

<https://axiao.tw/%E6%96%B0%E8%81%9E%E7%B7%A8%E8%BC%AF%E7>

[%9A%84%E5%86%8D%E5%AE%9A%E7%BE%A9-787d04d1a27e](https://axiao.tw/%E6%96%B0%E8%81%9E%E7%B7%A8%E8%BC%AF%E7%9A%84%E5%86%8D%E5%AE%9A%E7%BE%A9-787d04d1a27e)

陳順孝(2005年09月11日)。「〈編輯憑什麼改記者的稿〉」,《阿孝札記》。取自

<https://axiao.tw/%E7%B7%A8%E8%BC%AF%E6%86%91%E4%BB%80%E9>

[%BA%BC%E6%94%B9%E8%A8%98%E8%80%85%E7%9A%84%E7%A8%](https://axiao.tw/%E7%B7%A8%E8%BC%AF%E6%86%91%E4%BB%80%E9%BA%BC%E6%94%B9%E8%A8%98%E8%80%85%E7%9A%84%E7%A8%BF-6d0c6aa282b2)

[BF-6d0c6aa282b2](https://axiao.tw/%E7%B7%A8%E8%BC%AF%E6%86%91%E4%BB%80%E9%BA%BC%E6%94%B9%E8%A8%98%E8%80%85%E7%9A%84%E7%A8%BF-6d0c6aa282b2)

陳順孝（2006 年 03 月 21 日）。〈新聞編輯研究的第六條路〉，《阿孝札記》。取自

<https://axiao.tw/%E6%96%B0%E8%81%9E%E7%B7%A8%E8%BC%AF%E7%A0%94%E7%A9%B6%E7%9A%84%E7%AC%AC%E5%85%AD%E6%A2%9D%E8%B7%AF-45b56b36e80a>。

郭志榮、陳志昌（2006 年 12 月 04 日）。〈溪底遙的柳丁夢〉，《我們的島》。取自

<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6%BA%AA%E5%BA%95%E9%81%99%E7%9A%84%E6%9F%B3%E4%B8%81%E5%A4%A2#sthash.HWry0GgP.dpbs>

郭琇真（2017 年 08 月 29 日）。〈幫助認識丙烯醯胺？還是製造對黑糖恐慌？《康健》報導見樹不見林〉，《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5136/>

張正（2016 年 04 月 14 日）。〈張正：《四方報》快轉，十年一刻〉，《獨立評論@

天下》。取自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91/article/4141>

康健雜誌編輯部（2015 年 08 月 28 日）。〈黑糖抽檢 全部測出致癌物質丙烯醯胺〉，《康健雜誌》。取自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eturec=1&block=article-pop&nid=70526>

端傳媒社媒組（2016 年 03 月 26 日）。〈小端血淚史：你我如何被臉書算法改變？〉，《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6-notes-臉書/>

蔡佳珊（2017 年 03 月）。〈烏魚關鍵時刻來臨！你希望台灣如何養烏魚？〉，《上

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mullet/>

蔡佳珊（2017 年 05 月）。〈台灣除草劑銷售量創歷史新高！年銷 26 億元，單位面積用量全球名列前茅〉，《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herbicides/ch01/>

蔡佳珊（2017 年 05 月 15 日）。〈禁用巴拉刈爭議：農村自殺人力損失 vs 農業生

產成本提高，孰輕孰重？》，《上下游新聞市集》。取自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95306/>

英文部分

書籍

-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AGE.
- Atton, C., & Hamilton, J.F. (2008). *Alternative Journalism*.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AGE.
- Bailey, O. G., Cammaert, B., & Carpentier, N. (2008).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Media*. U.K., Milton Keynes: McGraw Hill/Open University Press.
- Downing, J.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AGE.
- Fontes, C. (2010). The global turn of the alternative media movement. In G. Howley (E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pp.381-390). U.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 Graham, A., & Davies, G. (1997). *Broadcasting, Society and Policy in the Multimedia Age*. New Barnet, U.K.: John Libbey Media.

期刊論文

- Atton, C. (2003). What is 'alterna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4(3), 267-272.
- Atton, C., & Couldry, N. (2003). Introdu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5, 579-586.
- Atton, C., & Wickenden, E. (2005). Sourcing Routin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Alternative

Journalism: a case study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6(3), 347-359

Galtung, J., & Ruge,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 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64-90.

Harcup, T. (2015). "I'm Doing this to Change the World": journalism in alternative and mainstream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6(3), 361-374.

Rauch, J. (2015). Exploring the Alternative–Mainstream Dialectic: What “Alternative Media” Means to a Hybrid Audience.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8, 124–143.

Sermijn, J., Devlieger, P., & Loots, G. (2008).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 Selfhood as a Rhizomatic Story. *Qualitative Inquiry*, 14(4), 632-650.

網際網路

Albert, M. (1997, October). What Makes Alternative Media Alternative?. *Z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ttp://subsol.c3.hu/subsol_2/contributors3/alberttext.html

附錄一、訪談大綱

- 請您分享到上下游前的求學或任職經歷？
- 能否請您說說到上下游任職的經過？是甚麼原因讓您決定到上下游？
- 還沒進到上下游前，對上下游有甚麼看法？
- 請您描述一下目前在上下游的工作內容，以及每日的新聞工作流程？
- 能否請您更詳細的說明如何選題？如何決定報導的切入取徑角度？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上下游的報導內容？
- 如何決定報導的消息來源要找哪些？其中的比例（例如正／反、學者／業界／官員／消費者）會怎麼拿捏？
- 請您描述一下和（主要）消息來源的關係與互動？
- 從選題、編採、到報導露出，上下游會如何進行守門？
- 請您描述一下和內部成員的相處方式？如果想法和成員有所出入時，您會怎麼表達您的看法？
- 當上下游面臨報導爭議時，會怎麼處理？如何回應外界（讀者、產官學、消費者）的質疑？
- 到上下游工作後，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報導經驗？
- 就您的經驗來看，上下游與其他媒體／部會／NGO 團體的關係如何？是否曾面對不友善的對待？
- 對您而言，媒體（不分主流／另類）的角色是甚麼？應該發揮哪些功能？
- 您覺得另類／獨立媒體是甚麼？有哪些特質？和主流媒體不同的地方有哪些？
- 對您而言，上下游算是獨立／另類媒體嗎？如果是，為什麼？如果不是，那上下游是一個怎樣的媒體？
- 您覺得從您到職至今，上下游在報導風格、議題取向、切入取徑、內部工作

方式等層面有沒有哪些轉變？如果有，能否請您描述您覺得重要的幾次轉折？

1. 內部職位、記者工作分工方式、內部相處與溝通方式有哪些轉變？
2. 工作夥伴歷經哪幾次流動？
3. 上下游所關注的議題面向以及報導風格如何演變至今？
4. 在報導取徑與切入角度層面，是否有不同階段的變化？哪些因素造就這些轉變？
5. 在報導呈現方式上，上下游曾經歷哪些嘗試？有哪些因素影響上下游的報導呈現方式？
6. 和外部組織（e.g.政府機關、其他媒體或 NGO）如何演變至今？

